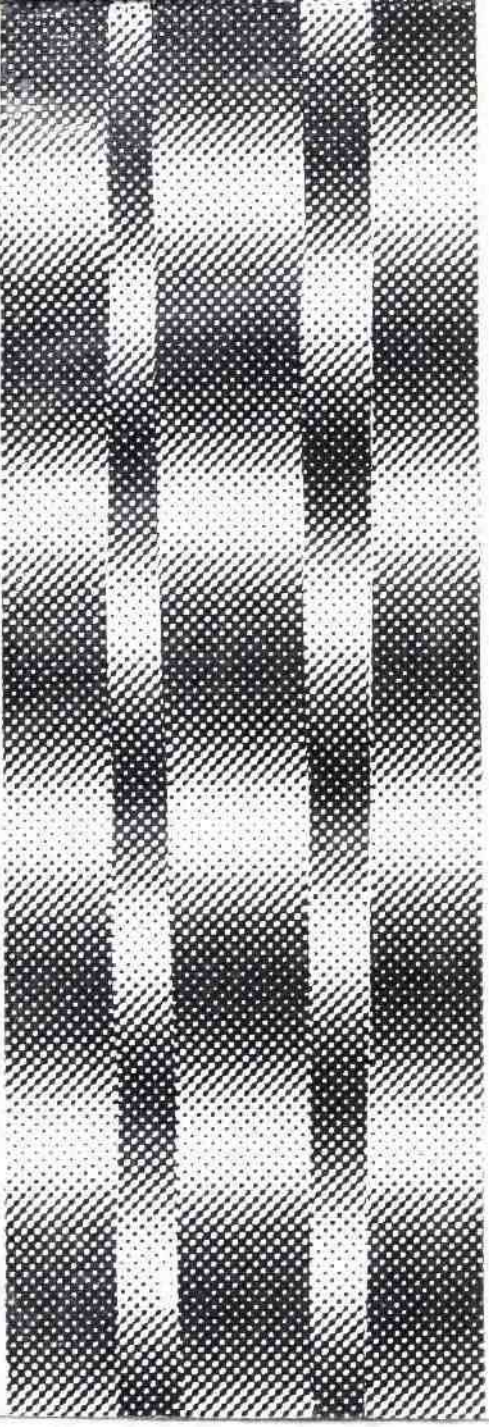


发展的主题

VISIT…

发展的主题

——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变革

周其仁 杜 鹰 邱继成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耀　岚
特约审稿：张睦伦
封面设计：戴士和
封 面 画：施本铭
插　　图：戴士和
装　　帧：盛春萍

走向未来丛书

发展的主题

周其仁 杜　鹰 邱继成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mm 1/32　印张9.25 插页6 字数144千
1987年6月第一版　1987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0—00010—3/C·2
统一书号：17113·178　印数：1-116,000

定价：1.64元

编者献辞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这生动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

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5页。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序

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是依托于一项研究计划而产生的一批成果之一。

1983年，当时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承接了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哲学和社会科学规划中的一个重点研究项目：中国农村发展战略分析。作为参加人员，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为这个项目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变革中的农村提出了许多富于挑战性的问题，我们深感自己的理论准备是如此不足。因此，前期的工作费去了许多时间，直到1984年底，项目的整体分析构架才初步形成。此后，研究工作进入了专题的分析和综合。

半年之后，我们提出了第一份阶段性研究成果。这篇当时被取名为《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的经济研究报告，刊登在权威而又富于生

气的《经济研究》1985年第7期上，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兴趣和关心，这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完成这项研究依然要付出艰巨的努力。

《新成长阶段》主要是提出问题的报告。而探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不涉及经济生活诸多复杂的关联。在相当一些领域里，我们差不多只能从最初的事情做起。概念的形成和逻辑框架的确立，都是在反反复复整理事实的基础上才慢慢地有所推进的。

差不多又过了一年，《中国农村发展战略分析》中的产业报告、城乡报告、区域报告以及发展过程调节控制等报告才陆续形成。其中的产业报告，包括相继在《经济研究》上刊发的《论国民经济结构变革》和《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连同十几份专题分报告（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集录出版），作为全部成果中的一部分最先披露，希望引起批评和讨论，以便使最后成果形态的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研究报告的体裁对它的表达方式有明确的限定。对于已公开发表的几篇作品，热情而严肃的读者提出了一大批问题。其中有些是我们在讨论稿中作过研究而没有公开表达清楚的；更多的则是遥着

我们又作了推进一步的思考。无论哪种情况，如果有更充分而从容的表达机会，我们同读者一样，都希望更深入而系统地来讨论这些问题。

这个机会现在由《走向未来》丛书提供了。丛书编委会希望我们为更多关心现实经济问题的青年朋友们写本小书，于是我们就在产业报告的基础上选择了本题，希望它对人们了解本世纪内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大变革的宏观图景，有一点帮助。

如前所述，离开了笔者所处的学术环境——首先是基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发展研究所，以及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共同建立起来的认真探索、执着追求的气氛，这本书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因此，把本书看成是我们整个研究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独立的一个研究结果，可能是更加合乎实际的。我们作为执笔者，仅仅对书中仍然存在的纰漏和缺点负责。

刘红同志为本部分研究提供了一部分国际经验的翻译工作；宋国青、杨沐、王晓鲁、郝一生、乔桐封等同志提出过许多重要意见，仅此致谢。

作　者

1986年8月于发展研究所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1～26

1-1 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 3

1-2 静悄悄的变革：1979～1984年的经济增长格局……10

1-3 需求导向：消费革命来临了吗？……16

1-4 国民经济的新成长阶段……20

第二章　经济结构变革的国际经验……27～60

2-1 理论史：经济学对结构问题的发现……29

2-2 “世界发展模型”的一般结论……34

2-3 结构变革中的大国特征……48

2-4 中心线索：农业份额的下降……51

第三章　特殊的曲线：中国农业份额的变动…61～91

3-1 两组曲线组成的历史……63

3-2 反常现象之一：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72

3-3 反常现象之二：城市大工业扩张无力……75

3-4 阻尼究竟产生于何处？……81
3-5 转向常态面临的新约束……86

第四章 我国国民经济结构的显著特征——超常偏差……93～119
4-1 对比中的发现……95
4-2 偏差一定不行吗？……107
4-3 霍夫曼定理的普适性……113
4-4 我国结构问题症结之所在……116

第五章 偏差协调：我国经济结构变革的可能方向……121～145
5-1 中国适用标准转变过程吗？……123
5-2 偏差间协调的两难问题……128
5-3 经济流程：一个新的着眼点……134
5-4 日本经验的启迪……138

第六章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流程的变化
……147～172
6-1 何谓“总需求”膨胀……149
6-2 新支点：两个不再相等的经济变量……152
6-3 要素替代与要素解放……159
6-4 转折中的近忧与远虑……168

第七章　农村非农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变革中的地位……173～198
7-1 曲折的经历：农村非农产业的前发……176
7-2 效率尺度：发展非农产业的宏观评价……181
7-3 农民转移的基本规则……188
7-4 我国农民的新世界……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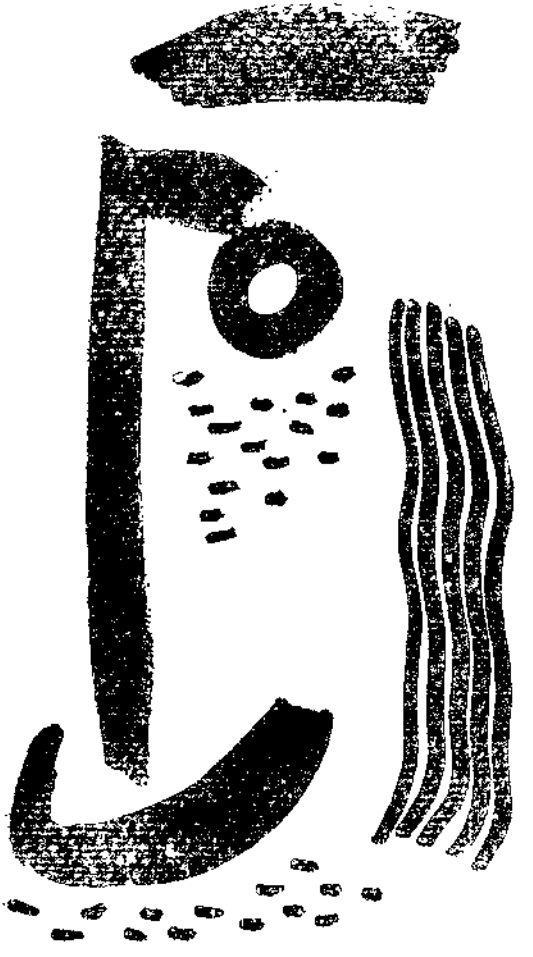
第八章　结构、参与度和相似性……199～227
8-1 农村非农产业的结构分布和动态……201
8-2 “结构变化值”与总量增长相关

目录

程度的逐层递减……206
8-3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参与程度……209
8-4 对若干重要产业部门的估量……214
8-5 值得注意的趋同：结构相似性……222

第九章 产业政策：提高结构转换能力的支点
……229～253
9-1 产业政策的提出……231
9-2 发展中国家：市场与干预……236
9-3 “筱原两基准”……242
9-4 制定我国产业政策的程序合理性……248

第十章 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255～276
10-1 革新农民进入非农产业的形式……257
10-2 更新城乡企业分工原则……261
10-3 深入财产关系的改革……265
10-4 充分运用货币推动……271



第一章
导　　论

1-1 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

在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历程中，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进步，一般都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保罗·贝罗赫估计，西方国家在产业革命前的40～60年中，农业生产率一般增长了40%左右。这表明没有农业部门给国家工业化起步所作的准备，产业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即使在产业革命之后，农业对工业化和现代化深入发展的制约作用，也十分明显。有人计算过19世纪12个先进国家的农业生产率和工业增长率，发现这两套数字存在着高正相关关系（测定系数$R^2 = 0.81$），而如果把一个时期的农业发展与下一个时期的工业发展进行比较，这个系数值还要更高一些。

在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一般都占总人口的绝

大多数，这就使得农村的发展对整个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从经济上看，在一个农业占支配地位的封闭经济中，工业必然会强烈地受到农业状况变化的影响。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农业生产的下降使购买力普遍减少，因而就减少了工业产品的销路。联合国统计部门计算了拉丁美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总产值和制造业总产值的指数，得出两个数列的相关系数在拉美各国为0.99，在亚洲各国（不包括日本和社会主义国家）为0.97。有的学者考察了四十个不发达国家1950～1970年期间的经济情况，发现每次农业生产下降或者衰退后，紧接着就是制造业产量发生类似的变化。农业产量的曲线如此强烈地影响着制造业的曲线，这个事实不难帮助我们得出如下结论：没有众多的农村人口的积极参与，任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是无法想象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状况，通常都难以激发起人们的诗情画意，但正是这片土地的命运，对全球现代化的进程，具有真正决定性的影响。

世界经济史显示的以上一般经验，同样适用于中国。不过，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来说，仅仅了解世界经济的一般原则，还是远远不够的。大千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中国的特殊国情，赋予中国农

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十亿人口，八亿农民，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中国农民构成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实体。仅仅这一点就决定了，如果农村的事情没有办好，中国的事情就不可能办好；农民贫困，国家就不可能富裕；农村停留在古代，中国就无法现代化。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农村的经济使命逐渐被简化为向城市和大工业提供农产品；农民则基本上被隔绝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大门之外。这样一种功能划分，如我们这本小书以后各章所要加以阐述的那样，在结构上就决定了农民的贫困和农村的停滞。到70年代后期，我国农业的脆弱状况已经对整个国民经济以至社会政治安定构成了相当严重的威胁。

这一切，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村政策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调整的背景。

1980年，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在它的成立宣言中写道：

>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开始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农村依然是中国最广大的社会存在，

农民依然是革命和建设的最广大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党实行了土地改革，并为了满足农民发展生产的需要，成功地领导了合作化运动；而且也正是有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繁荣，我们才完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使中国开始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但是，总的说来，在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小农大国，无产阶级政党如何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在和平建设环境里把握国民经济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农村发展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特别是在我国逐步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大工业基础之后，我们的一些同志过高地估计了已经取得的成就，一方面脱离广大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追求一种农民平均主义的“一大二公”模式；一方面忽视广大农民的经济利益和要求，片面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其结果，是我们长期不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尽管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和农村

干部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也取得了在旧中国无法想象的巨大成就。但是，直至今天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依然处于落后状态，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很低，整个农村所能为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很少，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没有显著的改善，甚至相当一部分农民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在整个农业生产难以根本解决十亿人口吃饭问题的情况下，广大农民的劳动不能满足城市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广大农村也不能为城市工业产品提供广阔的市场；农业的落后，则决定了被片面突出的工业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且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良后果，妨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种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状况如不加以根本改变，我们就无法取得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功。

文中还略带着激愤的心情表达了如下意见：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涉及每个中国人根本利益的真理，却经常被人们忽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一种超阶段的

战略思想的影响，农民问题一直缺乏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是为了满足工业的需求。整个农村社会进步的全面综合研究，被简化为农业生产的研究；而农业生产的研究，又被人为地局限于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内部的经营管理。“重、轻、农”的经济建设宗旨，收到的是“众轻农”的社会效果。不仅农民想脱离农村，农村干部想脱离农村工作，而且一些农业经济研究工作者也想脱离农业而改行。就是今天，人们一谈改革，也往往首先和主要考虑工业的改革。一系列的事实导致农村问题研究的不合理的畸形状况：农村问题最重要，却最不受人重视；农民人数最多，研究农村的人却最少；农村问题牵扯面最广、最复杂，对它的研究却最狭隘、最贫乏。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20年来我们在农村政策上一系列的失误和不可避免的紊乱。农业经济理论研究的这种落后状态，是造成国民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与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显然是极不相适应的。

可是，逻辑推论和言辞的力量毕竟是太有限了。在当时，甚至没有一家公开的报纸或杂志愿意刊登上述言论。*

重新引起全世界注目中国农民问题的，是农村改革事业出人预料地获得了实质性的重大进展。最初游荡于安徽、四川等地农村包产到户的“幽灵”，受到了各地农民的欢迎。事情仿佛突然越过了某个临界点：包产到户要拓广，“权宜之计”要长久，家庭经营要普及。短短几年之内，中国农村似乎一下子成了高速反应釜。传统模式到处被突破，“反常事件”大量出现。大变革的潮流把几亿人口卷入了漩涡。长期沉寂的农村，焕发出如此激越的生命力，不能不引起它的旁观者以至当事人深深的吃惊。

中国的改革、包括农村的改革并不是在有充分理论准备的条件下发动的。因此变革愈是深入，对变革引起的全部连锁反应的认识就愈是困难。比如包产到户的推进，在很长时间内还仅仅被看作是只对解决吃饭问题有所裨益。这个特点使农村改革免受

---

*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认清国情，加强农村发展的综合研究》，当时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内部刊物《农业经济丛刊》1981年第三期上；1985年才收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集刊《农村·经济·社会》第一卷，由知识出版社公开出版。

了各种不成熟的理论诱惑，但也为此付出了对快速改变着的国民经济整体环境认识不足的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认识上的欠缺对作出进一步选择的不利影响就开始显露出来。事实上，要恰当地提出我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就不能仅限于了解农村本身的要求，而应当联系到已经深受农村变革撞击的国民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来考虑。不论我们承认与否，在新形势下研究农村未来发展的前景、问题和面临的选择，难度显然大大增加了。这是不可能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困难。

1-2 静悄悄的变革：1979--1984年的经济增长格局

农村变革本身的历程，我们曾从理论经济学的角度作过初步的考察和探讨。* 本节我们集中分析农村变革引起的国民经济宏观图景的变动。

1979—1984年间，我国社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8.96%，国民收入每年平均递增7.92%，分别比1978年以前26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提高1.03%和1.94%。如果用人均国民收入指标来分析，则由年

* 参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农村经济变革的系统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平均增长3.9%提高到6.6%，显示出高速增长的特征。*

近年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来自国民经济原有体制下累积起来的经济潜力的释放。过去平均主义大锅饭加上重型结构，导致供给方面压抑着巨大的增产可能，需求方面潜藏着巨大的国内市场。常规性的调整加上体制改革这一新因素，有力地触发了两大潜能的释放。

在这六年中，国民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最突出的是其整体特征开始发生变化，摆脱以积累为中心的状态，逐步转向满足市场消费需求为主导。类似的调整效应在60年代初期也出现过。但此次大不相同的是，在调整过程中启动了原有经济模式和经济体制的改革。

农村率先"引爆"，联产承包制宣告了"大锅饭"的终结，引起农产品供给的大幅度增长。1979—1984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8.98%，其中种植业年均递增6.61%。这在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上是超常规的。1952—1978年26年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3.25%，其中种植业每年增长2.59%。以成绩较好的60年代情况来看，当时农

* 本书所引用的国内统计数字，凡未注明出处的，均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

业的年增长率也只达5.60%，种植业则为4.86%。六年之间，平均每年增产粮食340亿斤，棉花1,309万担；人均有粮从637斤增到790斤，人均有棉从4.5斤增到11.8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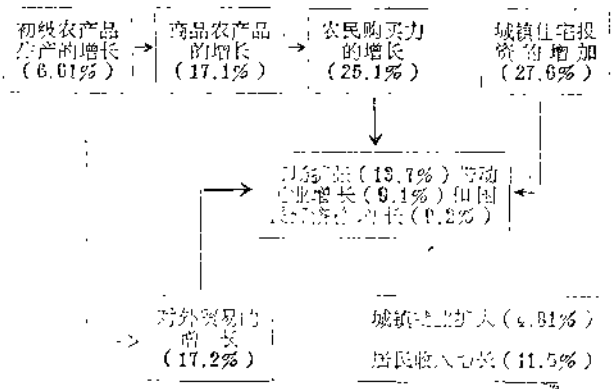
由于农户成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因此价格提高对生产的刺激功能大大增强。基本农产品加价敞开收购，加上市场逐步放活，导致商品粮食和棉花出乎意料的高速增长。1979—1984年，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增长了1.58倍，每年平均递增17.1%。从商品实物量考察，社会收购的农产品的年平均增长量，粮食为1,108.7万吨，棉花为53.9万吨，生猪为717万头，鲜蛋为15.6万吨，甘蔗甜菜为270.7万吨；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5%、16.4%、6.6%、17.8%和11.3%，都超过历史达到的水平。

农产品供给激增，引起农民货币收入的激增。1978年全国农村生产队和社员出售产品的货币收入为580亿元，1984年已达1,501亿元，共增加921亿元，年均增长17.2%（1953—1978年年均增长为5.5%）；从1978年到1984年，货币总收入从765.3亿元增长到2,307.9亿元，每年平均增长20.2%；减去各项货币支出，农民的净货币收入由381亿元增长到1,461.3亿元，年递增25.1%。

农民的货币收入增长，成为国内市场扩张的一

大支柱。据我们匡算，在1978年到1984年新增加的1,798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约有 2/3 来自农民。1984年全社会购买力中，农民占到52.5%。

于是，从市场需求方面刺激了工业供给。1979—1984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88%。分析下来贡献因素很多，但同农用生产资料、输入农村的基本生活用品（包括农业初级产品的加工品）的流量扩张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农民的货币收入还投向工业生产，直接引起工业品供给的扩大。1979—1984年全国乡镇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加17.9%，1984年全国乡镇工业产值已达1,031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6%。



说明：图中各括号内是相应经济变量1979—1984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5》。

图1—1　1979—1984年国民经济增长的格局

1979—1984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主流程可以由图1-1来示意：

发展研究所高小蒙计算了此期间国民经济各主要独立变量对总增长的贡献份额。他的研究结果表明，1979—1983年所增加的社会总产值中，由于消费增长而能够说明的占79%，由于积累增长而能够说明的占21%。在新增的消费中，农民占64%；在新增的积累中，农民（仅计农村住宅投资）约占56%。这样综合起来，农民的消费和积累增长能够说明国民经济总增长的62%以上。换句话说，近年社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的近9个百分点中，约有5—6个百分点来自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初级农产品的超常规增长，构成了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动因，这是1979—1984年国民经济增长格局的一个基本的特点。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以上增长格局的基本前提，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农产品的供不应求。这个前提逐渐被累积的增长所动摇。大体上从1983年开始，粮食和棉花即开始出现低水平的剩余。我国突然遇到了基本农产品的“仓容危机”，这至少是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如果继续执行加价敞开收购政策，那么预计到1986年粮食总过剩量将达2,000亿斤原粮，需占用国家收购资金400亿元，其中财政直接拨付的加价款达140亿元，这显然为我国现实

的有购买力的需求和财政实力所不堪承受。

根据新的情况，粮棉等大宗农产品“超购加价敞开收购”的政策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继续执行下去。1985年，粮食方面实行合同收购制，合同以外部分随行就市。市场因素更多地引入到中外皆知的国计民生产品——粮食——的供求决定中来，不仅对于短期的市场平衡十分必要，而且对于改革三十年形成的统派购制度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众所周知，市场的作用从来就不单单是为了刺激产量的增加。它谋求的是生产与需求的相适应。从历史上看，中国由于人口对土地的沉重压力使得粮食供给状况从来都难得宽松。但今天中国的粮食供给，却只能以今天现实的购买力（包括为必要储备所支付的财政购买力）为限。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市场就不会鼓励增产，反而要强制减少投入，减少产出。这正是1985年粮食形势变动的主要原因。新的国家合同粮价比上年降低了10%，集市粮价则只及60年代中期水平（只是1985年10月以后才回升），而同期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差不多上升了20%。价格信号本身就在通知农民减产。加之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全面调整种植业结构，以及天气的影响，一起把粮食总产量拉了下来。1985年全国粮食总产37,898万吨，比上年减少7%。用市

场的法则来分析，这次减产基本上是正常的。扣除村办工业产值，1985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速度显然大大放慢。

国民经济前六年高速增长的主要发动机功率衰减了，那么原有的增长格局将合乎逻辑地难以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必须安上新的发动机，才可能改变原有格局，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和增长。为了把握这个新的问题，我们必须对已经达到的消费水平有个基本的判断，对当前市场特征有个大致的分析。这不仅是理解国民经济何以在高速增长中发生转折的关键，也是把握转折所面临的新选择的关键。

1-3 需求导向：消费革命来临了吗？

从总体上看，我国人民以温饱满足为中心的必需品消费阶段已经结束。

1978—1984年，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从315元增长为548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每年递增6.59%。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从1978年的人均175元，增长到1984年的327元，每年平均增长7.89%。根据家计调查资料，1984年农村人均收入低于150元的户占4.6%，而六年前占65.0%，城市职工家庭人均月

收入低于25元的户的比重也下降到1.67%。

在这样一种收入水平及其增长动态下，1983年我国居民实际的消费水平和结构如下：

（1）平均每人每天摄取的热量达2,877.4大卡，蛋白质82.8克，脂肪47.2克。其中热量摄取部分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制定的中国人热量摄取标准（2,360大卡）22%，超过我国生理学会测定的我国人民对热量的合理需要量（2,480大卡）16%；蛋白质摄取部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69.4克，1978—1980年）；只有脂肪部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各种布匹的人均消费量达到31尺，比1978年增加近30%。衣着开支的绝对额增加很快，但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则比较稳定，城乡分别为14%和11%左右。

（3）用品消费总量增长很快，在消费开支中的比重开始上升。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日用品类、文教用品类和书报杂志类合计，1979—1983年平均每年递增16.95%，明显高于其他各类商品的增长速度。

（4）城镇人均住房5.9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11.6平方米，分别比1978年增加40%和43%。农村居民的住房开支比重由1978年的3.2%上升到1983年的11.1%。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城镇住宅投资1983

年比1978年增长2.19倍。1983年住宅的总投资（包括城乡私人建房）占国民收入使用额的8.8%。

由于我国城镇居民的实际消费由国家财政补贴的部分相当大，因此从家计调查得出的恩格尔系数比真实数值偏高。校正后的数值，城市职工家庭人均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约40—45%；农民家庭为50%。经过校正的数值，仍表明我国人民的食物消费比重明显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40%以下）。

通过其他生活质量指标来分析，并与国际水平作比较，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我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世界银行统计了人口超过100万的126个国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在第102位，属于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10美元以下）；但中国人均热量摄取占第62位，婴儿死亡率占第60位，成人识字率占第47位，预期寿命占第46位，出生率之低占第32位，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中国的“生活质量指数”在全球的位次，大大高于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球的位次。

可以判定，正是近年国民经济的增长，才使我国普遍地结束了以温饱满足为中心的必需品消费阶段。随着这个消费阶段的终结，继续扩大初级农产品和中低档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已不再能对国民经济的增长产生那么重要的影响。这就是说，我国国

民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不再是以低层次消费的满足来推动发展。这实在是一个重大的质的变化。

在满足温饱有余的基础上，新的消费特征悄悄地、不可阻挡地出现在我国人民的生活中。直观印象和统计调查一致表明，必需品中选择性强的商品普及城镇，扩展到农村；非必需品正由城市到乡村向消费领域进军。最集中的表现是不同种类消费品的需求对收入的弹性发生了变化。大体上是城乡居民的食品收入弹性都降到0.7左右（其中城市副食部分大于1）；而用品、住宅、某些服务的收入弹性都大于1，其中住宅和耐用消费品的收入弹性高达3以上。

消费市场变化的总趋势是必需品的销售增长率减缓，非必需品的销售增长率大大提高。1977—1983年期间，27种日用必需品零售额平均每年递增9.1%（其他商品递增16.8%），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40.6%降为1983年的32.7%；手表、自行车、电视机等三种耐用消费品在日用品和文教用品零售额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16.3%上升到1983年的26.8%；15种最基本用品的农村零售额占农村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到1983年已降为9.5%。

这些情况都表明，我国消费需求已开始转入非

必需品的比重急速上升的新时期，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正是这个转折要求国民经济的增长格局完成一次大变化。

1-4 国民经济的新成长阶段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近年国民经济在高速增长中遇到的转折，尽管来势突发，但原因却是深刻的。如果说，依靠初级农产品和低档工业品流量的扩张，构成了近几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那么这样一个发展阶段，随着消费需求的深刻变化从整体来说已经结束了。我国国民经济不可能再按1979—1984年的增长格局进入所谓“起飞”。今后国民经济增长的格局和速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找到新的推进动因，形成新的产业结构来满足新的消费需求。我国国民经济正在走向一个以结构大变动为主要特征的新成长阶段。

走向新成长阶段是我国经济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我国的原有经济结构及体制，包括经济运行的调控机制直至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将面临新的挑战。

应当指出，在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极为有限的条

件下，旧的消费特征的消失和新的消费特征的产生，都不是情遂径直地在市场上表现出来的。

当前我国消费品市场上值得注意的特征是：

（1）必需品的供求机制远未理顺。主要的生活必需品长期靠指令生产、统购包销、价格管制、凭证限额和消费补贴，几乎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品。随着必需品满足程度的提高，消费趋向多样化，原有模式就不足以灵敏地、准确地传递需求信息，以指导供给适应需求，重新合理配置资源。比如恩格尔系数偏高，相当突出地说明由于对必需品供求的行政性干预，已导致社会无从及时了解必需品的真实需求量，从而延滞了向新的消费阶段的过渡。

（2）消费者的购买主权远不是充分的，但在此条件下也发生了购买力“热点”从必需品转向非必需品。由于诸多必需品的消费补贴暗含于价格之内，因此消费者减少消费等于放弃了一份福利；另一方面，非必需品主要遇到供给限制，而其价格并不能恰当地反映供求，往往有价无市，形成持续的紧俏。因此，无论对必需品还是非必需品，购买决策都受到失真信号的干扰。尽管如此，购买力“热点”也已经转移了。粮食年均增长4.9%而过剩，但彩电目前月产量已达1978年年产量的43倍而仍然

供不应求。这种状况同日本五十年代的第一次消费革命似乎很相似。不难断言，如果消费者有比较充分的选择权，那么上述“热点”转移的特征会表现得更早、更明显。

（3）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比较突出。1978年以来，社会结余购买力总额平均每年递增29.5%，大大超过居民货币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这部分结余不可能都转为现实购买力，但从储蓄意向调查分析，待购倾向相当强烈。

但是，在几百亿待购的货币找不到适销品的同时，又有几百亿不对路的商品积压在库。长期紧缺与长期积压并存。看来，既没有足够强烈的信号通知社会将过剩产品的资源转投入供不应求产品的生产，也没有形成能够对这种信号作出积极反应的生产体系。

（4）无论必需品过剩、购买重点转移还是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发生，都极为集中和迅速，这是又一个重要特征。正在宣传粮棉不够，突然发现仓库不足。“老四大件”从1980—1982年的购买洪峰（每年零售量上升的百分点都达两位数），陡然跌入1983年的低谷（如收音机从上年增长17.9%跌到下降15.2%，缝纫机从上升23.0%跌到下降10.6%），致使许多受“景气信号”刺激的企业措

手不及。目前，浪潮又涌向新兴家用电器，据调查材料推算，全国城镇居民手中有近300亿购买力集中在“新六件”（录音机、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电风扇、照相机）上，其中准备用于购买彩电的占24%。

这样的需求格局，生产体系非常难以应付。时兴产品的寿命周期过于短暂了：初期投入时市场反应并不强烈，但紧接着就是急剧的膨胀和扩张。一般来说，愈是耐用消费品，产业链条愈长，生产能力的形成愈需要时间。购买洪峰来得过于迅速和集中，根本无法带动国内产业。等到各地竞相引进成品和生产线，市场又趋于饱和，新的过剩马上来临。我们把这种状况称为市场的“同步性震荡”。

形成“同步震荡”的原因比较复杂。归结起来，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平均化，从而使消费过程缺乏层次和梯度；必需品供求机制尚未理顺，许多重要的消费通道没有得到开辟（如城市住宅），限制了一部分需求的正常增长；社会交往结构过于单一，同收入层中没有形成众多的各具特性的消费集团；加之消费示范和引导无力，助长了盲目攀比的社会心理。

当前消费品市场的以上特征，既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必须有一个早就该有的结构变革，又反映了

完成这个结构变革具有相当的难度。

由于市场机制不发达，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不健全，向新成长阶段的演进趋势不仅不能充分表现出来，而且时时受到一些因素的扰动。1984年下半年后，一些市场重新出现绷紧的现象。若干城市发生的涌购风潮，在某些时间区段里甚至波及到必需品。因此引起总需求膨胀的判断。研究和政策的重心不得不转向总量控制，只好把结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由于分析方法不同，必需品过剩的结论本来就没有被普遍接受，市场小有波动便使人感到不踏实。不过，还是可以看到，货币投放量增长过猛等因素，并没有改变市场的基本矛盾即结构性矛盾，并没有改变我们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严重不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事实。种种扰动，只是掩盖了必须根本变革产业结构的紧迫性，暴露了市场体制和供求机制方面更严重的问题。这就提醒我们，我国若不全面改革国民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就无法顺利完成结构变革。总量控制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对总量失衡的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会把决策引向用短期行为尽快恢复总量均衡的方向。而当扰动平息之后，国民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如故。因此，当前问题似乎不应当仅仅归结为一个宏观控制问题，更不能把宏观控制的目标仅仅局限在恢复原结构下

的总量均衡。我国必须不失时机地发动国民经济的结构改革，并为此进一步推动原有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应当看到，新的体制和机制常常在原有体制无法平稳运行时才使社会感到有建立的必要。在这个意义上说，最危险的还不是总量失衡，甚至不是某种限度内的“失控”，而是我们不能通过体制改革而在总量失衡中抓住变革国民经济结构的机会。

本书正是从我们面临的经济任务来把握改革同发展的关系的。事实上，尽管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改革能够脱离它的经济任务，但鉴于改革事业、特别是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事业无一例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手段不断地异化为目的的可能性还时时存在。有鉴于此，我们特意强调中国的改革必须牢牢服务于向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的转折。

以上分析，使我们对我国国民经济以结构变动为中心的新成长阶段，有了更确切的认识。所谓新成长阶段的基本经济内容，就是国民经济的增长，要以非必需品的增长为主要动因。这是已为各国经验所证明的一般趋势。但是我国进入这个成长阶段，与先行的发达国家不同，不是单靠自身获得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进步来推动的，而是象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不得不借助于外来的技术和知识，并

受到外部消费模式的强烈影响。因此，我国经济新成长阶段的结构变革，就有可能成为能够通过发展战略的抉择、体制改革和政策手段自觉实现向更高的发展水平转折的过程。

非必需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消费方面具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和替代弹性；在生产方面，不同的选择对资源约束、产业带动效应、就业弹性以及国民收入的增长有着很不相同的影响。我国在新成长阶段的主要困难，在于必须依靠非必需品的需求来推动经济的成长，同时又要避免这种需求完全脱离本国的资源条件，对本国的产业发育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新成长阶段，我国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是，如何在严峻的资源约束下，把满足非必需品需求的结构变革和实现众多人口的积极的充分就业结合起来。同许多国家的情况相比，我国在结构变革的同时，还必须启动并完成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结构变革与机制变革的叠合，表明我国在新成长阶段中将面临高难度的问题，要求我国凭借对自身的深刻认识，审时度势地来求得最优解。

第二章
经济结构变革的国际经验

2-1 理论史：经济学对结构问题的发现

结构变革是现代化过程中一种最普遍的现象。因此本章简明地讨论有关国际经验的总结，对于进一步认识中国问题可能是有益的。

已有研究表明，在人均收入和结构变革之间存在着有规律的联系。经济学发现了这种联系，从而使各国的结构变革经验得到逐步完备的总结。

17 世纪的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已经注意到，大部分人口从事制造业和商业的荷兰，人均国民收入要比当时欧洲大陆其他国家高得多。他指出这种产业间相对的“收入差”，会推动劳动力向更高收入的部门移动*。在经济学说史上，这个论断被称为“配第定理”。

* 《配第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出版社1981年版。

过了一个世纪，C·G·克拉克计算了二十几个国家各部门劳动投入和总产出的时间数据*，以其开创性的统计研究，验证了配第的发现。他的结论是：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次产业移动。总的结构趋势是：劳动力在第一产业的分布减少，在第二、第三产业的分布增加。后来，人们把这个结论通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它奠定了分析产业结构变革的基本框架。

当然，用后来的眼光来看，经济资源在各部门配置的变化不应只用单一的劳动力要素的分布来衡量。因此，各国结构变革经验更进一步的总结，就有待于经济理论及方法更进一步的发现。

两项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研究成果，大大推进了这方面的进展。

一项是西蒙·库茨涅茨的研究。这位被称为“GNP之父”的经济学家特别擅长于国民收入的统计。他在克拉克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和整理了欧美主要国家的长时间统计数列，不仅从劳动力方面，而且从国民收入方面对结构变动作了分

* 《经济进步的条件》，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40年版，第5章。

析研究。库氏的成果已不限于观察值的利用，而且对截面数据和历史数据进行了统计回归，以得出一些“基准点”的信息而更富于一般性。

表2—1是库茨涅茨得出的1953年和1965年两套截面收入分布结构的基准点价值份额。表中“A部门”代表农业部门，“I部门”代表工业部门，“S部门”代表服务部门。要注意在这里库氏把电力、煤气、供水、运输、邮电等产业都列入I部门，而在后来的分类中，一般都列入S部门即服务部门之内。

表2—1　1953和1965年截面（%）在按人口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基准点价值（1953年美元）上的份额

	A部门 (1)	I+S部门 (2)	I部门 (3)	S部门 (4)	制造业 (5)
65美元					
1953	50.3	49.7	17.9	31.8	8.6
1965	46.7	53.3	21.4	31.9	11.0
135美元					
1953	40.7	59.3	23.9	35.4	12.8
1965	38.0	62.0	26.3	35.7	14.2
270美元					
1953	28.5	71.5	34.1	37.4	20.1
1965	26.3	73.7	35.1	38.6	20.9

450美元					
1953	20.2	79.8	41.7	38.1	24.9
1965	18.1	81.9	48.0	33.9	26.0
900美元					
1953	12.6	87.4	60.1	27.3	29.1
1965	11.1	88.9	51.7	37.2	31.4

资料来源：西蒙·库茨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5～196页。

这样的处理使得通过一幅简洁的表格即可把握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变化的一般特点，它对于总括几十个国家（当时是32个国家）的经验，但从中撇开了各个国家最为特殊的因素而仅仅保留其统计的抽象，显然是非常适用的。"配第－－克拉克定理"揭示的结构变化推动既然源于产业间的相对收入差，那么库茨涅茨进一步揭示了国民收入分布的变动规则当然就更加有助于对结构演化的把握。

另一项重要的进展是瓦西里·列昂节夫的投入产出模型方法。它使更复杂的国民经济结构的分析变得容易起来。这一方法对于观察发展过程的必需条件和指导未来，都有重要的价值。例如表2—2是一个"欠发达"的经济结构，表中数字是经过整理的一个实际国家的数字，它反映了人均收入水平低下时经济结构松散、产业间互相依赖弱，产出大部分直接变为最终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种类更多和规模

更大的中间产品在部门之间发生交换。用投入——产出法加以考察，就是部门结构的联系更为完整。这时表2—2的经济可能发展为表2—3所示的经济。

表2—3的数据也是从一个实际国家的数字整理而得的。它的国民产品已达到表2—2的四倍多、产出的构成已转向加工和服务业，产业间交易已变得较为复杂和数量上相对较大，并有新的部门进入经济结构。

对比以上两表，可以看到经济转变时期许多明显的结构变化。

经济学的进展以及统计方法、统计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使得各国结构变革的实证研究空前充实了。虽然迄今为止谁也不敢说对现代经济过程最重要的特征——结构变革，已经有了尽善尽美的把握，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经济发展并非格式单调地在数量方面扩大原有传统的经济。它首先意味着在产出构成、资源分布以及对外贸易方面的变化。市场的扩大、企业和工人专业化功能的日益发展、城市和地区发展网的扩展，都反映了对国内及国际需求变化和成本条件变化作出的不同反应。后者受到技术进步的转移和当地发现、由经验而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国家对产品和要素市场干预方式的改变等影响。

经济科学关于发展中的结构变化规律性的持续探索，为我们比较国际经验、认识中国的结构变革特点，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出发点。

2-2 “世界发展模型”的一般结论

本世纪70年代以来，结构变革的研究深入到更广泛的领域。本节简要介绍霍利斯·钱纳里及其助手的主要研究成果：《1950～1970年的发展类型》（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

钱纳里使用的方法仍是库茨涅茨的统计归纳法，但他处理了101个国家在1950～1970年间的资料。除了使用国民总产值统计方法的国家和1960年时人口少于100万的小国，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战后的这段重要发展历程的经验信息，都被包容到“发展模型”这个连贯的分析构架中去了。

“发展模型”的分析要点集中在资源的转移和分配的主要特征上，这些特征对于支持进一步的增长是必需的，并对发展政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由于使用了统一的计量经济框架来处理这些特征，就可以对结构变化过程大量相互关联的各种类型作出连续的描述，并且可以从采取不同发展战略的不同

国家的发展模式中识别出系统的差异。

“发展模型”的基本假设是：(1)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消费者需求的构成将发生变化，食品份额下降，制造品的份额提高；(2)资本（实物的和人力的）积累以超过劳动力增长的速度增长；(3)技术进步对各国都是普遍的；(4)存在着可利用的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的通道。

钱纳里认为最重要的是在经验观察和理论演绎之间建立起联系。他和他的助手从大量观察值中选择了十个基本经济过程来刻画发展，并判定几乎所有国家发展的基本特征都表现在这些过程之中。这十个过程为27个变量所规定。然后将收入水平和人口数作为外生变量对所有这些过程进行一致的统计分析，从而为研究需求变化和资源配置的相互依赖性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为了更广泛地适用于各国和各个过程，“发展模型”使用的统计程序以如下几个基本的回归方程为度量所有过程的基础：

$$X=\alpha+\beta_1\ln Y+\beta_2(\ln Y)^2+\gamma_1\ln N+\gamma_2(\ln N)^2+\Sigma\delta_i T_i \qquad (1.1)$$

$$X=\alpha+\beta_1\ln Y+\beta_2(\ln Y)^2+\gamma_1\ln N+\gamma_2(\ln N)^2+\Sigma\delta_i T_i+eF \qquad (1.2)$$

其中X为从属变量；Y为以1964年美元计算的人均

GDP；N为人口（单位是百万）；F为净资本流入占GDP的比重；Ti为时间（i=1,2,3,4）。

表2—4提出了一个发展模型的复合图像，它是由公式（1.1）回归得出的一个“标准结构”。

“标准结构”对从人均GNP100美元到1,000美元发展区段的经济变化，得出了重要的描述性结论。总结构变化的75～80%发生于这一区段，其中最重要的积累过程和资源配置过程，都将发生显著的、有深远影响的变化。

积累过程

为了全面地刻画积累过程，需要对资本的总存量、存量的增量以及为产生这些增量所用的资源都加以考察。“发展模型”通过对总投资和入学率、储蓄、净资本流入、税收、政府收入及在人力资本形态上的教育支出等七个变量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再一次验证了发展中国家在较长时间序列内边际储蓄倾向高于平均储蓄率的假设。几乎在全部国家积累过程的测度中，都存在着显著的、国际性的时间趋向。见（图2—1，2—2，2—3）在1950～1954到1965～1969这十五年间，101个观察国的投资、储蓄和政府收入平均上移了7%，入学率平均上升了12%，教育支出平均上升了45%。

表2—4　　世界发展模型的“标准结构”

Y	小于$100	$100	$200	$300	$400	$500	$800	$1,000	大于$1,000	总变化	中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S	103	.135	.171	.190	.202	.210	.226	.233	.233	.130	200
2 I	.136	.158	.188	203	.213	.220	.234	.240	.234	.098	200
3 F	.032	.023	.016	.012	.010	.009	.006	.006	.001	—.031	200
4 GR	.125	.155	.181	.202	.219	.234	.268	.287	.307	.182	380
5 TR	.106	.129	.153	.173	.189	.203	.236	.254	.282	.176	440
6 EDEXP	.026	.033	.033	.034	.035	.037	.041	.043	.039	.013	300
7 SCIEN	244	.375	.549	697	.694	.735	.810	.842	.863	.619	200
9 C	.779	.720	.686	.667	.654	.645	.625	.617	.624	—.155	
10 G	.119	.137	.134	.135	.136	.138	.144	.148	.141	.022	
11 Cf	.414	.892	.315	.275	.248	.229	.191	.176	.167	—.247	250

（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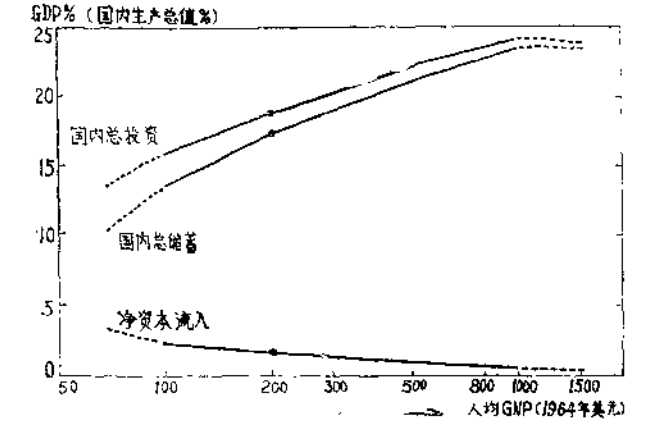
Y	小于$100	$100	$200	$300	$400	$600	$800	$1,000	大于$1,000	总变化	中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2 Vp	.522	452	.327	.286	.228	.202	.156	.138	.127	—.595	200
13 Vm	.125	.149	.215	.251	.276	.294	331	.347	.379	.254	300
14 Va	.053	.061	.072	079	.085	.089	.098	.102	.109	.056	300
15 Vs	.300	.338	.385	.403	.411	.415	.416	.413	.386	.086	
16 E	.172	.195	.218	.230	.238	.244	.255	.260	.249	.077	150
17 Ep	.130	.137	.136	.131	.125	.120	.105	.096	.058	—.072	1,000
18 Em	.011	.019	.034	.046	.056	.065	.086	.097	.131	.120	600
19 Es	.028	.031	.042	.048	.051	.059	.058	.067	.059	.031	250
20 M	.205	.218	.284	.243	.249	.254	.203	.267	.250	.045	250
21 Lp	.712	.658	.557	.489	.438	.395	.300	.252	159	—.553	400
22 Lm	.078	.091	.164	.206	.235	.258	.303	.325	388	.290	325
23 Ls	.210	.261	.279	.304	.327	.347	.396	423	.473	263	450

（续）

Y	小于$100	$100	$200	$300	$400	$500	$800	$1,000	大于$1,000	总变化	中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4 URB	.128	.220	.362	.439	.490	.527	.601	.634	.656	.630	250
25 BR	.459	.446	.377	.338	.311	.291	.249	.229	.191	—.268	$50
26 DR	.209	.186	.135	.114	.103	.097	.091	.080	.097	—.112	150
27 DIST	.502	.541	.657	.554	.547	.538	.511	.494	.458	—.044	
	.158	.140	.129	.127	.128	130	.138	.143	.153	—.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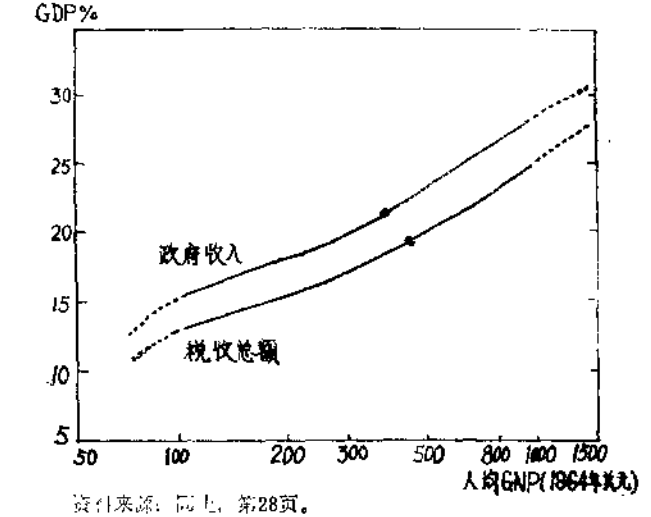
说明：（1）表中第1列为比较项目指标名称的英文缩写。顺序为：1—国民总储蓄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国民总投资占GDP的%；3—资本流入（商品和劳务的净进口）占GDP的%；4—政府收入占GDP的%；5—劳收占GDP的%；6—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7—小学和中学的入学率；8—私人消费占GDP的%；10—政府消费占GDP的%；11—食品消费占GDP的%；12—第一产业产出占GDP的%；13—制造业占GDP的%；14—基础设施占GDP的%；15—服务业占GDP的%；16—出口占GDP的%；17—初级产品出口占GDP的%；18—制成品出口占GDP的%；19—劳务出口占GDP的%；20—进口占GDP的%；21—初级产业劳动力的份额；22—制造业劳动力的份额；23—服务业劳动力份额；24—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5—出生率；26—死亡率；27—20%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40%低收入人口占总收入份额。（2）第2列及10列以系区段的中位数；（3）11列等于第10列减第2列；（4）第12列系以之中值时的人均收入数。

资料来源：H.Chenery、M.Syrquin《PATTERNS OF DEVELOPMENT. 1950—1970》，第3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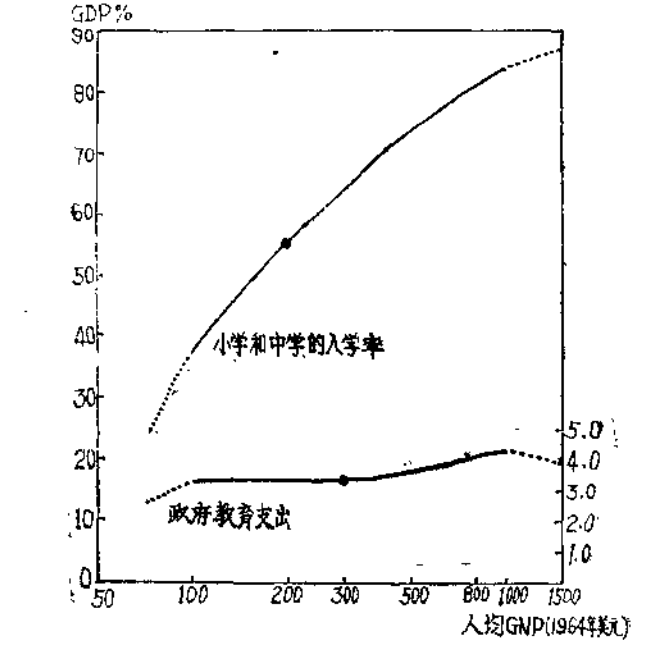
资源来源：同表2—4，第27页。

图2—1 “发展模型”投资、储蓄和净资本流入回归曲线



资料来源：同上，第28页。

图2—2 “发展模型”政府收入和税收回归曲线



资料来源：同表2—4，第29页。

图2—3 “发展模型”入学率和政府教育支出回归曲线

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过渡阶段，三个积累过程的变化发生得要早一些。当收入达到人均200美元时，储蓄、投资和入学率总增长的一半已经完成，在收入为700美元时，则完成了90%。这种在过渡阶段迅速增长然后逐渐减缓的特点，与发达国家的早期经验是一致的。

税收和政府收支的增加表现为相对滞后的过

程，在人均收入达到400美元时，它们还没有达到中值点。如果减去转移支付，政府收入将稳定地从人均收入70美元时占GNP的13%，提高到人均1500美元时的23%。

在过渡阶段，积累变动的最大动力是资本流入量。典型的变化是从最低收入水平上占投资的25%，下降到200美元收入水平上占投资的10%，以及到400美元时的5%。

资源配置过程

为了系统地分析各个资源配置型式之间的相互依存，需要尽可能地将生产部门按初级产品和制造品的交易统计区分开来。这方面，“发展模型”共利用了13个变量来考察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各自发生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

用标准回归方程拟合的曲线（见图2—4，2—5，2—6），非常直观地显示出需求结构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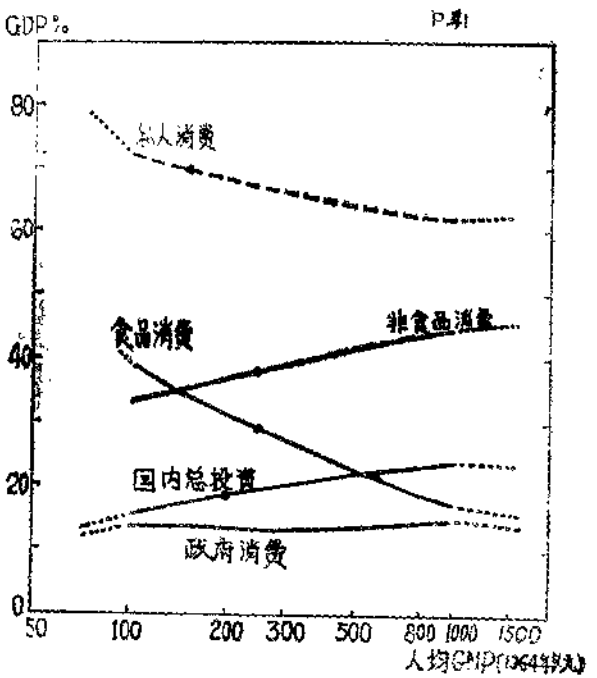
（1）在整个时期，食物消费的增长仅为收入增长的一半；

（2）与食品消费份额从占GNP的41%下降到20%相应的是，投资的份额翻了一番，非食品消费增加了70%；

（3）非食品加工的工业产品份额翻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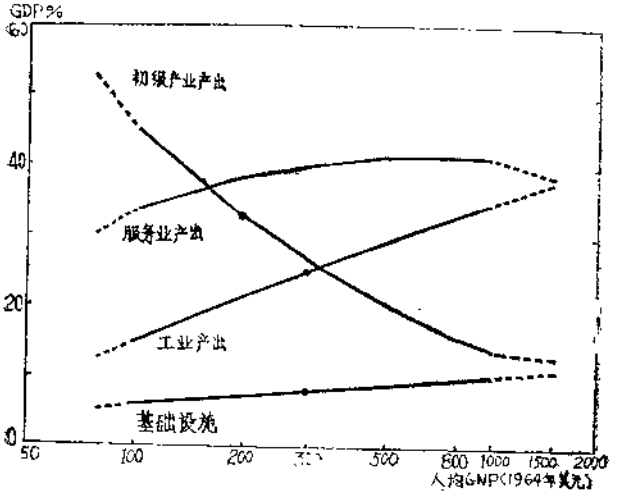
（4）初级产品的出口从占GNP的13%下降到6%，而进口则从4%上升到6%；制成品出口则从占GNP1%增长到13%。

上述变化决定了生产结构的总变化：初级产品的附加价值从占GNP52%下降到13%，几乎是食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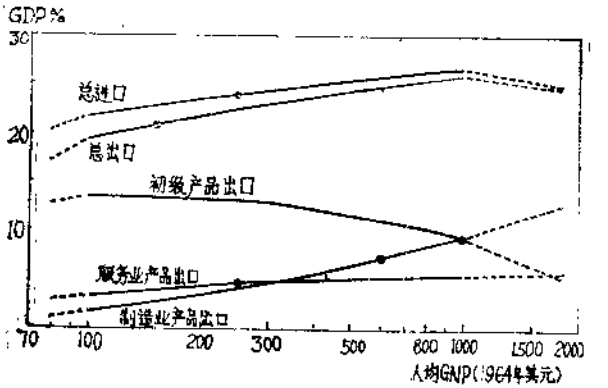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同表2—4，第86页。

图2—4 “发展模型”需求结构回归曲线



资料来源：同表2—4，第36页。

图2—5 “发展模型”生产结构回归曲线



资料来源：同上，第37页。

图2—6 “发展模型”贸易结构回归曲线

需求减少的两倍，而工业产出的增长则大大高于国内需求的增长。

由于国家规模和天赋资源的影响，各国国内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致性较高，而对外贸易构成的变化则最不一致。这是值得我们在分析中国问题时注意的。

总之，需求和生产构成的改变在收入水平为300美元时已初见端倪。当越过人均300美元的临界点之后，工业的增值一般才会超过初级产业的增值。

人口和收入的分配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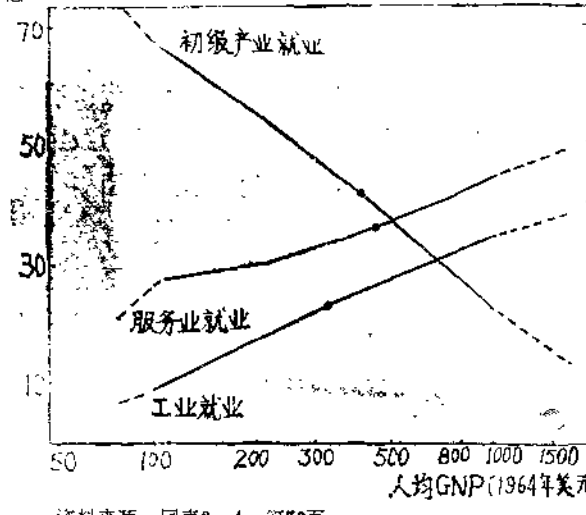
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受制于以下因素：不同部门和不同生产方式的相对发展；劳动力的数量、教育程度和在各部门配置的变化；不同集团拥有的财产数量和相对储蓄率；社会平等机制的发展。

如果假设各个产业部门的生产函数、要素价格及进入条件都一样的话，那么就业的变化就可被视为完全是由产出结构变化的形式决定的。但是事实上存在着种种非均衡的影响因素。如城市地区劳力需求迅速增加；要素报酬的平均化受到非流动性及对资本、土地和其他基本要素占有不平等性的阻得；投资和技术进步集中于现代部门；劳动力供给的增

长大大超过了经济中有组织的部门对劳力需求的增长；等等。这一切都使得就业结构的变化复杂起来。

但是统计分析的结果还是相当有规律的。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初级产业提供了总产出的52%和就业的71%。随着收入的提高，初级产业的产出份额下降快于其就业份额的下降，表现在投资和技术进步集中在工业，而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不断积累（见图2—7）。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均200～500美元阶段，初级产业与工业、服务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



资料来源：同表2—4，第50页。

图2—7 “发展模型”就业结构回归曲线

差距最大，收入分配也最不公平。表2—3表明，在人均收入300美元时，最低收入组的收入份额从占GNP的15.8%降至12.7%，而最高收入组则从50.2%上升为55.4%。这几乎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最迅速、社会调控最困难的一个阶段，能否顺利地通过收入差来调整产业结构，对长期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当人均收入超过700美元后，工业中的就业才开始超过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一旦达到人均收入1,500美元，初级产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份额降为15%。此时，人口在不同产业间的持续流动使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趋同，工业和服务业所占用的劳动力份额越来越大，日益接近其所占有的产出份额。直到越过人均收入1,500美元之后，生产和劳动使用的形式才开始呈反方向运动。

城市化

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而发展的，因此它也是积累、资源配置、就业和收入结构变化的一种结果。不过，发展中国家向城市的移民数量往往超出了城市实际的需要，表明城市化越来越多地受预期收入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将城市化视为一个独立的发展过程。

标准回归的结果是：人均收入500美元时，一半以上的人口为城市人口，只有达到人均收入2,000美元时，城市份额才稳定在75%左右。

“发展模型”通过统计分析得出的一般结论，对于认识各国经济结构的变革经验有重要的价值。当然我们都清楚地知道，任何一条逻辑曲线无论对多少发展过程提出多么令人满意的说明，也仍然有必要运用更具体的资料对这一略为简单的形式进行修改。

2-3 结构变革中的大国特征

国家大小不同和天赋资源的不同，对结构变动的可行道路具有不同的影响。大国可以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就进入结构变动迅速时期。如达到工业化的最高速度（以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例的增长率来度量），大国在270美元（1970年美元，下同）；拥有少量资源的小国在630美元；拥有丰富资源的小国则在580美元。可见，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之利的大国，达到产值结构最迅速变化阶段的时间可以早于其他类别国家。

进一步归纳大国的一般情况，可能获得认识我

国特点的更大信息量。钱纳里在“标准结构”的基础上，又从24个半工业化大国（都是人口多、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和工业化已取得实质进展的国家）的数据分析中得到大国的一般结构，然后他把大国结构同“标准结构”对照，发现各种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差距。表2—5表明在选定的收入水平上，“标准结构”和“大国模型”积累和分配过程的差异，及其各自的标准估计误差。

表2—5　人均GNP400美元时的大国结构与标准结构的比较

	初级产业比例	整个工业比例				服务业比例
		小计	轻制造业	重制造业	建筑和基础设施	
“标准结构”	20.6	39.5	15.8	8.6	15.1	39.9
大国一般结构	16.4	45.3	16.6	13.0	15.7	38.3
差　距	—4.2	5.8	0.8	4.4	0.6	—1.6

资料来源：H.Chenery, «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The Experience of Large Countries», P21.

表2—6则是大国与小国在不同收入水平时的结构比较。

从比较中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国家规模与一定收入水平的国内需求结构的关系不大，但同对外贸易之间，则存在反向的关联。当人均收入300美元时，人口规模每增加一倍，出口份额则下降3%，

表2—6　　不同国家规模的结构差异

	$200		$500		$800		R^2		SEE	
	大国	小国	大国	小国	大国	小国	大国	小国	大国	小国
S	.181	.144	.218	.186	.228	.208	.537	.776	.050	.047
I	.201	.168	.231	.204	.237	.225	.425	.461	.050	047
G	.158	.194	.215	.245	.265	.275	.676	.649	.053	.047
E	.123	.250	.131	.285	.140	.296	.380	.154	.052	.131
Ep	.083	.186	.049	.151	.043	.180	.633	.042	.028	.007
Vp	.028	.034	.049	.072	.061	.096	.451	.332	.039	.072
Vm	.320	.323	.187	.204	.139	.160	.886	.693	.057	.087
C	.250	.192	.328	.272	.367	.315	.731	.699	.056	.057
	.708	.701	.651	.666	.639	.645	.481	.607	.070	.065

说明：S—国内总储蓄占GDP%；I—国内总投资占GDP%；G—政府消费占GDP%；E—总出口占GDP%；EP—初级产出出口占GDP%；Vp—初级产出占GDP%；Vm—制造业产出占GDP%；C—私人消费占GDP%。

资料来源：《1950—1970年世界发展模型》，P75。

因此大国的开放度一般偏低。

这样，就需要大国在经济发展的较早阶段开始改造他们的经济结构。由于存在着足够规模的国内市场，大国也容易做到这一点。表中可以看出，在人均GNP200～800美元之间，大国的工业比重比小国高出5～6个百分点。显然，在基础冶金、造纸化工和橡胶等产业部门里，规模经济是十分重要的。

大国的净资本流入量较低，但储蓄率较高，结果投资水平仍比小国高出15%。这本身又构成了对大国经济增长较快的主要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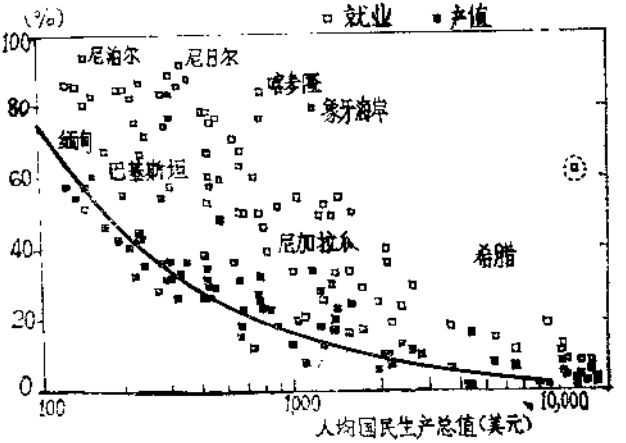
作为早期工业化的结果，大国拥有较多的工业劳动力并达到了较高的教育水平，投资份额大且一般占有着多种资源，因而绝大多数可度量的经济因素都明显有利。但是所有这些都可能被更大的政治和管理方面容易遇到的困难所抵销。因此，大国在发展过程中的优势，并不是由其规模天然赋予的，而取决于有组织的人为努力。

2-4 中心线索：农业份额的下降

通常伴随经济增长引起的结构变革，几乎都会引起全部重要的经济过程、经济变量及其相互关联

的深刻变化。对于不同的收入水平而言，结构变化又具有不同的特征。因此结构分析不能不涉及经济领域内纷繁复杂的诸方面。为了便于把握各国经济结构变革的丰富经验，本节集中刻画在结构变革中经济资源配置的最显著趋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份额的下降。

人们早就注意到随产业革命深入而出现的农业份额下降，即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下降的事实。特别是在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发达水平的演进中，农业份额下降更具有无可辩驳的统计确切性和显著性。图2—8是1980年各国农业份额的统计分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第43页。

图2—8　1980年各国农业就业和产值所占份额

图中曲线尽管是对1980年各国截面数据的回归，但反映的却是不同类型国家经济成长中共同的过程性特征。据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标，全部低收入国家的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1980年为37%，比1960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农业就业比重为72%，比1960年下降5个百分点。中等收入国家这两个指标的下降幅度要更大一些，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14和15个百分点，上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7和19个百分点。发达国家由于农业份额已经很小，因此下降幅度要小一些，分别为3和12个百分点。另据国际劳工组织对92个发展中国家的调查，这些国家在1960—1980年间，农业产值份额从30.9%下降为17.3%，农业就业份额从72.6%降为59.1%。

从收集到的若干典型国家更长的时间序列数据来看，情形更是如此。美国1830年时，农业在实际收入中所占比重为34.7%，在就业中所占比重为70.8%，100年后分别降为12.7%和22.5%；英国1840年时农业就业人口占22.7%，80年后只占7.1%；德国农业就业比重1880年为39.1%。日本在1870年时为84.8%，到本世纪30年代分别降为22.2%和50.3%。

反例也有。1980年全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GNP)在1,000美元以上的65个国家中，农业劳动力占40%以上的共有11个，其中7个国家在50%以上。最极端的例子是沙特阿拉伯，1980年人均GNP为11,260美元，但农业就业比重高达61%。(农业产值份额则为1%)，这显然是由于极为特殊的资源条件和市场条件造成的。但即使在这些国家，农业份额下降的趋势也已开始出现。1960—1980年，上述11个国家的农业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都是下降的，幅度分别在6—43%和6—24%之间。这同一些发达国家的早期经验是一致的。例如，澳大利亚、丹麦、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直到本世纪初还是农业所占份额最大，但在工业化推进之后的一个时期里，农业份额就不可遏止地下降，到本世纪六十年代，这些国家的农业产值比重大体都落在6—13%左右，就业比重落在11—13%之间；在1960—1980年期间，分别又下降了2—9%和5—21%。

农业份额随经济增长的下降，受到两种动力结构的作用。第一，增长的速度受到对农产品需求增长的限制。除了个别国家外，所有国家对农业的需求中90%是食物，而这种需求的增长又依次受到收入增加时用于家庭食品费用所占比例下降趋势的限制。一个人均收入为240美元的印度家庭要把他们的60—70%的收入用来购买食物；而在人均收入10,000

美元的加拿大，人们仅以不足20%的收入来购买食物。这是很普遍适用的道理，即所谓恩格尔定律*。

当然，如果某些社会和国家收入广泛增长并出口剩余产品，那么国内需求增加限度对农业增长所产生的限制界限也可能突破。不过这样的突破也有一定的限度，因为恩格尔定律既适用于个别国家，也适用于全球范围。

至于非食用的农产品，则受到相应的工业替代品竞争的抑制，如合成纤维替代天然纤维，石油和煤替代木柴，等等。虽然这些工业替代品并不足以囊括全部天然产品，但投资和革新使它们的竞争力不断有所增强却是一个相当明显的事实。

随着自给性农业逐步让位于为市场而生产的农业，销售、运输、加工和包装等业务范围空前扩大了。这些活动逐步创造出比农业本身大得多的增加价值及就业的机会。这就是说，无论社会对食品还是非食品农产品的需求中，总有一个日益增大的流量是支付给农业以外部门的。

第二，由于采用了技术革新和投资的积聚，使农业生产率大为提高，从而相对地以至绝对地减少

* 1857年欧内斯特·恩格尔发表了一篇关于萨克森尼王国生产和消费情况的研究报告。恩格尔在报告中提出，用于食物的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例随收入递增而减少。这项发现由于其普适性而被称为Engel定律。

了农业劳动力。其结果，是农村就业面和就业的多样化都扩大了。更多的劳动者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工业和服务部门去工作，增大了社会总财富，又相对降低了农业产出份额。

两大动力交互作用的结果，就是使农业份额下降，这在走向中等发达水平的过程中，比起经济结构诸多其他方面的变动来，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之间的相关程度更高，从而能够更准确地度量一国经济结构变动的程度。据H.Chenery和M.Syrquin的“发展模型”，在人均GNP100—1,000美元区段，食物消费份额的下降最为明显，与收入水平变动的相关程度最高（测定系数R^2为0.82），各国的一致程度也最高。而正是食物消费份额的下降，通常都引起需求结构中其他一些变量的如下变化：个人消费比重下降（其中非食物消费比重上升），积累比重上升。当生产结构对需求结构的变化作出反应时，也就使得初级品的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的下降较之制造业和服务业份额的变动更为显著，与收入变动的相关程度最高（R^2均为0.75），各国的差异也最小。同时，在贸易结构中初级品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也更显著一些。至于其他方面的结构变化，如教育、城市化、人口变动、社会收入的分布等等，虽然都同人均收入变

动相关，并与前述“需求——生产——贸易”的变化互为因果，但相关性较低，各国的不一致程度较高。因此，当我们从产业结构角度观察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动时，可以把农业份额下降看作向中等发达水平发展中经济结构变动的最敏感变量。

比较国际经验还需要强调一点，农业份额下降的正常趋势，决不意味着农业的萎缩和衰败。后者不仅不是国民经济结构变革的进步标志，而且还会酿成发展过程中的严重问题。

表2—7以70年代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20%以上的56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料，说明了农业在其份额下降的过程中，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却并没有降低。

表中有23个国家，70年代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每年超过5%，其中有17个国家的农业增长率每年超过3%；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率不到3%的17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的农业增长率只有1%或低于1%。另外16个只有中等增长率的国家中，有11个国家的农业和国内生产总值变化都不到两个百分点。

可见，在农业份额下降的同时把握住农业增长率的变化方向和幅度，是结构变革中一件困难而又重要的工作。

表2—7　　七十年代各国农业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表

农业的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5%以上		3—5%	3%以下
3%以上	喀麦隆	马拉维*	玻利维亚	利比里亚
	中国*	马来西亚	缅甸*	尼加拉瓜
	哥伦比亚	巴拉圭	马里*	塞内加尔
	多米尼加共和国	菲律宾	索马里*	
	危地马拉	泰国	坦桑尼亚*	
	印度尼西亚	突尼斯		
	象牙海岸	土耳其		
	肯尼亚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大韩民国（南朝鲜）			
1—3%	哥斯达黎加		孟加拉国	布隆迪*
	厄瓜多尔		中非共和国*	塞拉利昂*

（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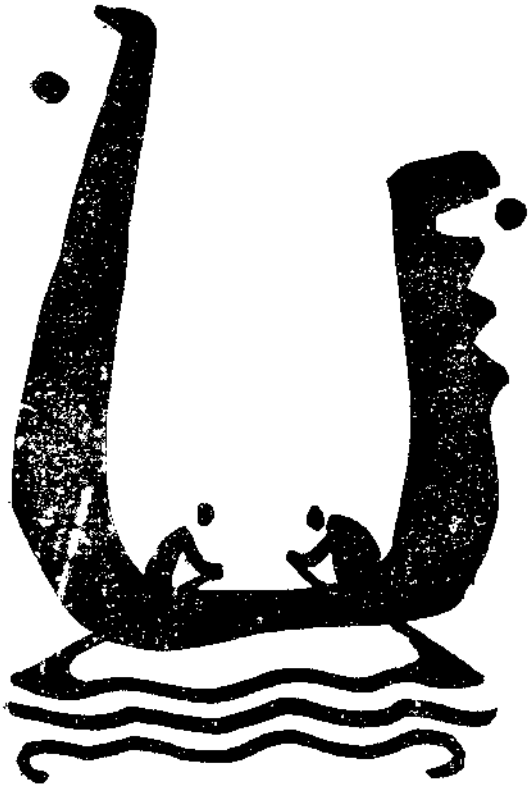
农业的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6%以上	3—5%	3%以下
1—3%	埃　及 莱索托	萨尔瓦多 海　地* 洪都拉斯 印　度*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苏　丹* 上沃尔特*	扎伊尔*
1%以下	摩洛哥 尼日利亚	多　哥*	安哥拉* 乍　得* 刚果人民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

（续）

农业的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5%以上	3—5%	3%以下
			加　纳
			马达加斯加*
			毛里塔尼亚*
			莫桑比克*
			尼泊尔*
			尼日尔*
			乌干达*

* 低收入国家。

资料来源：同图2—8，P45。



第三章
特殊的曲线：
中国农业份额
的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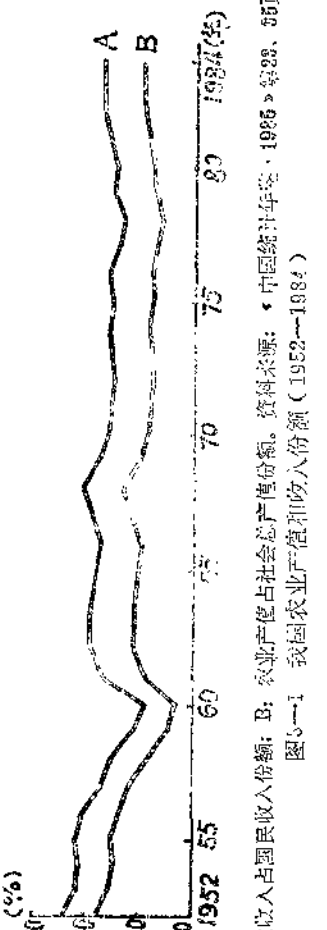
3-1 两组曲线组成的历史

迄今为止我国的农业份额偏大，这同所有低收入国家都是一样的。构成我国最显著特点的，是经历了几十年人均国民收入的较快增长之后，农业的产出份额和就业份额仍然保持着惊人的稳定。

从1953～1984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共增长了4.27倍，平均每年递增5.3%。在32年时间内，平均实现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不能算慢的。但是世界上凡是达到或接近这样的发展速度的国家和地区，农业份额都急速下降。唯独我国是一大反例。

先从产出份额来看。1952年我国社会总产值仅1,015亿元，国民收入仅589亿元；32年后，总量要分别扩张到13,004亿元和5,64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指数分别达到1,227.3%和732.9%，

年平均增长达8.2%和6.4%。可是同期农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从45.4%降为28.9%，农业创造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更慢，仅从57.7%降为44.3%。32年期间我国农业产出份额的变动曲线见图3—1所示。



A：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B：农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份额。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5》，第28、55页。

图3—1 我国农业产值和收入份额（1952—1984）

从图3—1看，我国农业份额的变动有以下几个特征：

（1）1953—1984年我国农业在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中份额的下降幅度极小，年平均下降仅为1.4%和0.8%；

（2）农业份额下降的趋势不能持续，大体由两段下降（1953—1960和1968—1978）和

两段上升（1961—1968和1978—1984）交替组成；

（3）农业份额的最低点分别为1960年和1978年，恰恰都是我国经济状况最差的年份；

（4）农业产值及收入份额的下降，不仅同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及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增长之间的相关程度很低（R^2分别为0.34、0.16和0.19），而且每次农业份额连续下降之后的一、两年内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增长率都有所降低，人均收入都有所减少（数据均见表3—1）。

换句话说，中国以往农业产出份额的下降，不仅没有起到它在大多数发展过程中所起过的积极作用，反而还直接引致国民经济形势的恶化。难怪在我们社会流行的经济学观念几乎从不区别农业的绝对产出和相对份额，并且习惯于把农业的任何一种度量的下降，都看作是消极的、不利的现象。

这种农业份额下降的特殊动态及其特殊后果，只有结合以下事实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在1952—1978年长达26年的时间里，我国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份额保持了惊人的稳定：乡村人口占总人口之比从87.5%降为82.1%，年均下降仅0.25%；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之比由31.7%略降至31.5%；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之比由81.0%降为76.4%，年平均也只下降0.56%（见图

表3—1　农业份额的变动和国民经济的总增长

（1952—1984）　亿元，%

年份	社会总产值	农业占社会总产值比重	社会总产值指数（以上年为100）	国民收入总额	农业占国民收入比重	国民收入指数（以上年为100）	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元)
1949	557	68.5		358	68.4		66
1950	683	58.2	122.6	426	67.4	119.3	77
1951	826	61.3	120.1	497	63.6	116.7	88
1952	1,015	46.4	126.9	589	57.7	127.2	104
1953	1,241	41.1	118.7	709	53.8	114.0	122
1954	1,346	39.7	103.5	748	51.9	105.3	126
1955	1,415	40.6	100.1	783	52.9	100.4	129
1956	1,639	37.2	117.9	882	49.3	114.1	142
1957	1,696	33.5	103.1	903	47.6	104.5	145
1958	2,133	24.5	142.7	1,113	39.3	122.9	171
1959	2,519	19.5	115.0	1,222	36.6	108.2	189
1960	2,679	17.1	104.7	1,220	27.2	98.6	185
1961	1,978	28.3	66.6	996	43.4	78.3	151
1962	1,809	32.5	90.0	924	48.0	93.5	139
1963	1,956	32.8	110.2	1,000	48.8	110.7	147
1964	2,203	31.7	117.5	1,166	47.1	116.5	167
1965	2,595	30.9	119.0	1,337	46.2	117.0	194
1966	3,062	29.7	116.9	1,536	46.6	117.0	218
1967	2,774	33.3	90.1	1,407	47.3	92.8	193
1968	2,643	35.1	95.3	1,415	50.5	93.5	193
1969	3,184	29.8	126.3	1,617	44.7	119.3	269
1970	3,800	27.8	124.1	1,926	41.3	128.3	295

（续）

年份	社会总产值	农业占社会总产值比重	社会总产值指数（以上年为100）	国民收入总额	农业占国民收入比重	国民收入指数（以上年为100）	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元)
1971	4.262	36.9	110.4	2.077	39.8	107.0	247
1972	4.393	35.6	104.4	2.133	38.9	102.9	248
1973	4.773	35.7	109.6	2.516	39.5	108.9	283
1974	4.959	36.3	104.9	2.543	40.5	101.1	281
1975	5.379	35.0	111.5	2.563	39.4	103.3	278
1976	5.433	35.4	101.4	2.427	41.0	97.3	261
1977	6.003	33.3	110.3	2.644	37.1	107.8	280
1978	6.846	32.9	113.1	3.010	35.4	112.3	315
1979	7.642	34.8	108.5	3.350	39.3	107.0	346
1980	8.513	35.5	109.4	3.688	39.1	106.4	376
1981	9.071	37.1	104.8	3.940	41.0	104.9	396
1982	9.963	38.0	109.5	4.261	43.9	108.3	423
1983	11.126	40.1	110.3	4.770	44.3	109.8	464
1984	13.004	38.9	113.8	5.643	44.3	113.9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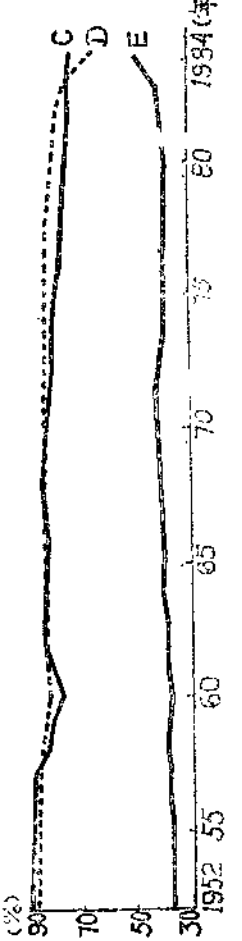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5》，第20、21、23、33、34、35页。

3—2)。1952年我国农业部门人口为477.02万，非农业部门人口为97.8万，两者之比为49比10；1979年这两个部门的人数分别为807.39万和163.53万，两者之比居然同1952年大致一样，仍为49比10。

把图3—1和图3—2叠合起来，不难发现1978年以前我国农业产值份额和收入份额的下降，一直是

在农业人口和就业份额基本不变的条件下发生的。其直接后果，就是份额基本未变的农业人口提供的产值和收入份额都降低了。由此不难解释我们农业劳动生产率何以在技术装备大量投入的情况下依然停滞甚至时有下降。

根据舒尔茨的研究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农业产量的大幅度增长有三个主要来源：（1）以教育和改善农民健康状况为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通过积极的技术变化对农业产量有很大贡献；（2）农业领域对物质资本的投资；（3）高产



C：农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份额；D：乡村人口占总人口份额；E：农业劳动者占乡村人口份额。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81、107、109页。

图3—2　我国农业劳力和人口份额（1952—1984）

作物的采用。但是有人将中国数据代入一个有四种投入量（即土地、劳动、资本和目前投入量）的库柏……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却发现1952～1980年间，中国农业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中，约有80%以上不是通过上述三大“舒尔茨推动”，而是通过使用更多的目前投入量和劳动来实现的。* 对于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阶段而言，农业的这种低效增长形式，显然有助于说明它对国民经济更快增长的阻滞作用。

总之，我国长久地保留着低收入国家的最显著特色，这就是农业份额过大。由于人口众多，我国农业就业份额又代表着一个惊人巨大的绝对量：1982年我国拥有7.97亿农民，3.84亿农村劳动力，差不多占全世界农村人口及农业劳动力的30%；等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所拥有的农村人口和农民劳动力的40%以上。如此众多数量的农民的存在，构成当今世界最大的独一无二的社会实体。中国农民经济活动的效率和去向，已经并将继续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变动进程，打上一个远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深刻的印记。

1979年以后，我国农业份额的情形有了改变。

---

* 转引自邹至庄著：《中国经济》，南开大学1986年版，第115～125页

乡村人口份额从70年代末以前一直稳定不变的80%以上降到1984年的68.1%，农业就业份额的下降更明显加剧，估计这5年农业劳动力份额年平均下降在2%以上，差不多是前26年平均下降率的四倍。有意味的是，在此期间我国农业产值份额和收入份额却是逐年上升的。*1984年农业在社会总产值中的份额比1978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其中农牧渔业上升了3.3个百分点，种植业上升了2个百分点）。这种情形表明相对减少着的农业人口和劳动者，提供了相对增加着的农业产出和收入，理所当然要引起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同时，这种增长型式比之于过去农业人口和劳动者份额基本未变时，农业产值（收入）份额的上升来，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机会成本也下降了。因此，它强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成长。新的问题如我们在本书导论中已提到的那样，是农业产值份额的上升不可能无限度进行下去，因为一旦越过了温饱满足的临界点，农产品消费需求在社会总需求中的份额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所降低。

---

*但是1980年后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牌市价差就开始缩小了，也就是农产品的真实价格下降。如果都用真实价格来衡量，那么1980年后的农业份额可能是下降的。不过这个分析还涉及到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产品价格失真的校正问题，因此这里仍以统计数字为据。

概括起来，我国迄今为止所经历的农业份额下降，或者是产值（收入）份额下降而人口（劳力）份额基本不变；或者是人口（劳力）份额下降而产值（收入）份额上升。这同农业份额下降趋势的普遍表现，即随着农业产值份额（收入）下降的同时农业人口（劳动力）份额也下降，是非常之不同的。我们把后一形态称为农业下降的正常形态，而把前两者都称为异常形态。区分的主要依据是它们对国民经济结构变动的作用和影响的差别性。

正常的下降形态，可以在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转移农业人口的同时，扩大那些比农业具有更高生产率的部门在国内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结构的现代化。特别是当农业就业份额的下降幅度，接近或等于其产值和收入份额的下降幅度时，结构变动的机会成本最小，所释放的结构生产力最大。

异常的下降形态，或者降低农业生产率，或者虽然也可能缓慢提高农业生产率，但却为此付出高昂的机会成本，即引起更高生产率部门的产出份额和收入份额的下降。这种变动形态难以发动国民经济结构变革，更不足以持续支持结构变动。

我国在经历了20多年高强度资源动员所进行的国家工业化之后，仍停留于低收入国家之列，多半

可以从我国农业份额下降的异常形态中得到说明。

3-2 反常现象之一：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

特殊的曲线造成特殊的“反常”现象。中国居民家庭开支结构中的恩格尔系数高居不下，既是整个结构变动缓慢的结果，又构成农业份额难以降低的原因。

在第2—4节中我们已经提到，恩格尔定律是以其普适性而闻名于世的。霍撒克甚至说：“这永远是这一专门领域中鼓舞后人的一个范例”。“发展模型”的统计验证也表明，食物消费占私人需求比重这一项指标，同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最高，各国的一致程度也最高。

但是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值偏偏长期居高不下。

表3—2记录了这种情况。分析这套数据可以看到：（1）1984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的名义“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97%和59%，几乎都属于联合国划分的绝对贫困国家之列*；但是考虑到我国居

* 联合国以食物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59%以上的为绝对贫困；50—59%为勉强度日；40—50%为小康水平；20—40%为富裕；20%以下为最富裕。

民（特别是城市居民）的相当一部分消费开支（如住宅）是隐蔽于社会福利形式之中，因此我国居民的实际“恩格尔系数”要比名义上的略低一些，调整的结果约在50%左右。

（2）即使如此，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同收入的水平相比，仍然偏高，因为在“发展模型”提供的标准结构中，人均GNP300美元时的食品消费比值为39.2%，比中国目前恩格尔系数的名义值和

表3—2　我国城乡居民家庭开支中的食品比重

（1957～1984）

年份	城市职工家庭人均			农民家庭人均			
	生活费支出(元)	食品支出(元)	%	生活费支出(元)	食品支出(元)	%	%*
1957	222.00	129.72	58.49	70.86	46.69	65.8	
1964	220.68	130.68	59.22	93.59	62.61	67.11	
1935				95.11	65.11	68.5	
1978				116.06	78.59	67.7	42.2
1981	456.84	258.84	56.66	190.81	113.83	59.66	59.9
1982	471.09	276.24	58.65	220.23	133.28	60.50	41.6
1983	505.92	299.52	59.20	248.29	147.24	59.3	41.4
1984	559.44	324.24	57.97	273.80	161.52	59.0	40.9
				317.42	183.33	57.76	39.3

* 为现金开支的食品消费占现金生活消费支出的比值。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1》，P429，P433；《中国统计年鉴·1985》P562—563，P572。

实际值，分别要低18.7和10.8个百分点。

（3）更重要的特点是我国恩格尔系数的变动率太低，在1957～1984年这27年时间内，城市职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仅下降了0.46个百分点，年均变动率只有0.03%，而同期这类家庭的人均生活费支出增长了1.52倍，年均变动率为3.48%；农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了6.8个百分点，年均变动率为0.4%，不过这类家庭的人均生活费支出变动也很大，在考察年间增长了2.86倍，年均变动率达5.13%。另一方面，如果以现金形态来考察，那么农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在有资料可查的1979—1984年间，平均变化率为0.52%，差不多只及同期包括非商品性开支在内的恩格尔系数变化值（年均2.27%）的1/5。

（4）从宏观图景上看，食品在国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也在长时间内几乎保持不变。198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99.2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10倍，但食品类占有的比重仅从56.5%降至53.4%，32年间只减少了3.1个百分点；其中历史最低点为1981年的51.2%，也仅比历史最高点（1952年的56.4%）降低了5.2。

如果用更精细一些的计量办法来度量我国在恩格尔系数变动方面的“反常”程度，那么结果是：

令人吃惊：邹玉庄利用1981年28省市农民家庭收支资料的截面数据，按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出4个回归方程，其中食物方程为：

$$\text{Logyil} = 0.587 + 0.790\text{Logxi} \qquad R^2 = 0.872$$
$$(0.313) \quad (0.039)$$
$$S^2 = 0.00650$$

这就是说，食物需求对总支出的弹性为0.79。

但是霍撒克提供的20年代中国北平、上海居民的食物弹性值即为0.591和0.617。撇去一些不可比的因素，中国人食物需求弹性系数的超稳定特性，是十分明显的。

让我们把形成这一重大“反常”现象的原因留到后面再分析。这里只是指出，作为通常推进农业份额下降的最主要动力结构——恩格尔效应，一旦反常地出现衰减，那么社会经济结构变革就将延迟。

3-3 反常现象之二：城市大工业扩张无力

作为国家工业化急速推进时期的又一个重大的“反常”现象，是我国的城市和大工业吸纳过剩农业人口的能力相对很弱，无法拉动并刺激农业人口

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和流动。

这首先是由一系列历史因素特别是人口结构的因素决定的。1952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与非农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之比为7.3:1。在此基础上，全国的总人口和总劳动力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9%和2.6%，其中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增长的年平均率为1.7%和2.1%。因此尽管社会非农部门就业在30年内每年平均增长4.5%，到八十年代初我国农业的就业比重乃占70%以上。

但是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选择不当也追加了不利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社会的再生产资源过多地投向了就业扩张能力弱的部门例如（1）重工业部门，这个部门平均每亿元投资提供0.5万就业岗位，只及轻工业的1/3，但1952—1980年得到的投资总额为轻工业的9.5倍；（2）全民所有制企业，这种类型平均每亿元投资吸收1万人，只及集体所有制企业的1/5，但全民所有制职工在1952～1980年期间增长的人数为集体所有制工人增长数的3.1倍。* 人为地强化了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积累使用的高有机构成投资方向。

---

* 冯兰瑞、赵履宽：《1977—1980年中国城镇就业和工资》，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二）尽管存在着种种信号歪曲的因素，农业同其他产业活动的生产率差和收入差依然一直引人注目。事实上农民在国家招工无望的条件下从未停止过对此作出自发的反应：自己出来卖手艺、打零工、务工经商。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 20 多年的时间里，这种合乎规律的动向一直受到压制。城乡户籍制度、口粮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外加对“小生产自发势力”（几乎成了一切非农就业、非农收入的代名词）的持续批判，牢牢地将农民捆在他们生身的土地上。农村之间的水平流动都强制、半强制地被禁示，更何况向城镇和高生产率部门的垂直流动。社会甚至形成了极为根深蒂固的偏见：农民的本分就是为国家工业化提供食物和原料，其他都被看成不务正业。这对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发生了长久的滞后性影响。

因此，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我国全社会的非农就业人数的增长率甚至是逐年递减的（见表3—3）。

城市和大工业还来不及充分地吸收农村多余劳力，它们自身的就业负荷就已十分沉重了。70 年代末，我国城镇待业人员2,000万，占当时职工总数的21.1%。1979年城镇新就业人数中，来自农村的劳动力70.8万，占7.8%；1983 年为 68.2 万，占

表3—3 我国非农就业人数及其增长

年份	绝对额(万人)	比重(%)	年平均增长%
1952	3,412	16	
1957	4,461	18	6.5
1962	4,632	17	0.7
1965	5,272	18	4.4
1970	6,619	19	4.6
1975	8,708	22	5.6
1980	11,605	27	6.0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85》P213数据整理，表中非农就业人数＝全社会劳动者人数—农业劳动者。

10.9%；1984年这一比重普上升为17%，但绝对数也仅123万。1984年我国农业就业人口的绝对数仍达3.25亿，几乎比1952年增加了一倍。

这同经济成长的常态当然有很大差别。通常人均收入的提高和需求及贸易的变化，会引起农村劳动力稳定地向城市转移。在"发展模型"中，城市人口比重与人均收入的增加之间有很高的正相关关系（$R^2=0.668$），各国的一致性程度也比较高（SEE＝0.127）。"标准结构"的人均GNP 500美元时，一半以上的人口成为城市人口。难怪《大英百科全书》中这样写道："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两种社会过程是互为因果的，两者都可以引起对方发生螺旋式的上升发展。"

据发展研究所白南生的研究结果，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有相对于工业化程度而超前的趋势。1950年到1980年，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平均每年递增3.4%，若不包括中国则达3.8%。城市人口正以几乎两倍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在增长。

但是以往中国的特点却是，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不足。1953年到1980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1.1%；工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份额从34.4%增长到57.4%，工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份额则从19.5%增至45.8%，分别增加了23和26.3个百分点。但同期城镇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57%，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仅提高了6.9个百分点。胡焕庸、张善余推算，在1949～1982年间中国城镇增长的人口中，60%都来自城镇已有人口的自然增长，只有40%来自移民。*

更深入地研究上述状况，我们还必须将包括在城镇人口中的农业人口剔除出来。1984年全国295个城市中，非农业人口为1.4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4%。这个更能说明城市化水平的数值表明，我国城市化不足与严重程度同工业化的迅速进展所构成的惊人反差，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比

* 胡焕庸、张善余编著：《世界人口地理》，华东师大出版社1982年版。

拟。

总之，我国工业的产值份额偏大而就业份额偏小，恰同农业的份额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城市化相对不足建立在这样的产业结构分布的基础之上（见表3—4），一方面为工业化的推进节约（或者更准

表3—4　人均GNP300美元时中国和“标准结构”及大国模型的工农业份额、城市化对比

	中国	“标准结构”	大国模型	中国偏离参照系的程度	
	1	2	3	1—2	1—3
工业产值份额	0.26	0.15	0.17	0.11	0.09
工业就业份额	0.13	0.09	0.22	0.04	—0.09
农业产值份额	0.42	0.45	0.46	—0.03	—0.04
农业就业份额	0.72	0.65	0.59	0.07	0.13
城市化	0.21	0.22	/	—0.01	
	0.14*			—0.08	

资料来源：根据表4—1。

确地说是延迟支付）了巨额的城市基础设施及管理投资，避免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过度膨胀”的病症发生；另一方面又减弱了一个农业大国全面变革经济社会结构的推动力，导致农业份额变动的异常形态和种种结构方面的畸形。

3-4 阻尼究竟产生于何处？

在一些发达国家的早期经验里，也有农业份额偏大的先例。比如澳大利亚、丹麦、意大利等等，直到本世纪60年代农业的产出份额尚在10%以上。特别是澳大利亚，1948年的农业产出份额居然和1935～1936年大致相同（22.6%），只是比19世纪60年代的份额（25.1%）略低一些。但是，这些国家差不多都在农业资源、特别是按人口平均占有的农业资源方面占据了明显优势。库茨涅兹总结道：这些型式“从具有高生产率的农业企业和大城市化国家的现成市场的结合中获益，离开了农业部门的发展，在一定的长时期内看不到有什么好处。”*

对比之下，中国是个人均农业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众多人口对土地旦就形成了举世注目的压力。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3弱，林地只及1/7，草原只及1/3，淡水则只及1/4。因此我国农业份额偏大的事

---

* 西蒙·库兹涅兹：《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2页。

实，并不能够用农业自然资源方面的富足来加以解释。

有的研究者又引证美国经济学家梅勒的研究成果，认为拥有大量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当其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时，对农产品的需求达到最高点，是一个规律。但是梅勒的工作并不是对统计观察值的回归，因而他的分类过于机械（见表3—5）。至少在他的表式中无法找到适用于中国情况的分类：农业人口占70%，人口增长率1.9%，人均收

表3—5　梅勒的农产品需求增长比较表

发展水平	农业人口的%	人口增长率	人均收入增长率	需求的收入弹性	农产品需求增长率
很低的收入水平	70	2.5	0.5	1.0	3.0
低收入	60	3.0	1.0	0.9	3.9
中等收入水平	40	2.5	4.0	0.7	5.3
高收入	30	2.0	4.0	0.5	4.0
很高收入	10	1.0	3.0	0.1	1.3

资料来源：刘运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与农村》，第92页。

入增长率2—3%，因而无法据此推断中国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需求增长率。

更根本的问题是，体制的因素对恩格尔规律的实现却能发生较大的扰动。统计表明，在人均GNP 1,000美元的同一时点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食物消费比重占35%左右，而苏联东欧国家则达45%左

有。

因此我们的分析不得不特别看重收入分配结构及其形式对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产生的影响。

首先是我国国民总收入中可以供个人支配的消费比例低。1960年这个比值为76%，比全部其他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值还低6个百分点；1982年为70%，比全部其他低收入国家竟低16个百分点（校正价格偏差后，约20%以上）。如此的低收入份额在一个长期内保持着一个极慢的增长率。1981年全国职工人均实际工资为500元（系1950年币值，下同），勉强达到1957年的水平。所以我国非农业人口的人均消费水平在这20多年的时间内只提高了不到43.4%，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8%，远低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5%）。同期全国农业人口的平均消费水平从117.1元增长到143.1元，只增长22.2%，年平均增长率更在1%以下。低消费水平及其低增长率，对中国保持高积累率以主要依托国内资源的动员来推进国家工业化，显然是有利的，但同时却又形成了中国居民独特的开支模式：在城市家庭中，通过公共消费以各种形式的补贴和配给，来满足生活保障（食物）及有限的改善；在农村家庭中，消费的自给部分比重极大，农民的衣食住行，除了衣着的商品性消费比重略大之外，其余主要靠自给解决。

总之，城乡人口自主支配的货币性开支数额很少，消费者主权非常有限，当然使得任何依托市场机制才明显发生的倾向受到限制。

其次，为了在低收入条件下保障人民的基本需要，我国居民个人消费中相当一些项目不是由个人来开支的。这样，某些非买品，如城镇住宅、医疗、教育和各种社会性保险，对个人开支几乎没有弹性。例如城镇居民的人均房租，扣除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1983年比1957年增长了6.3%，年均增长率仅为0.24%；全部房租开支也微不足道，每人每月0.59元，只占职工家庭生活费支出的1.5%。同时，某些价格受到补贴歪曲、供给的弹性又大于住宅和耐用消费品的产品，如低价食品，却相对鼓励消费增长，形成长期的供不应求。于是个人开支项目升降顺序也就同正常的消费变动趋势发生了偏差。

上述两方面情况都值得读者注意，我国需求结构比之于通常形态有根本性的偏离，即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既受到收入水平过低的强制性作用，也受到歪曲程度较大的价格体系诱导的"选择性"作用。从这一分析出发，我们也许可以对常识难于理解的下述事实作出比较正确的说明。这个事实就是：同收入水平相比，中国人的食品消费偏多偏好。美国

海外委员会早在70年代进行的调查就发现，中国的人均收入在当时虽然仅名列全球各国的第110位，但“生活质量”指标的数值却名列第73位。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将年龄和性别分布、平均体重和所处环境的气温等因素考虑在内，认为中国人为了保持正常活动和健康水平，平均每人每天需要2,360大卡热量。这个标准，70年代末我国已经达到，1982年的人均日摄取量（2,779大卡）已超过18%。中国生理学会等单位制定的“全国营养卫生标准”要比FAO的数值略高一些，其中标准热量为人均每天摄入2,480大卡，标准蛋白为70克。即使如此，1982年我国的实际人均日摄入量，也分别超过12%和15%。

人们往往批评过去我国的经济模式忽略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目的——满足人民的需要。但是，什么是“人民的需要”？在商品关系发生作用的时代，经济学面对的需要就只能是有购买力的需要。当居民的收入数额及其开支模式确定之后，“人民需要”的总量和结构也就形成了。生产体系实际上一直在为满足“需要”工作着。极低的私人消费、居高不下的恩格尔系数以及由此决定的只占微小比例的非食品消费需求，同农业产出份额偏大下的食品供应紧张、重工业超前发达、消费品工业不足的生

产结构之间，有着很好的对应关系。这种供求格局，又非常容易说明为什么农业就业份额更大、工业就业吸纳力有限以及城市化相对不足。因此，当我们侧重从需求方面来入手说明我国农业份额曲线变动异常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一系列“反常”经济现象时，实际上包含了如下见解：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人为选择是全部问题的真正关键。

3-5 转向常态面临的新约束

看来我国的结构生产力隐藏在极为坚硬的结构外壳之中。能否有效地缩小我们同世界发展进程的差距，取决于能否遵循农业相对份额下降这条主线，找到足以“轰击”这一坚硬外壳的力量和历史契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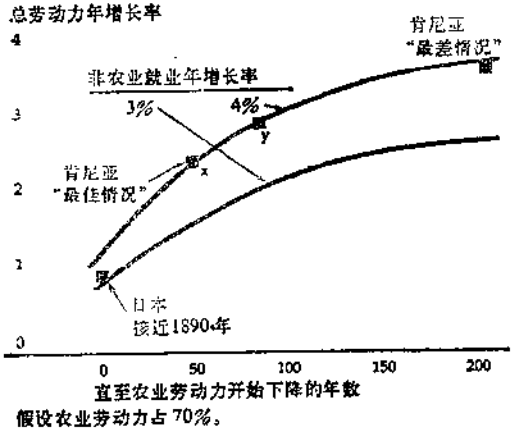
1979年以来的情况是令人鼓舞的：国民收入中居民消费比例上升；价格及补贴制度的改革导致城乡居民生活开支的货币化程度提高；各类消费品生产大幅度增长和新消费领域的开辟；城乡多种所有制下工商及服务业的活跃和兴旺；农村要素流动重新组合的种种束缚正在层层打破；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撞击着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模式。特别

是农产品长期短缺状态的结束，使得农业产值和收入份额也将开始下降。事实上，如果扣除了超额库存的农产品，从1983年起我国农业产值和收入份额的上升趋势——作为对 20 多年农产品匮乏的一种必要补偿——就已结束了。1985年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方面出现的波动，表明在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中，农业的份额也将同人口和劳力中农业的份额变动趋势一样，合乎规律地出现下降。

总之，我国的农业份额下降趋势正在从异常形态转向正常形态。按照前文叙述过的论点，这正是大规模释放我国经济结构生产力的标志。

新的约束不容忽视。参照Johnston和Clark 以肯尼亚和日本为例制作的一个模型（见图3—3），可以看到：在70%劳动力从事农业的初始条件下，如果总劳动力的年增长率2.5%，非农业就业的年增长率达4%，那么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在今后50年左右（图中x点）还将陆续增长；要是总劳力的年增长率达3%，那么农业劳动力要到95年（图中y点）后才开始下降；反过来，如果非农业就业的增长率只有3%，那么即使2.5%的总劳动力增长率，也须过150年（即图中“最差情况”点）才能引起农业劳动力绝对数的下降。而日本在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力

的75%；尔后二三十年间，非农就业的年增长率为2—3.5%。这同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似。但是，日本的每年总劳动力增长不到1%，所以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第88页。

图3—3 Johnston和Clark模型：农业劳动力将何时开始下降

到1883—1987年和1913—1917年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即已下降了20个百分点，绝对数下降了100万人左右。

中国在本世纪内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将增长2.7%，已是一个同今后人口控制状况无关的既定量。因此，非农部门的就业率就成为决定中国经济

结构变革程度的中心环节。支持非农就业增长的，一方面是较高的农业生产率，另一方面又需要在各非农产业部门的总产值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就业增长率＝总产值增长率－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进行复杂的配置。这差不多就涉及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中最核心的困难。对中国来说即使非农就业增长率能够持续保持在4.5%，那末在本世纪内我们还将同在目前3亿劳动力基础上逐渐增长的宏大的农业劳动力群打交道。事实上，国际经验和我国实际情况都证明，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区段里持续4.5%非农就业增长率决非易事。

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70年代后期的抽样调查资料表明，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NP265～520美元的水平上，工业就业的比重一般为13～15%；在521～1,075美元的水平上，工业就业一般占17～20%。这同发达国家早期的情况相比，要偏低一些，因为发达国家除苏联外，在人均GNP200～300美元时，工业就业比重即达到20%以上；在人均GNP 1,000美元时，大都达到30%以上。目前可以解释上述差别的理由，主要就是工业技术的累计性进步使工业的资本密集倾向加强了，后进国家面临的选择空间同先行国家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

我国1980年工业就业比重，如果计入农村队办

工业的劳动力，占15.9%，大体符合同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情况。据此，我国工业经济学家判断，今后十几年内我国工业就业的年增长率难以超过4%；2000年时工业就业的总比重难以超过20%。*如果这个判断可靠，那么工业以外的非农部门就业增长率必须达到5.11%以上（以这些部门就业权数为0.445计），才能保持全部非农就业每年增长4.5%。以上数量界限虽然极为粗略，但它足以提醒我们，即使从数量问题着眼，要使中国经济结构变革的最敏感变量——农业份额下降，显示出有足够推动意义的变化，非得系统地变革整个经济结构及其所处社会环境才行。中国的结构变革很可能难度大而持续时间长，它注定不会是一个轻松的过程。

更根本的困难当然不是在事情的数量方面。钱纳里（H.Chenery）通过大量比较研究之后得出了如下见解："发展"决不等于量的扩张，而是由传统的经济结构转向经济活动组织的现代型式。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在19世纪的成长经历相比，经济结构的变化可能更为快速。这里既充满机会也布满障碍和风险。制定发展政策要对如何管理结构的快速变化予以充分注意，因为这是全部发展

* 周叔莲、裴叔平主编：《中国工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页。

政策的中心问题。如何协调结构变动中的需求——生产——贸易——资本劳动的配置，如何将市场的力量同政府的干预有效地结合起来，都是迄今为止尚无定解的难题。多数发展中国家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严重不均衡，反映了发展政策的不协调和配置方针的不一致，表明管理快速的结构变革非常之不易。需要补充的是，中国踏入这个进程时还伴随着必须完成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性任务，即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转向大规模引进市场机制的新体制。中国的管理将面临着“持续增长——结构变革——体制转轨”之间更复杂关联的协调。这样我们就顺着农业相对份额下降这条主线，触及到了我国发展问题更带有本质性的困难。

第四章
我国
国民经济结构的
显著特征——
超常偏差

4-1 对比中的发现

农业份额的变动既然是国民经济特定发展阶段的整体表征和最敏感变量，那么它的趋势和前景当然也就受制于国民经济总体的结构状况。对我国来说，农业份额的下降虽然因为异常形态的终结而开始显得比较确定，但它引起未来国民经济结构何种整体变动图景，以及这种变动图景容许农业份额下降的速率和型式等等，却还是些不确定性问题。为了把握这些问题，本书使用如下方法：把中国结构的现实状况同采用统计方法处理过的各国（按不同规模和收入水平分组）同等收入水平时的“标准结构”加以对比，借助于这个具有统计一般性的参照物来认识我国现有结构的整体特征，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影响这些特征变化的主要因素，进而探讨它

们在现实起点上继续变化的控制条件和可能方向。

需要说明的是，各国经济结构都有自己的个性，因此它们与“标准结构”或大国一般结构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离。一类偏离是由天赋资源条件、国家规模大小所产生的正常偏离；另一类偏离则是由发展战略、体制和策略选择所造成的异常偏离。所以，各国经济结构与“标准结构”的不一致是常态。但我们相信，只要把握得当，任何“偏离”的信息都能够加深人们对各国经济个性的认识，从而为今后发展战略的选择和评价提供有益的启示。

我国的情况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极为特殊。国际上通常把拥有2,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列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从这一点衡量，中国简直就是一个巨国。更为特殊的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发展道路。全面描述这个过程，决非我们这本小书所能胜任。但是从结构变革的角度，把若干“反差”最明显的特征记录下来，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我国既具有许多别国所不具备的长处和力量，也面临许多特殊的问题和困难。

我们利用“世界发展模型”提供的基本经济变量作为比较项目，按人均GNP300美元（1980年美元）的时点水平，将中国的经济结构状况分别同以

下结构作出比较：（1）1965年101个国家的统计回归（相应的美元已调整为1980年值）；（2）23个半工业化大国的结构模型。表4—1列出比较的结果。

从表4—1看，我国的国民经济结构与一般“标准结构”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特征。

从需求结构看，我国的投资比重不仅远高于低收入国家（比3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和“大国模型”分别高18.7和18.8个百分点），甚至超过中等收入国家（比9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高14.2个百分点），加之公共消费比重亦偏高，因此个人消费比重显得格外低（比3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和“大国模型”分别低21.9和26.7个百分点）。

从生产结构看，我国的一次产业比重与低收入国家相似（比3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和“大国模型”低3.2和3.8个百分点），而制造业比重则与中等收入国家相似（比900美元的“标准结构”还高0.9个百分点），远高于低收入国家（比3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和“大国模型”分别高11.1和8.9个百分点），加之基础设施比重偏高，相应使服务业规模异常偏小（与300美元和9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相比，分别低16.9和23.4个百分点）。

表4--1　　中国经济结构的偏差状况（1981）

比较项目			中国人均GNP 300美元时结构状况(1981)			"标准结构"			大国模型			中国与"标准结构"和大国模型的结构偏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SEE	R^2				$300	$600	$900	$300	$600	$900	7—8	7—11	7—10
1 S	26	0.71	0.294	0.293	0.355	0.196	0.171	0.190	0.140	0.182	0.199	0.220	0.215	0.165
2 I	25	0.40	0.281	0.282	0.345	0.158	0.188	0.209	0.157	0.199	0.216	0.187	0.183	0.142
3 F			0.013		0.010	0.023	0.016	0.012	0.017			—0.013	—0.007	—0.002
4 GR	25	0.64	0.277			0.153	0.181	0.202	0.138	0.156	0.178	0.124	0.144	0.075
5 TR			0.110			0.129	0.153	0.173				—0.019		—0.063
6 EDEXP			0.044			0.033	0.033	0.034				0.011		0.010
7 SCHEN	21	0.72	0.893			0.375	0.549	0.687	0.450	0.591	0.667	0.518	0.443	0.256
8 I	25	0.40	0.281	0.282	0.345	0.158	0.188	0.209	0.157	0.199	0.216	0.187	0.188	0.142
9 C	31	0.15	0.636	0.605	0.501	0.720	0.685	0.687	0.768	0.709	0.682	—0.219	—0.267	—0.186
10 G			0.078	0.142	0.144	0.137	0.134	0.135	0.099	0.109	0.116	0.007	0.045	0.009
11 Cf	15	0.82	0.456	0.364	0.304	0.392	0.315	0.275				—0.023		0.029
12 Vp	30	0.75	0.421	0.378	0.420	0.452	0.327	0.266	0.458	0.320	0.254	—0.032	—0.038	0.154

（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SEE	R^2				$300	$600	$900	$300	$600	$900	7—8	7—11	—107
13 Vm	23	.071	0.406	0.336	0.260	0.149	0.210	0.251	0 171	0.253	0.232	0.111	0.009	0.009
14 Vu	38	0 32	0.103	0.102	0.151	0.081	0.072	0.079				0.090		0.072
15 Vs	20	0.36	0.071	0.184	0.169	0.353	0.385	0.403				—0 169		—0.234
16 E			0.041		0.093	0.195	0.218	0.230	0.139	0.123	0.129	—0.102	—0.037	—0.137
17 Ep	46	0.67	0.019		0.043	0.137	0.136	0.131	0.082	0.002	0 049	0.094	—0.039	0.088
18 Em	139	0.91	0.022		0.043	0.019	0.034	0.046	0.016	0.039	0.039	0.027	0.030	
19 Es	79	0.21			0.004	0.031	0.042	0.048				—0.027		—0.044
20 M	47	0.34	0.041		0.031	0.218	0.234	0.248	0.149	0.148	0.142	—0.197	—0.008	—0.162
21 Lp	24	0.75	0.716			0.658	0.557	0.489	0.596	0.493	0.404	0.058	0.141	0.227
22 Lm	31	0.74	0.133			0.091	0.164	0.206	0.215	0.252	0.348	0.042	—0.077	—0.073
23 Ls	29	0.67	0.152			0.261	0.279	0.304	0.190	0.244	0.308	—0.099	—0.015	—0.152
24 URB	29	0.67	0.210			0.220	0.332	0.439				—0.010		—0.229

（续）

比较项目			中国人均GNP 300美元时结构状况(1981)			“标准结构”			大国模型			中国与“标准结构”和大国模型的结构偏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SEE	R^2				$300	$600	$800	$300	$500	$900	7—8	7—11	7—10
25	BR			0.021			0.449	0.377	0.333				−0.425		−0.317
26	DR			0.003			0.186	0.135	0.114				−0.180		−0.108
27	DIST						0.541	0.557	0.554						
							0.140	0.129	0.127						

说明：(1)表中第1、2列为比较项目的序号及指标名称的英文缩写。顺序为：1—国民总储蓄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国民总投资占GDP的%；3—资本流入(商品和劳务的净进口)占GDP的%；4—政府收入占GDP的%；5—税收占GDP的%；6—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7—小学和中学的入学率；8—同2；9—私人消费占GDP的%；10—政府消费占GDP的%；11—食品消费占GDP的%；12—第一产业产出占GDP的%；13—制造业占GDP的%；14—基础设施占GDP的%；15—服务业占GDP的%；16—出口占GDP的%；17—初级产品出口占GDP的%；18—制成品出口占GDP的%；19—劳务出口占GDP的%；20—进口占GDP的%；21—初级产业劳动力的份额；22—制造业劳动力的份额；23—服务业劳动力份额；24—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5—出生率；26—死亡率；27—20

20%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40%低收入人口占总收入份额。(2)与3列为H.Chenery、M.Syrquin《发展模型》中有关项目的标准差。(3)第4列为该项目数值变化与人均GNP水平变化之间的相关系数。(4)第6—7列均为中国结构数据；其中第5列系依据物质产品净值观念所作的统计；第6列按国内生产总值(GDP)观念调整了第5列中的折旧及服务业数值；第7列进一步调整价格误差。(5)第8—10列为H.Chenery所作对101个发展中国家(1950—1970)的"发展模型"，依次为人均GNP300美元，600美元，900美元时结构系数(均已调成1980年美元)。(6)第11—13列为16个半工业化大国的统计回归模型，依次为人均GNP300、600和900美元时的结构系数(均已调成1980年美元)。(7)第14列为第7列同第8列之差，表明中国与"标准结构"中人均300美元水平的结构偏差，其中第7列没有数据的项目用第6或第5列数据。(8)第15列为第7列与第11列数据之差，表明中国与大国模型中人均300美元水平的结构偏差。(9)第16列为第7列与第10列数据之差，表明中国与"标准结构"中人均900美元水平时结构的偏差。

资料来源：H.Chenry、M.Syrquin：《发展模型1950—1970》；世界银行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主报告)》，财经出版社1985年版。

从就业结构看，我国初级产业和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均高于同等收入国家（分别比3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高5.8和4.2个百分点，但制造业就业比“大国模型”人均300美元的水平低8.2个百分点），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偏低（比3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低9.9个百分点）。

此外，从贸易结构和其他一些重要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看，我国与一般结构的差异也同样是显著的。

通过比较，不难得出我国经济结构同“标准结构”之间存在着较大偏差的结论。

在国民经济结构存在大偏差的情况下，一系列矛盾不断累积起来，对经济运行产生了决定性的、有着深远影响的后果。

第一，我国一直保持了只有发达国家才可能达到的高积累率，但高积累的使用效率长期得不到提高。

过去的几十年，我国的平均积累率超过25%，相当于日本人均500美元和一般发达国家人均1,500美元时才能达到的积累水平。对我国工业产值、固定资产和劳动力的动向以及有关指数的分析表明，1957—1979年工业产值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增加了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而不是由于提高这些投入品使

用效率的结果。经济机体中缺乏有效推动技术进步的自动机制，其结果是长期保持了一个很高的投资系数（4—5）。

第二，我国比较早地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工业化，但工业的结构畸重畸轻。

1977年我国的工业产值（包括建筑业和基础设施）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4%。同期接近这样高比率的国家有西班牙（38.7%）、南斯拉夫（44.6%）、南朝鲜（33%）、墨西哥（35%）和阿根廷（43.2%）。当时这些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都在1,000美元以上（只有南朝鲜为820美元，但西班牙已达3,190美元，南斯拉夫和阿根廷都近2,000美元），而我国只有200美元。

从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看，1979年我国达35%，比低收入国家制造业比率（13%）高1.7倍，也远比中等收入国的比率（25%）和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的比率（27%）高。

但是，在制造业构成中，用于满足传统重型结构需求的部门畸重，而生产最终消费品部门畸轻。根据70年代末的资料，我国工业中主要是重工业的各部门占64.1%。仅机器、设备和金属制品就占27.8%。大大超过印度和南朝鲜（在19—20%之

间）。考虑到最发达国家的这个统计项目中包括耐用消费品（特别是小汽车），所以我国的重制造业比重显得很高。同时食品、饮料和烟草的比率（11.4%）比各国的最低数还低一些；服装、皮革和鞋（3%）以及木制家具（1.2%）比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低；只有纺织品（13%）大致接近南朝鲜和印度。

第三，国家工业化的急速推进过程没有伴随商品化的相应发展，反而还使近代以来发育着的市场关系有所退化。

我国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很差，普遍的契约关系和新的组织结构都发育不起来，特别是抑制了利用市场机制在资源分配中的积极作用。我国不仅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部门中存在着相差悬殊的要素生产率和综合生产率，而且在同一部门和同一行业内，不同规模和技术水平的企业也长期安然并存。这样，就不能在更大范围内通过分工深化和资源替代而提高效率，不仅使现有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而且不断产生不合理的需求。

在消费方面，非货币收入和非商品性消费在收入分配中占据着重要地位。1978年非商品性消费占消费基金的比重为33.0%，1983年为26.7%。不仅歪曲真实的消费水平和需求结构变动的信号，而且

形成比较复杂的既得利益关系，使任何结构性改革都遇到较大的摩擦力。

第四，作为这一切的综合表现，则是制造业产值比率极高，而社会就业结构则长期保持着传统经济的鲜明特点。这说明我国以往的高速工业化是在城乡隔离的条件下进行的。工业化在城市高速推进，而众多的农村人口则同小部分国民收入组合在一起，保持着一种很低的分工水平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工业净产值的高比例同农业“就业”的高比例，十分罕见地长期并存。

以上矛盾的存在首先表明我国具有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因此得以在“一穷二白”的基地上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战后总资源转向工业化最快速的国家之一。据估算，我国工业化的总资源转移率达20%，仅次于南朝鲜的33%，与泰国、土耳其的18%相当。同时，我们也大体能够在工业化高速推进时，依托城乡的隔离而在它们各自内部长期维护了一种平均地求温饱的福利方式和稳定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组织了巨大的行政性要素分配网络，从中心城市直达穷乡僻壤。

由于拥有这些长处，我国就充分得到了作为一个巨国所得到的好处：任何从人均水平看来都微不足道的东西，只要乘以10亿人口这个巨大乘数，得

出的结果就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0美元而使工业比率高达44%，这就是许多国家不可想象的“巨国效应”。

我们也有明显的短处，主要是经济活动中的自组织能力太弱；在资源分配和利用方面严重的低效率。两大短处都同以下选择有关：在基本建立了工业化体系之后，长期靠工业体系自身产生的需求来推动工业，而迟迟没有转到靠全面发展经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所产生的巨大需求来推动工业化深入的方向。后一种发展方向所需要的体制条件，不可能由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来提供。最严重的问题是，把80%的人口隔绝到工业化直接进程之外，使之无法成为我国经济结构变革的积极力量。

可能正是由于这些矛盾的特征，使我国成功地推进了高速工业化，却没有带来与之相称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1960—1977年我国的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高了14个百分点（同期可比的有，南朝鲜16.5个百分点、泰国7.8个百分点等），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7%（同期南朝鲜7.1%，泰国4.5%）。

4-2 偏差一定不行吗?

中国同一般发展模型的极大偏差，主要成因既不在于历史传统的力量，也不在于自然资源的特别约束；中国工业化的高投入低效率模式，也在广泛的国际经验对比中终于被证明并非命中注定。大体到 70 年代后期，许多中国人就不再满足于歌颂自己已取得的成就，而开始有系统地表达对以往结果的无法甘心的心情。社会仿佛一下子陷到一种普遍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之中。这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转折点。在经济结构方面，当时形成比较一致的批评性认识是，中国过于急切地追求国家工业化的目标，高积累导致重型结构，挤占了消费基金，引起重大比例失调和宏观经济运动的严重不平衡。

这一批评的现实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它是否有助于得出适用于更长时期的正确答案呢?

我们认为并不尽然。因为我们注意到了存在着上述批评内含逻辑所不能包容的反例。

比如日本也是个高积累的国家。1956年，当其人均GNP只有115美元时（当年美元，相当于1980年的500美元），投资即占GDP的32%，国内固定

资本形成率即达17.6%；60年代初，日本的投资率达33%（全部来自国内储蓄）。此后十多年时间内，日本国内投资总额年平均增长14.6%，高于国民总产值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力。直到80年代初，日本国内投资占GDP的比重仍为31%。同时，在日本全部工业中，重化工业的产出份额自1940年以来就从未低于40%，1960年达56.4%，1970年达62.2%，1978年仍占61.5%，比重之高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简直可以说，日本是主动选择结构大偏差为其发展战略的。但是日本在外形上同中国极为相象的高积累加"重型结构"，不仅没有相对地挤压消费，相反，却迅速提高了国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1960—1982年，日本人均GNP的年增长率为6.1%，60年代私人消费年平均增长9%，70年代为5.1%，分别名列同期市场经济工业国的前茅。

从结构角度分析，日本的奥秘在于，它在主动选择投资和产业结构超重偏差的战略的同时，还控制种种其他经济过程与这种大偏差相协调。比如早在人均收入同中国十分接近的时期（1914—1935年），日本工业品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即已由7%上升为9%。60年代以来，这一比重一直保持在10%以上；同时日本的出口工业品中重化工制

成品比重不断提高，1960年为39.7%，1981年为58.8%，出口结构的偏重适应了投资和产业结构的偏重。简言之，日本的成功不在于选择了重化工倾斜战略，而在于它有能力使全部经济流程同其战略选择保持基本的协调。

类似的反例在战后经济史中还可以找到许多。有意味的是，几乎任何一种结构性的偏差（如低工资、低消费、高外债、轻型产出、重型产出、外向、内向等等），都有成功的先例。我们将上百个国家经济结构的统计观察值同“标准结构”对照，发现人均GNP增速较高的国家，恰恰都是结构参数有较大偏差的国家。1960—1980年间人均GNP每年增长5%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共17个，除去其中2个高收入石油出口国之外，15个国家和地区的106个可观察结构指标中，与“标准结构”的偏差值在±3个百分点以下的占9.4%，而偏差在±10个百分点以上的却占58.5%（见表4—2）。这有力地表明结构偏差也可能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是，几乎无一例外，这些成功者都在它们的结构偏差之间，保持着某种具有经济意义的协调。

下列经验类型，也许对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富有启发意义：

日本型：储蓄和投资比重显著偏高（观察值分

表4-2　　15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的结构偏差情况　　%

	S	S	I	C	G	UP	UM	E	URB
莱索托	420	-91.9	20.2	69.0	15.3	-14.1	8.0	—	-7.0
北门	420	-3.6	-10.1			-31.7	14.2	-10.7	17.2
约旦	1420	-49.5	32.3	14.3	24.8	-18.0	5.4	5.5	12.6
南朝鲜	1520	4.8	12.9	-11.6	8.6	-12.5	4.8	16.5	8.1
巴西	2050	2.3	4.5	-0.3*		-12.7	-8.5	52.2	50.8
罗马尼亚	2340		16.0			-14.1	-23.4	0.3	-3.3
葡萄牙	2370	-8.1	6.0	0.0	10.2	-13.8	7.4	-3.6	-21.8
南斯拉夫	2820	12.7	15.9	-22.6	12.0	-12.1	1.6	-7.9	-13.0
伊拉克	3020	39.6	13.8	-47.1	6.7	-17.1	31.8	48.9	15.2
香港	4240	4.7	10.0	-3.0	9.5	-22.9		68.9	29.5
希腊	4380	0.4	8.7	-7.9	9.3	-6.3	-9.3	-12.4	0.4
新加坡	4430	11.3	24.6	-13.0	3.5	-24.3	3.4	155.8	40.0
波兰	3900	-2.3		0.8	7.9	-5.1	20.4		-3.9
保加利亚	4150					-6.8	17.0		3.2
日本	9890	13.3	14.8	-10.2	0.2	-10.0	2.3	6.2	5.5

说明：1.表中各列的指标含义是：S—人均GNP；S—国内总储蓄占GDP%；I—国内总投资占GDP%；C—私人消费占GDP%；G—公共消费占GDP%；UP—初级产业产值占GDP%；UM—二次产业产值占GDP%；E—总出口占GDP%；URB—城市人口占总人口%。

2.各栏的数值系该国1970年的统计值与和应收入水平的"标准结构"值之差。凡人均GNP在1,500美元以下的国家和地区，"标准值"用《1950—1970发展模型》中"低于500美元(1964年美元，相当1970年的1600美元)的回归系数"计算得出；凡人均GNP在1,500美元以上者，"标准值"用"高于500美元的回归系数"计算得出。

3.资料来源：《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1950—1970发展模型》。

* 巴西的公共消费比重没有单独资料，因此同私人消费合计在一起。

别比“标准值”高13.3和14.8个百分点），城市化程度也偏高（5.5），意味着国民经济的高积累特征。但日本不是靠大量净资本流入来解决积累问题的，而主要依靠国内资源的调度。所以它的消费比重明显偏低（－10.2）；同时其工业产出份额偏高（2.3），推动出口份额偏高（6.2），因此国内私人消费份额虽然明显偏低，但并不影响工业品的实现。

与日本型很接近的是伊拉克，低消费（－47.1），高储蓄（39.5），实现了较高的投资份额(13.8)；同时也以高出口（48.9）来消化工业产出的高份额（31.8）。

南朝鲜型：投资偏高（12.9），不过大部分不是来自国内总储蓄（这部分仅偏高4.8），而是来自于资本净流入；但是它的出口份额偏高16.5，而推动高出口的又是附加价值率较高的制造业（偏高4.8），所以这种类型有能力平衡高额资本净流入。

南斯拉夫型：同样是投资偏高（15.9），但城市化程度显著偏低（－13.0），因而可以节约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同时南的居民收入份额虽然偏高，但私人消费份额却偏低（－22.6），所以国内储蓄占GDP的百分比能够高

于标准值12.7。从数据呈现的情况看，南的主要问题似乎并不是什么“消费膨胀”或“投资膨胀”，而是资本密集程度很高的制造业，并没有获得与资本投入相应的产出，产值份额只比标准值高1.6。更重要的是，未能成功地利用制造业的发展来推动工业品的出口，出口比重比标准结构低7.9个百分点，故引致平衡净资本流入的困难。

约旦型：高投资（32.3）、高消费（14.3）并且高度城市化（12.6），但低储蓄（－40.5），因此净资本流入超常偏高；不过又借助于高度城市化和高消费生活方式，促使第三产业的早熟发达（1980年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60%，比同等收入水平的“标准值”高出20个百分点），以服务业推动出口的增长（5.5）。

巴西型：消费偏低（私人消费加公共消费偏低0.3），投资和储蓄略为偏高（分别为4.5和2.3），同时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城市化；在这种情况下，它也是靠服务业推动出口（E偏高52.2），以平衡净资本流入。

看来，问题并不应归结为发展战略选择是否带来结构上的偏差，而在于一国的体制、运行机制和调控能力是否能够协调这些偏差，使经济结构的各个侧面之间建立起有助于财富在顺利流转中加速形

成的联系。

4-3 霍夫曼定理的普适性

进一步讨论偏差问题，就不能停止在一个时点上展开分析，而必须引入时间因素，研究结构偏差得以协调的动态过程。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曾对工业化过程中的工业结构演化做过开拓性的研究工作。他根据近20个国家的时间系列数据，提出把“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即“霍夫曼系数”）作为分析工业化过程的最敏感变量。他紧紧抓住对这个变量的观察值，把工业化过程分成如下四个阶段：

表4—3　　霍夫曼工业化阶段指标

	消费资料工业／资本资料工业
Ⅰ	5（±1）
Ⅱ	2.5(±1)
Ⅲ	1
Ⅳ	1以下

资料来源：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P60。

根据这种分法，资本品工业相对于消费品工业

的比重上升，意味着工业化的进展。于是“霍夫曼系数”随工业化的深入而不断下降，就成了一条定理。它对工业化理论和许多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但是，霍夫曼使用的“资本资料工业”概念仍具有含糊性。因为，正如日本经济学家盐野谷批评的那样，存在着既非资本资料又非消费资料的“中间资料”（intemediate goods）。霍夫曼以“75%以上的用途”作为区分标准，实际上沿用了重工业与轻工业两个门类的划分。

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的比重上升，是一种相当明显的倾向。收入水平高的工业化国家，金属、机械等产业的比重要高得多，也是各国工业统计资料中无可争议的事实。

问题是重工业比重上升，并不等于资本资料工业比重的上升。

盐野谷指出，当越出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之后，“霍夫曼系数”就不再下降，亦即资本品产出份额不再提高。这时，重工业比重的继续增长，以重工业内部，特别是机械工业内部的耐用消费品生产份额的上升为条件。如日本在1955—1971年间，冶金工业占制造业比重从17.0%变为17.8%，化学工业从11.0%降为8.0%，而机械工业则从14.8%上升

为32.5%。后者的推动主要来自汽车和家用电器（1978年仅汽车工业即占机械工业产值的31.3%）。

这就可以同库茨涅茨在研究美国经济长期趋势时的发现统一起来。库茨涅茨计算过社会最终产品中生产者耐用资料和建筑材料的比重，结果说明这两者的比重在一个长时期内看不出上升的趋势。据此他认为从长期看，资本形成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稳定的。他认为，资本资料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结论根据不足，至少根据美国的经验，“不得不放弃霍夫曼定理”。就是说，资本资料工业的比重是稳定的，但重工业的比重却趋于上升。这才是对工业化进程的更准确描述。

因此，世界上推行重工业化战略的国家和地区不少，但唯有使重工业的内部结构变化与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相协调者，才取得显著的成功。1929～1959年期间世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构成的变化中，机械类增长最快（14.5%→24.0%），其次是运输机械类（9.8%→16.6%）；金属类基本稳定（11.9%→13.5%），化学制品增长也不快（8.5%→12.0%）；纤维工业品则大幅度下降（28.7%→11.1%）。我们不难理解，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收入的增长推动耐用消费品在各种生活方式中权重的增大，正是它引导着制造业最终产品市场的变

革。谁适应它，谁才能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源源不断地取得推进工业化历史进程所必需的要素资源。

总之，结构偏差之间的协调不能只维持一时一事，而必须在动态过程中反复加以调节。在资源配置的各个主要过程之间，一个过程的变化如果不引起其他过程相应的变化，那么原有的协调就被打破了，代之以新的偏差和新的不协调。国民经济结构变革象一切复杂事物的变化过程一样，容不得僵化和墨守成规。任何一个在特定阶段足以带来成功的战略和政策，如果在变化的环境中不随时加以调整和修订，它也足以造成另一个特定阶段的失误和挫折。健全的经济体制首先必须具有程序方面的合理性，以便能够不断地作出适应性的自调节。

4-4 我国结构问题症结之所在

我国原有经济结构问题的真正症结，不在于存在着同“标准结构”的大偏差，而恰恰在于这些大偏差之间的不协调。

让我们重新回到对表4—1的分析，也许能有一些新的发现。

我国的投资倾向很强，高于标准值18.7个百分点；高额投资全部来自国内储蓄（尚有利余）；加上城市化程度偏低（－1.0）。这三个事实足以说明何以工业产出份额偏大（比标准值高11.1个百分点）。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低收入农业国来说，本来是了不起的成就的表征。

问题是我国工业化的成果非常难以被由它自身造成的经济流程所容纳和消化。

第一，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从未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其中重制造业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未达到10%。在结构对比表上，清楚地显示出我国的出口份额偏低（－10.2），其中制成品出口的份额也只比标准值稍稍偏高（2.7%）。这样，高积累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结果——重制造业产出偏大，就不能象日本那样可以指望到国际市场上去实现，无法迅速产生回收效应，反过来成为能够提供积累的源泉。

第二、国内需求结构中消费份额偏低（－21.9）及其增长率过慢格局的长期保留，限制了居民的非食品消费，特别是其中的耐用消费品和服务消费的应有增长（这又是居民收入不能较快增长的原因），其后果不仅导致就业弹性较大的消费品产业、服务业在产出结构中持续偏小甚至萎缩，而且也加剧了

重工业产品结构进一步陷于自我服务而难以自拔。

惊人庞大的工业产出，既没有充分的国内市场、也未开辟出应有的国际市场来实现。我国的经济竟然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硕大的工业化成果噎住了。

需求结构、贸易结构的偏差同产出结构的偏重倾向之间的不协调，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诸种不协调中的最核心问题。这种状况，在工业化体系的基础大体建成，重工业内涵需要发生变化的发展阶段，就显得日益严重起来，以至成为提高全社会经济效益的主要障碍。

以上分析使我们明了，中国面临的经济结构变革，决不是简单地要将原有的某一结构偏差孤立地加以矫正；最重大的选择也并不是“轻型化”还是“重型化”，“高积累”还是“适度积累”等等这样单层次的问题。真正的困难在于，怎样从我国的积累、消费、投资、生产、就业、分配、贸易等各个结构侧面已经存在的超常偏差出发，面对着向中等发达水平的过渡，建立起能使这些偏差具有最必要协调关联的新的经济流程。如果我国不及时转向国内国际工业品市场的拓广，建立起“收入—需求—产品结构—资源分配”互相适应的新的联系，那么不仅基本建成的工业体系不能进一步改组、发挥

效益并走向产业高度化，而且工业化的深入，即高附加价值率的重工业比重的继续提高，也将缺乏足够的动力。在新成长阶段上，重建能源交通等基础结构，使之适应制造业已经超前的发展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重建需求结构与产出结构和贸易结构之间的协调联系，开辟高效利用资源的国民经济运行型式。

第五章
偏差协调：
我国经济结构
变革的可能方向

5-1 中国适用标准转变过程吗？

建立我国经济结构动态协调关系的基本出路，不仅仅要通过回首以往的经验教训来寻找，而且更需要面向未来——中国从低收入国向中等收入国的演进——来发现。

我们还是借助于“标准结构”来展开讨论。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这套统计分析中从人均GNP 300美元到900美元的结构变化过程，称为“标准转变过程”。第二章的各图以及表4—1的8～10列数据，清楚地显示了标准转变过程主要是由以下几大动态组成的：

（1）积累比重提高，大体从人均300美元时的15.8%上升到人均900美元时的20.3%；（2）居民消费比重下降（从72%降为66.7%），而其中非食

品消费部分上升（从33%上升为49.2%）；（3）进出口比率有所上升，而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国内 GDP 比重明显提高（从1.9%上升到4.6%）；（4）制造业产出份额上升最为迅速（从14.9%上升为25.1%），其次为基础设施业（从6.1%上升为7.9%）和服务业（从33.8%上升为40.3%）；而农业产值比率大体下降一半左右；（5）总就业中制造业比重上升11.5%，基础设施业和服务业上升5.3%。

“大国模型”的具体数值有所不同（见表4～2的11～13列），但结构动态的走向还是同标准转变过程一致的。

标准转变过程受到需求结构变化的驱动，后者建立在恩格尔法则的基石上，因而对各国的现实变化都会产生无法隔绝的影响。

表5—1是克拉维思1982年作出的不同人均收入水平下的消费结构，其中对不同消费项目的需求收入弹性（即收入增长引起对某一种消费项目开支增长的数量关系），分别提出了估计值。这些信息对于我们理解结构转变过程的动力系统十分重要，把这些信息同白南生1985年根据我国统计资料所作的70种消费品收入弹性值加以比较，不难看到，由于“许多传统消费品需求量的收入弹性普遍下降，基本生活品的收入弹性大都降到1以下，”因此可以

表5—1　不同人均收入水平的消费结构

	占总消费的百分比		相对价格差异		需求额的收入弹性估计：根据一至五各组数据⑤	
	一组②（890美元）	二组③（1,250美元）	一组和二组④			
食品	50.9	37.7	0.96	0.69	0.65★	0.66★★
面包、谷类	19.5	10.6	1.12	0.68		
肉类	4.6	6.8	0.99	1.24		
鱼	0.6	1.8	0.88	0.47		
牛奶、蛋、乳酪	4.7	5.6	0.73	0.74		
油、脂肪	2.7	1.8	0.68	0.74		
水果、蔬菜	10.0	8.5	1.09	0.46		
咖啡、茶、可可	0.8	0.8	0.82	0.97		
香料、甜食、糖	5.0	3.7	0.70	0.87		
酒	0.1	0.0	1.01	1.08		
香烟	2.7	3.1	0.66	1.00		
服装、鞋袜	7.5	8.3	0.86	1.04	1.07★	
服装	6.7	6.8	0.34	1.02		0.97★★
鞋袜	0.8	1.6	1.01	1.22		
租金、燃料	8.0	9.7	0.95	1.28	1.35★	1.01☆★
租金	5.1	6.5	1.06	1.40		
燃料、电力	2.9	3.2	0.77	1.15		
家用货品和服务	5.4	5.9	1.16	1.23		
家俱、电器	1.7	2.8	1.06	1.45		
其他货品服务	3.6	3.1	1.07	0.95		
运输、交通	5.6	9.2	0.93	1.86		2.46★★
设备	0.9	1.6	0.70	1.91		1.98★★
业务支出	1.7	2.7	0.68	1.24		
购买的运输工具	2.7	4.5	1.24	0.84		
交通	0.3	0.4	0.42	1.65		

娱乐与教育①	8.0	9.8	1.36	0.94	
娱　乐	2.8	3.7	0.93	1.40	1.81★★
教　育	5.2	5.6	1.46	0.54	
其他服务	5.2	9.9	0.89	1.87	
个人服务	1.5	2.7	1.09	1.31	1.53★★
其他服务⑥	3.7	7.3	0.84	1.42	1.79★★
合　计	100.0	100.0	0.98	—	

说明：①包括教育、保健、娱乐服务等的公共支出，均按购买时价计算。

②马拉维、肯尼亚、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赞比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均按1975年未加权平均数。

③南朝鲜、马来西亚、哥伦比亚、牙买加、叙利亚、巴西等国的均按1976年的加权平均数。

④二组相对价格与一组相对价格比例。每一个生产价格均按国内生产总值而不按总消费计算。

⑤每一种消费商品数量的比例性增加除以全部实际消费的比例性增加，加以修正后，以适应各类不同消费品相对价格起变化后所造成的影响。数旁有★记号的表示来自不同来源。（卢奇、鲍威尔、威廉斯，1977年），以及四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

⑥包括餐馆、旅馆。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结构变化与增长的可能性和选择方案》，气象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116页。

评断上述动力系统也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的结构变动产生作用。

问题是我国目前某些重要结构指标的偏差，已大到了超过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才能达到的标准。例

如目前我国的储蓄率，已经比“标准结构”中人均GNP900美元的储蓄率高16.5%；投资比率高14.2%；制造业产值比重高1%；基础设施产出份额高7.2%。同时，居民消费比重则低16.6%。显见的事实是，中国走向中等收入水平，不仅面临着初始的结构偏差，而且存在着同标准转化进程之间的偏差。目前至少可以确定，如果我国在目前的偏差值基础上，遵循标准转变过程来发展，那么国民经济的结构不协调还将加剧。因此标准转变过程中的五大结构动态，有三大动态（积累比率上升；消费比重下降；制造业产出份额上升），注定难以在中国未来的结构变化中出现。这三大变量不仅是变化的幅度必定同标准过程不同，而且变化的走向都将截然相反。

应当明了，我国在此基本约束条件下，如何实现自己的结构变革，就不能凭借包含于标准转变过程中的通用逻辑，而必须在以往选择造成的现实基础上，通盘考虑现有的偏差、对转变过程的偏差以及走出低收入水平后面临的新机会和新压力，致力于寻找适合中国情况、同时又并不背离现代化进程的结构变革的特殊逻辑。

5-2 偏差间协调的两难问题

中国是否应当遵照标准的结构变革逻辑，将目前已经存在的偏差加以大幅度矫正，使之回复到人均GNP300美元的“标准形态”，然后再要求它沿着“标准转变过程”走向中等发达水平，从而奠定新的结构基础呢？现实环境不允许我们作出这样笨拙的选择，因为在近中期内，以下两个方面的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既定的：

（1）投资和积累难以大幅度降低。虽然在钱纳里的“大国模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每一美元产值所需的固定资本会有所减少，但如果把间接的投资要求都考虑进去，投资绝对额的增长还是十分巨大的。从中国的情况看，由于过去累积的庞大投资面临大规模的技术更新，也由于过去忽略的、同时又有超前意义的投资方向——往往是投资量极为可观的基础结构建设——急需补偿，另外还由于新的消费倾向需要新的投资来满足，因此投资份额难以大幅度降低；特别当把住宅和其他同城市化进展连带在一起的所谓“消费性基本建设”考虑在内时，情况就更是这样了。

（2）净资本流入难以扩大。因为大国存在着足够规模的国内市场，因此开放度（即进出口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较低。统计数据表明，在人均GNP300美元时，大国的开放度要比“标准型”低13.4%；在人均GNP900美元时，则要低20.8%。另外，无论标准结构还是大国模型，从低收入走向中等收入的对外贸易都出现持续的逆差。这两条都不会不对中国起作用。中国过去的实情是开放度比大国模型还低10.5%。我们当然不能据此就认定对外贸易一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格局永远只能产生较小的影响，但是，即令中国的制成品出口在今后每年增长13—14%，能在人均GNP800美元时达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80年代初仅达3%左右），它也主要用来打破国内需求和国内供给之间僵化了的联系，或主要用于支付初级产品可能增大的进口。我们只能在适当的贸易逆差的基础上利用外债，没有理由对资本净流入的增长抱过分乐观的希望。

如果无视上述两种基本约束，不惜大幅度削减积累和投资份额，无节制地扩大资本净流入，那么我国中期的经济发展也许将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样，当我们循着协调我国既有结构偏差的

方向，主动提高居民消费比重时，很快就发现在这方面从事调整的余地极其狭小。除了适当减少公共消费所占比重之外（在“标准转变过程”中，从人均300—900美元区段，公共消费比重仅下降0.2个百分点），我国居民消费份额偏低的惯性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只好继续保持下去。

但是，我国的居民消费部分占GNP比重所独有的超常偏低，建立在把占人口80%的农村居民隔绝在国家工业化发展进程之外，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把20%的城市居民隔绝在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影响之外，限制内外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自1978年以来，这个基础已经根本动摇。正如在经济生活中显示出来的那样，居民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及其增速的适当加快，不仅难以遏止，而且本身就构成消化我国已有工业化成果、刺激新成长阶段的生产和投资有效增长的必要条件。

可见，协调战略遇到的核心困难在于，持续保持较高的积累同迅速扩张居民消费，同样都为我国经济结构的协调所必需。积累与消费的矛盾也许是经济过程中永恒的矛盾，它现在有了同中国现阶段完成结构偏差协调这样一个发展战略问题密切相关的具体内容。

沿用传统的调节方法，等各种矛盾和冲突累积

到一定限度之后，过若干年就来一次行政性的国民经济大调整，不仅无法培养社会经济过程的各种参加者任何良好的预期，形成利益调节的合理规则和秩序，而且极容易引起过于强烈的震荡，造成严重的浪费和损失。因此不能将这类不得已而为之的方式凝固为解决我国长期发展问题的规范。

那么，其他出路何在呢？最近国内外不少研究者从消除我国经济结构偏差不协调的愿望出发，提出了在中国强调服务部门和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另一条发展道路。

服务部门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部门的优点是明显的。1981年我国服务业的人均固定资本为3035.5元，仅高于农业（人均407.2元），分别只及基础设施部门、矿业部门、制造业部门的50.3%、51.4%和83.5%。因此同样的一份固定资产，投放在服务业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创造更多的收入。同样明显的是，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并为提高工农业生产效率作出间接的贡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同市场机制发生作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中国的服务业比重偏小（产值比偏小16.9%；就业比偏小10%）的程度是严重的。因此“把加速服务业发展同体制改革联系起来，其所获数量很可能除回收成本（包括投资、熟

练劳力以及——在较小程度上——材料）外，还有盈余”。

按此构思，如果中国在2000年使服务业就业人数达到工业就业人数的150%，那么只要以26%的投资率即可实现人均800美元的增长目标。*

这个前景当然是诱人的。问题是，大规模增长的服务业需求来自何方？从理论上说，调高个人消费比率会增加对生活服务的需求；体制改革也会增加对生产和经营服务的需求。但是，要把对服务业大规模增长的需求转化为现实，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城市化程度必须大大提高。

统计表明，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存在着高正相关关系：用1965年101个国家的数据和1980年123个国家的数据计算，两者的相关系数分别达0.74和0.80。从几个持续高速增长国家的经验看，服务业比同等收入水平的“标准结构”偏高的，城市化程度一般地也偏高（如约旦、巴西、新加坡），城市化偏低的，服务业也偏低（如南斯拉夫、沙特阿拉伯、葡萄牙、希腊），服务业接近标准结构的，城市化也偏高（日本、南朝鲜）。1965年的101个发展中国家只有4个亚洲国家（南朝鲜、菲律宾、泰

* 世界银行考察团：《中国：长期的发展问题及面临的选择》，财经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国、巴基斯坦）和1个南美洲国家（波多黎各）的服务业就业比率是高于本国城市化程度的（差额分别在0.3—7%之间），但这些国家的城市化程度都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标准结构”。

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程度偏低，假定实现世界银行的建议，到2000年使中国的服务就业占总劳力的25%，相当于中等收入国的目前水平，那么相应需要中国的城市人口比率也提高13～14个百分点。

城市化的急速推进。如果不是满足于建设一批“村庄式的都市”的话（那样的“城市”生活也不能使对第三产业的有效需求扩张多少），那么恰恰又离不开投资的快速增长。1960～1982年期间，全世界123个国家按收入分组，上中等收入国的城市化增长最快（从45%增至63%，上升了18%）服务业就业增长最快（增长11%），同时投资增长也最快（年平均增长7.5%）。低收入国城市化增长最慢（增长了4%），服务业就业增长也最慢（增长1%），投资的年平均增长也较低（年平均增长4.1%），低于中等收入国（7.1%）。

至于在城市化水平很低条件下实现服务业高度发达，即令可行，也必定要求更高的投资（多半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1983年的126个国家中，服务业就业率高于城市化程度的国家共有18个，其

中只有8个国家的服务业就业比率是高于所属收入分组平均水平的。在这8个国家中，有5个国家的前10年平均投资增长率超过了分组平均投资增长率；2个国家缺乏数据；1个国家的前10年投资增长率偏低。

所以，笔者认为问题还是绕了回来：服务业大发展所可能带来对资金的节约和效益的提高，本身要以用于加速城市化和高投资为先行条件。这里隐含的冲突是：通过提高个人消费比率来扩大对服务业的需求，可能同时会因为投资率、减慢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而难以实现；反过来，如果用偏高的投资率来推进城市化进程，那么至少在一个不短的城市建设周期内，对服务业的需求可能会因为压住了个人消费比率的回升而显得不足。

总之，协调我国结构偏差所面临的这个两难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5-3 经济流程：一个新的着眼点

看来非常有必要用明确的语言指出，我国经济结构变革所面临的特殊矛盾，以及为解决这个矛盾所常常陷入其中的特殊困境，只凭借对经济的数量

关系作一些技巧性的调整是不能奇迹般地摆脱的。根本的问题发生在传统的经济体制和既有的资源配置格局之中，不突破旧有模式，问题注定是无解的。

旧模式由国家直截了当地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获取高积累，然后集中向着高有机构成的重工业方向使用。这同许多国家首先将财富的大部作为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然后通过金融市场凝聚起来再进行投入的过程是不同的。关键的差别是国家直接支配的积累基金都是途经财政拨款、软性约束的银行贷款等通道进入使用的，因此有效的资源动员遭到了低效率资源利用的严重抵消。

低效运转无法实现重工业领先战略的预期目标，于是不仅低消费比率的格局长期保留了下来，而且消费绝对额的增长也长期滞缓。这就限制了居民的非食品消费、特别是其中的耐消品和服务部分的正常增长。这种格局既无法使就业弹性较大的消费品产业、服务业得以正常发展，因此社会的非农就业率不高；也缺乏推动工业结构变化的国内市场条件，只好使重工业结构进一步指向循环不止的自我服务。

不断地由国家向重工业部门直接分配资源，同时又要在低消费格局下确保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只好使财政位居全部经济生活的中心位置，通过大幅度歪曲农、轻、重产品价格，实行定量配给。为在所有重要的产品比价大多歪曲的基础上建立起产品交换的秩序，就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人为手段抑制城乡之间、各产业部门之间和各部门内部要素的转移和流动。这就使我国的就业制度、企业制度、价格制度和财政制度变得僵硬而低效，不仅大大减低实现目标的效率和时间，也不利于缓解战略选择引起结构偏差所产生的矛盾。另外，它还丧失了许多纠正战略失误的机会。

内向性贸易格局显然同国际封锁的时代环境以及大国规模有关，但也因为资源配置体制的毛病而错过许多机会。出口结构中，初级产品长期占居主导地位，但其中净出口比例较大的还是使用自然资源比重大的产品（如矿物燃料、润滑油及能源），而并不是使用廉价劳力比重大的产品门类；在制成品中，重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比重不大已如前述，轻制造品的净出口额也很小，同时其中不少也还是借助了自然资源的稀缺才打入国际市场。中国的出口结构并没有体现自己真正的比较优势，特别是没有利用劳力廉价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占据应有的份额。

概括起来，我国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一旦在原有经济体制的外壳里实行起来，就遇到了一系

表5—2 不同国家（地区）全要素投入和全要素增加的比较 %

	附加价值的增长率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全要素投入的增长率
中国（1952—1981年）	6.00	−0.30	6.30
印度（1959/1960—1978/1979年）	6.24	−0.18	6.42
南朝鲜（1960—1973年）	9.70	4.19	5.50
日本（1960—1978年）	10.90	4.50	6.40
香港（1960—1970年）	9.10	4.28	4.82

资料来源：钱纳里手稿，第2章，第14页。

列的“漏斗”。总的结果是，我国最稀缺的资源（资金、技术、人才）因其产品投向基本不面向最终产品市场而利用效率最低；最丰富的资源（人力）则无法充分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而开发程度不高。整个国民财富的流转进程中，存在着过多的不协调、阻滞、摩擦和对抗，当然无法使财富达到与资源投入相称的极大增长。表5—2显示的结果实在令人无法甘心。1952～1981年我国综合要素投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3%，其中劳力投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6%，资本投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6%（劳力的权数为0.59，资金的为0.41）。在这样长的区间保持这样高的平均全要素投入增长率，应当说是罕见的（印度和日本只是在一个短得多的时间区段里，才保持了同我国差不多的全要素投入增长

率）。但中国的附加价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却比自己的全要素投入增长率还要低！这样就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3%，同印度的情况相近，而负值的绝对额更大（印度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为－0.18%）。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我国经济体制严重不适应发展战略的总标志和总度量。

比较研究表明，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只有20%可从积累率的变动得到解释，其余则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加以说明。因此，形成积累和消费的经济流程的特征就比它们的数量比例划分，更对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必须深入到经济流程的效率特性这样的分析层次，才能牢牢把握住解决我国结构偏差问题的根本。

5-4 日本经验的启迪

日本流程的特性之所以对我们富于启迪意义，可能首先在于它的积累和消费的偏差走向都与我国相同，但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结果却迥然相异。

日本经济流程的主要特征是，在国民收入的初

次分配中，首先由个人同企业获得绝大部分，然后通过突出高的个人储蓄率和企业自身资本充实，途经发达的银行系统和多种投资主体，最终形成全社会的高积累。

1955—1970年期间，日本人均GNP从280美元增加到1,960美元、同期居民人均金融资产余额从160美元增长到1,880美元，占人均GNP之比从57%增长到96%（见图5—1，数据见表5—3）。

1970年，日本居民个人金融资产余额达70兆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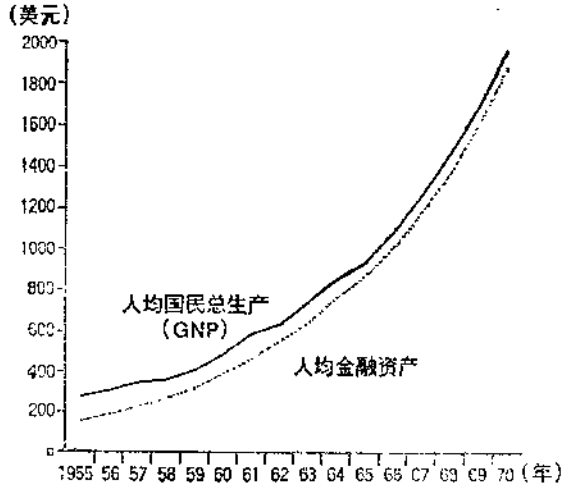


图5—1 日本1955—1970年间人均金融资产余额和人均国民总生产（GNP）

表5—3 日本1955—1970年期间人均GNP和人均金融资产

（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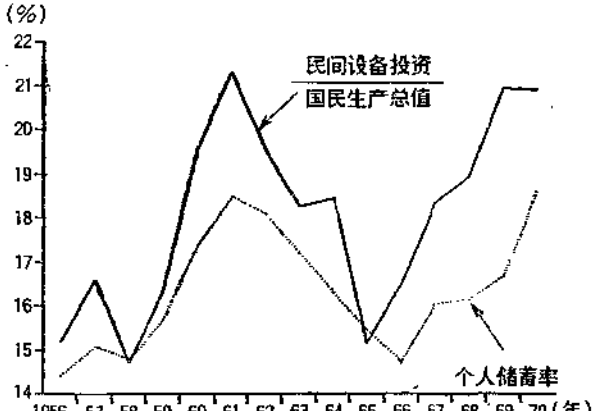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人均GNP（A）	(230)	310	340	360	410	480	(590)	630
人均金融资产(B)	160	190	230	270	320	390	460	550
(B)/(A)	57	62	66	75	78	81	79	87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人均GNP（A）	740	850	930	(1060)	1260	1460	1690	(1960)
人均金融资产(B)	640	760	860	1010	1180	1370	1610	1880
(B)/(A)	87	90	93	93	94	94	95	96

资料来源：伊藤正则：《日本高速增长时期资金的筹措和金融的作用》。

元，整整比1955年时的5兆日元增长了13倍。在这70兆日元中，信托存款占5.9%，保险占13.7%，各种有价证券占14.2%，定期存款46.9%，现金活期存款占17.2%。多种民间金融资产成为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激增着的民间设备投资的主要来源。高达15－20%的个人储蓄率成为同经济景气密切相关的经济变量。（见图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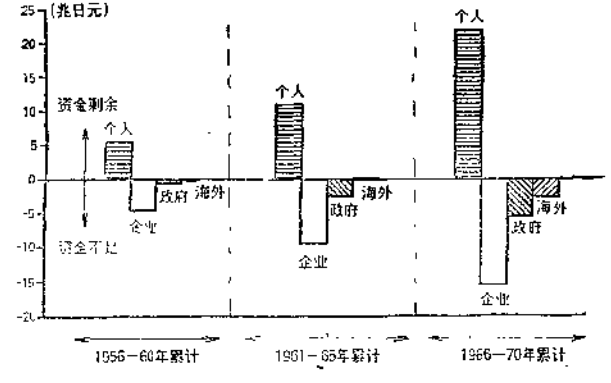
有意味的是，日本的高积累是在企业、政府及海外资金不足，而个人资金剩余的基础上实现的。1955～1970年的每个阶段里，都是居民个人的资金剩余补充了企业和政府资金的不足（见图5—3）。以1965年的情况为例，当年全日本国民总支出（33



（注） 1965年由于不景气的原因，民间设备投资率降低。

资料来源：同表5—3。

图5—2 日本的个人储蓄率与经济景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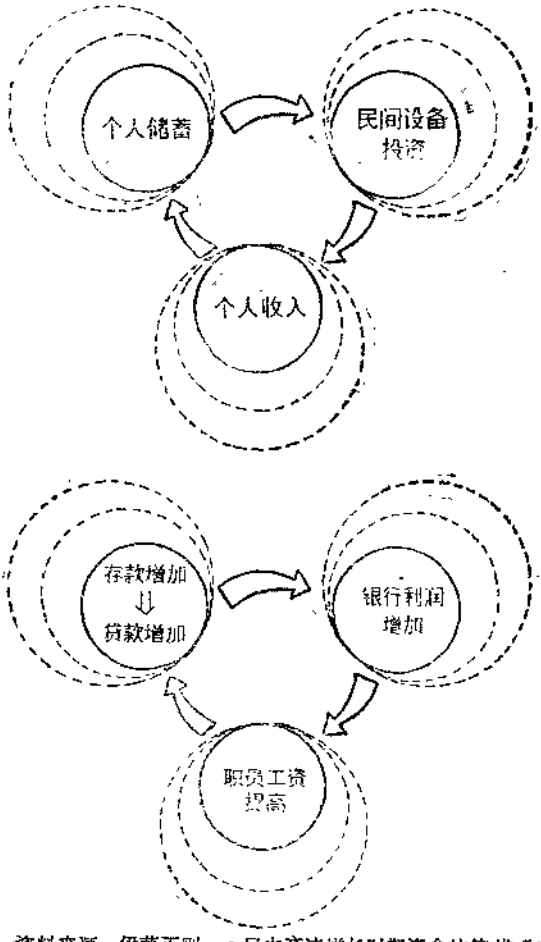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同上。

图5—3 1955—1970年日本社会经济各部分的资金剩余和不足

兆元）中，居民个人收入占72.7%，减去所得税（7.6%），加上转移收人（3%），个人可支配收入为22.5兆日元，占68.2%。但个人可支配收入并不等于个人消费，后者仅19兆日元，占国民总支出的57.6%；其余为个人住宅投资和折旧（共2.6兆日元，占7.9%）。扣除个人消费和住宅投资、折旧，尚有个人资金剩余2.1兆日元；而同年企业资金不足1.6亿，政府资金不足0.5兆日元，正好以个人资金剩余加以弥补。最后，才形成当年国民总支出结构：个人消费占57.6%，政府消费占9.1%，固定资本投资占24.2%，住宅投资占6.1%，库存投资占3%。

换言之，日本的高积累是相当曲折的经济流程（国民收入形成——>向个人和企业分配——>个人储蓄——>其他金融环节——>多种投资主体——>高积累）的最终结果。日本流程能够多提供银行和其他第三产业的工作岗位，增加充分就业机会，并增加从这些环节中产生的各种收入（工资、利润和税收），并使它们又会成为增加储蓄的推动，形成如图5—4所示的两种良性循环。特别是由于该流程把社会资金纳入了受到具有远见的产业政策调节的银行体系通道，因而从制度上为提高积累和投资的效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多的人口积极地卷入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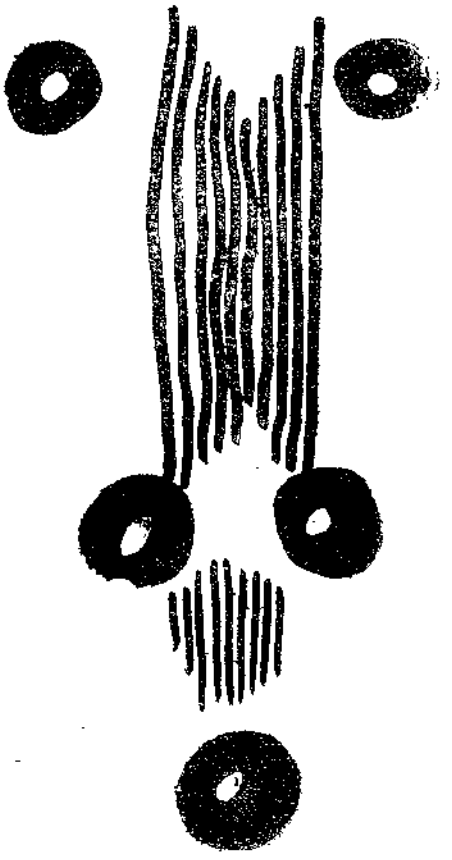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伊藤正则：《日本高速增长时期资金的筹措和金融的作用》。

图5—4　日本流程的两种良性循环

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充分就业带来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同过头来推动更高的人均储蓄率和更多的积累额，构成不断的自我发动。1960～1973年日本综合要素投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4%，但其附加价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9%，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达到4.5%。（见表5—2第4栏）可见，不同经济流程最终实现的积累率即使大体相等，也可因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的不同，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极不相同的影响。正是经济流程的特性，对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有决定性的长程影响。

从总的结果看，虽然1960年日本的私人消费比例仅占GDP的57%，比当时同等收入水平的“标准结构”低16.6个百分点，1980年这一比例也只提到59%，仍比同等收入水平的标准值低10.2个百分点，但日本私人消费的绝对额增长却保持着市场经济工业诸国的最高记录，私人消费总额从24,544.2百万美元增长到613,588.2百万美元，20年扩张了差不多24倍；人均私人消费额则从256.5美元增长为5,253.3美元（均为1980年美元），增长了近20倍。日本在低消费比例的同时迅猛扩张消费总额，对于消化积累、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偏大偏重的结构之果，可能做出了并不亚于开拓国外市场的贡献。

日本流程启发我们高度注意那远比积累与消费之间表面的数量关系更为重要、更为深刻的东西。中国只有全面更新经济流程的特性，才有希望解决在旧有流程下无论如何无法根本解决的对立和冲突，探求建立结构偏差的协调体系。



第六章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流程的变化

6-1 何谓“总需求”膨胀

1979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流程发生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这意味着原有的低效经济流程，并非注定不可更改。事实上，近年我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流，就是通过资源利用方式的改变和使用效率的提高，来迅速增大国民财富的总量。

在总结改革经验与推进改革的过程中，经济流程变化的重要性并非人人知晓。这既是因为我国的新经济流程还需要经过相当的发育时间后才能形成稳定的形态，也因为传统的经济观念追捕动态过程的能力极为有限。这就常常使人们忽略对经济流程的研究，而急于对未定型的事物作出判断性结论，这种方法有很大的片面性。

例如所谓1984年以来我国“总需求膨胀”的说

行论断中，就包含了许多不清楚的地方。

“总需求膨胀”是由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组成的。但既然是投资和消费同时膨胀，这就需要我们弄清楚膨胀的概念是指绝对额的增长还是指相对比例的增长。这两者的增长对经济发展来说有着迥然不同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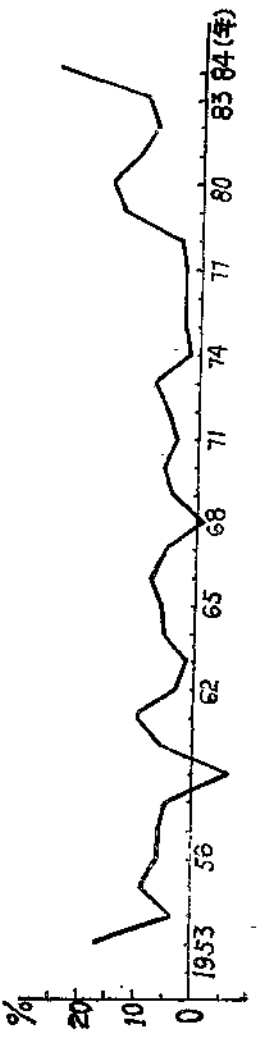
人们批评消费膨胀或投资膨胀往往集中在这两大变量的增长率上。已有的统计数据似乎可以支持上述看法。1979～1984年全国银行工资性支出平均年递增11%，全民所有制单位支付的劳保福利费每年递增21.04%，它占工资总额的比重从1978年的14.3%上升到1984年的24.0%；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0.01%，其中国家预算外投资的年均增长达26.29%，后者在固定资产的投资总额中的比重由1979年的20%上升到1984年的45.6%。另外，从居民消费看，1979～1984年每年增长12.35%，略快于同期国民收入的年增长（11.04%）比1952～1978年居民消费的年均增长率（5.33%）要快得多。图6—1是1952—1984年居民消费增长率的曲线。

显然，这里所讲的膨胀实际上是投资额或居民消费额的绝对增长，而不是投资或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的增加。

但是，为了清楚地分析问题，我们还需要从整体上判明所谓的投资、消费膨胀怎样改变了国民经济运行的主要比例。30多年来我国积累率和消费率的变动情况如图6—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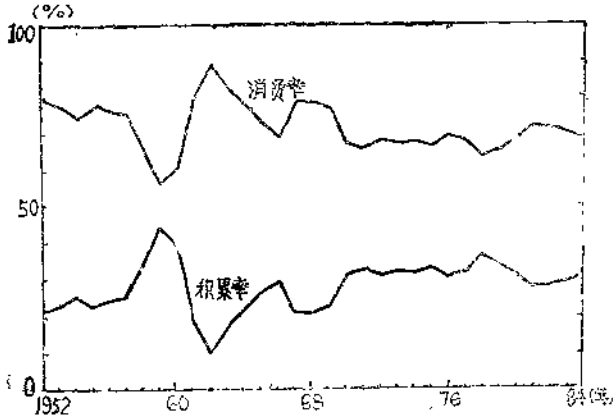
图6—2显示，1979—1984年积累和消费两大比率很稳定，积累率大体维持在31.19%左右，消费率则维持在68.81%上下。

换言之，近年我国积累和消费绝对额的迅速增长，发生在两大变量比率均少变动的条件下。这个事实在我们讨论总需求膨胀问题时应当加以注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5》，第38页。

图6—1 1952—1984年居民消费增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5》，第97页。
图6—2 国民收入消费率和积累率

6-2 新支点：两个不再相等的经济变量

新的经济流程所以难以被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流行的经济观念将“居民收入”与“消费”完全等同起来了的缘故。

必须指出，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中，居民个人只能拥有私人消费性质的资料，所有积累的和社会消费的部分，都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即被预先扣除了。在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实践中，这差

不多也就是实际的情形。

但是商品经济不可阻挡的发展，却使上述模式发生了变化。

从我国的情况分析，首先是国民收入中经个人支配的比重明显增大。1979～198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7.6%，职工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1.5%，扣除物价因素，分别为14.8%和8.2%，均超过同期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6.9%）。

其次，居民的个人收入愈来愈不再基本等同于个人消费。从货币收入形态来看，6年内，全国居民人均货币收入平均每年递增16.3%，超过人均货币支出的年增长率（13.7%），人均当年“结余购买力”以每年51.6%的高速递增，大大超过此前26年3.1%的年增长速度。1984年末，全社会“结余购买力”已达1,857.9亿元，占当年居民货币支出总额的66.7%。其中城乡储蓄存款余额1,214.7亿元，比1978年的210.6亿元增长了4.8倍。

同期居民储蓄倾向的变化是一个很好的佐证。1979～1984年平均储蓄倾向为9.30%，边际储蓄倾向为24.45%，比较起前30年有了显著提高。当然，由于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供给体系跟不上新成长阶段消费需求的变化所引致的

强迫性储蓄，同收入增加引致的储蓄增加。是需要仔细加以区分的两回事。但不管是正常的储蓄量还是非正常(即在我国特定体制变动阶段)的储蓄量，对于国民经济的积累来说都构成一个有宏观意义的流量。

从两组曲线（见图6—2）看，边际储蓄倾向高于平均储蓄倾向，意味着近年我国国民经济中收入

资料来源：根据宋国青、张维迎《关于宏观平衡与宏观控制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研究》1986年第6期）文中数据制成。

图6—3　全国居民平均储蓄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

转化为投资的可能性程度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增加量引起的边际储蓄量增加，看来更加代表了我国作为一个低收入大国走向富裕道路时经济流程中的显著特征。

1978—1984年，边际储蓄倾向虽然波动幅度大，但整体上已高于平均储蓄倾向。货币收入越是随体制变动而激增，那么可供社会积累的储蓄量就会越是可观，这正是边际储蓄倾向所显示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随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这一股崭新的流程将循序推进而不再逆回，因此对新成长阶段的结构变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企业支配的收入比重也大大增加，这突出地表现在国家信贷资金来源结构的变化中。1984年，各类企业在国家银行的存款余额1,333.79亿元，占银行全部资金来源的26.7%，全部存款的40.3%。加城镇居民储蓄和农村存款，共达2,482.84亿，比1979年增加1,607.7亿，在信贷资金来源中的结构百分比提高9.8。从积累来源看，1978年我国积累总额中，政府积累占73%，企业和家庭积累合计占27%；到1981年，政府积累份额降至49%，后者则上升为51%。

上述流量变化汇同财政投资的“拨改贷”改革，使银行在全社会积累和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了过去任何时候都不可比拟的提高和增强。1984年末，国家银行各项贷款总额4,419.57亿，比1979年末增长1.2倍，其中增长最快的是中短期设备贷款，从7.92亿增加到289.66亿，增长35.6倍。银行作为除石油工业以外提供利润最多的部门，本身已构成我国积累资金的一大支柱。

因此，尽管1979～1984年的年平均积累率大体接近前26年的平均积累率，尽管我国的投资的体制和机制尚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问题，但形成积累的经济流程已经发生了重要的、积极的转变，这一点值得从基本方向上给予充分的肯定。

消费方面也发生了重要变化。1981年曾是我国消费率向上调整的顶点，当年占国民收入的71.7%，为1970年以来所仅见。1982年后我国消费率即开始下降，但消费的绝对额却增加了1,016亿元，年平均递增12.1%（见表6—1）。

城乡居民个人收入的提高，有力地扩张了国内市场，进而带动国民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它提供了以下两个新的质点：

（1）为改革几十年沿袭而成的消费品补贴配给制度创造条件。近年我国所以能够大胆地将市场机制引入大部分农副产品的供求过程，包括城镇居民副食购销体制和农村粮食收购体制的改革，以及

表6—1　1978—1984年我国消费情况

单位：亿元

	消费额	居民消费	消费率
1978	1,888	1,673	69.5
1979	2,195	1,910	65.4
1980	2,531	2,223	68.5
1981	2,799	2,473	71.7
1982	3,054	2,680	71.2
1983	3,358	2,957	70.3
1984	3,815	3,365	68.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5》，第36、38页。

在住宅、医疗等等方面从事商品化尝试，归根到底建立在迅速提高居民个人收入的基石之上。

（2）个人消费中的非食物消费比重有所提高，其中家用电器、住宅和服务等消费的增长更为引人注目。与必需品的消费不同，高附加价值商品的消费本身能提供更高的产业利润和商业利润，因而可能成为较快回收投资并产生更多积累的源泉。比如农民自给性食物基本不提供多少税利，粮油工业每百元产值的利税也只有7.1元，但日用金属品工业每百元产值的利税即可达17.6元，电子工业为22.2元，建材工业则达29.9元。如果校正价格不合理因素，使之接近于供求平衡价，那么耐消品系列中产值利税率以至资金利税率在50～80％以上的产品决

不乏其例。传统经济仅在制盐、烟、酒等商品上体现的“消费即积累”效应，现在有力地扩大到某些耐用消费品和服务商品的领域。随着居民消费档次的提高，消费与积累绝对对立的界限也就模糊起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的流程能够增加产出的流量。

从总体上描述，我国的经济流程近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企业和居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了；第二，居民和企业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流量扩张，汇同政府开支中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的部分，使银行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地位和功能大大加强；第三，消费的流量和构成都发生阶段性变化，必需品供求机制的改革提上日程，耐消品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上升，大大增强了经过消费品市场对创造新国民收入的“乘数”作用；第四，市场机制开始引入投资过程，特别是要素的替代和要素的再开发利用，对提高投资效率起了积极的作用。

概括起来，向新经济流程的转折，使我国经济资源配置的间接性和市场性都得到增强，因而同时增强着各层次的经济资源利用的充分性和有效性。1979—1984年间，我国居民收入中除去储蓄以外

的消费部分，占国民收入使用额的年平均比重为57.2%，比1979年以前的平均结构百分比下降了6，因此并未挤压积累率。但是居民消费的绝对额却从1978年的1,644亿元上升为1984年的3,042.7亿元，增长了85%，年平均增长率达10.8%。可见，新经济流程正是以启动收入、储蓄、消费和投资这些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交互激励作用为特点，而区别于旧经济流程。它不仅为解决旧模式下无法解决的结构偏差难以协调的矛盾创造了前提条件，同时也为我国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上的资源重新配置提供了新的支点和杠杆。

6-3 要素替代与要素解放

进一步总结改革和经济流程的关系，我们发现改革与调整不尽相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不是通过改变积累同消费之间的数量关系去缓解原有经济流程的内在矛盾，而是通过**改变积累同消费在需求形成和使用过程中的互相关系和效率**，开辟出走向新的经济流程的通道。

供给方面的一些变化也在向新流程的转折中产生。旧投资模式的资金增密倾向，原来以相对地压

低居民收入为前提，但近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却为充分利用资源条件，在不削减以至增加居民收入份额的情况下扩张积累总量，开拓出了新的空间。下面我们着重考察其中三个基本领域：（1）运用劳动对资金的替代；（2）充分利用已有资产存量；（3）促使自然资源向社会资产的转化。

劳动对资金的替代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相对于资金和其他资源来说可以无限供给”的大国。粗略估计，目前农村过剩劳动力约占1/3，城市企事业单位的冗员也约占1/3，总数约在1.2～1.3亿。由于人口基数大，本世纪我国劳动供给人口将达6.67亿，需要从现在起每年增加1,000万个劳动岗位。因此，相对于土地、资金和其他投入来说，较大量的劳动导致较低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在我国可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经济现象。

这样的资源结构不利于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但是，事情也有着另一个侧面。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价格极低，如果能够加以充分的调度和组织，可以节约甚至创造资金。经验证明，尽管劳动和资本都是财富创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它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获得某种程度的互相替代。对至少25

个发展中国家作的劳力和资本之间替代弹性估量的研究表明，劳动对资本的替代弹性大约在0.5～1.2之间，意味着范围相当大。*

从技术上看，劳动替代资金的类型是极其多样的。一种基本类型是在各种生产过程中，使同样一份资金能和更多份的劳动结合起来，从而减少同等产出中的资金含量，提高资金或投资的利用效率。另一种基本的替代类型，则是运用劳动密集方式直接形成投资品，如只用简单的作具，凭人类劳动来创造诸如道路、桥梁、灌溉渠道、植树和建筑物等等。即使在现代工业国家，适宜于手工劳动的建筑活动也占总固定投资的50～60%；在发展中国家，这类替代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有着更为广大的用武之地。

问题在于，上述技术可能性在旧有经济体制下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因为第一，事实上存在着城乡隔离、产业垄断和种种妨碍积极就业的人为障碍，产品和要素无法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流动和重新组合；第二，要素价格根本不反映劳动力和资金的相对稀缺程度；第三，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缺乏追求收益极大、成本极小化的动力。三管齐下，

* 见《世界各国工业化概况和趋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227页。

严重阻碍了理应在我国最大规模展开的劳动对资金的替代，致使低生产率部门（农业）劳动对资金的替代（如大建水利），远抵不上高生产率部门（基础设施和重制造业部门）资金密度的增长，这对我国长远的经济发展，构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潜在的威胁。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当城乡体制的改革冲决了旧有束缚之后，我国的各个主要产业部门组织劳动替代资金的进程才得以重新启动。这里先描述一个总的轮廓：1979～1984年我国全社会劳动者的年增长率（3.0%）为前26年年增长率（2.5%）的120%；固定资产积累的年增长率（10.8%）为前26年年增长率（10.6%）的102%；而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8.3%）则为前26年年增长率（6.0%）的138%。这表明积极就业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较之干投资的贡献上升了，这个变化当然还仅仅只是个起点。但重要的是，它开始显示了扩大就业与提高生产率，以及消费与积累之间兼容的可能性。

充分利用已有资产存量

通常的发展理论总是非常关心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流量）中有多大一个部分能够转化为投资，形

成资本（存量）。这当然是至关紧要的事情。但是，许多超越了所谓“起飞”点（积累率>10%）的国家并没有因此进入发展的坦途。面对严峻的现实，人们不能不作出反思：已经构成存量的资产，是否得以充分有效的利用，从而为流量（收入）的极大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观察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第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出系数普遍比发达国家高；第二，1973年～1983年期间，低收入国年度国内投资每增长1%，引起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为0.88%，而在下中等收入国则为0.8%，上中等收入国为1.29%，市场经济国达3%。

可见，高积累率不足构成发展中国家持续高速增长的充分条件。究其原因，多种多样。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已经形成的资产存量。

过去几十年间，我国同所有发展中国家相比，流量存量化程度之高，足以自豪。1953～1984年，我国积累总额高达19,710亿元，占累计国民收入使用额的30%。同期，仅全民所有制经济累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即达12,739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9,634.4亿元，新增固定资产6,914.45亿元（估算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在8,000亿元以上）。

这惊人庞大的有形资产，**利用效率**如何呢？不少文献对此已作出了分析。诸如我国的基建投资的部门分布和区域分布方面的失调；设备利用率低；投资品的产成品库存、商业库存和储备库存都偏大；流动资金占用比率过高等等，早已引起反复的批评。1978年全国城镇2,000万人口待业，同时全部切削机床的利用率仅达55.6%，表明“高积累、低效益”的发展道路再也走不下去了。

通常认为这一切都是经济生活中的各种比例遭到破坏的结果。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中，同投资利用效率有关的各种比例关系，本身也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一种投资结构及其分布，在初期也许是合适的，但如何保证它能够伴随技术、产品市场和其他条件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变动呢？这恰恰是指令性计划体制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召唤着资产存量的流动、转移和重新组合。1979年之后我国在理论上承认生产资料同样也是商品，在实践上开放生产资料市场，组织各种设备租赁（包括融资租赁这样的现代形式）。特别是在各种横向联合中的设备扩散，使许多此地此处此时不能充分利用的机器设备，能在彼地彼处彼时投入有效运转。估算近年全社会资产存量中通过流动、转移而从闲置转入运转的总量在

200～300亿之间，虽然仅占总存量的2—4%，但已因此新增加几千万个就业位置，大大提高了劳动的边际产出。这样型式的投资增长显然无须削减消费份额及其增长率，而且，它还可以使各种新投资的机会成本有更准确的显示。这在投资主体的动力、行为有较大改善的条件下，又能反过来对提高流量存量化效率作出贡献。新的实践经验表明，在投资决策中仅仅注意积累率和投资率的高低，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高度注重充分利用已有资产存量对我国经济结构变革的战略意义。

自然资源向社会资金的转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把本来不属于商品的自然资源卷入商品化经营过程。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并不是因为它们作为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因而就天然有权要求有偿占有、付费、作价等等。决定这一点的是一系列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土地产品日益卷入同工业和服务产品交换的市场；土地的不同所有权；存在着事实上对土地的经营垄断；差别生产率。只要具备这些条件，由劳动创造的收入就会取得一种各要素均有“所得”的社会形式。对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不能例外。我国农村联产承包之后，级差土地收入在微观经济组织的

分配过程中由隐而显，逐渐成为一个激励性较强的杠杆。* 城乡改革的交汇和深化，则从宏观上开拓出在自然资源商品化过程中提供新的积累和投资源泉的巨大可能。

实际上，我国的初级产品净产出中地租所占比例极高。美国最可靠的数字是1956年地租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4%，差不多等于同年土地估值2,690亿美元的10%，近乎合理的贴现率，同公司资产的平均利润率大致相当**。日本1973年1月所有土地（除冲绳外）的市场价格为1972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32倍，地租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高于美国，达16%。***这表明在人口压力大，土地资源相对稀少，以及土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偏低的基础上必然产生出高额地租。用影子分析方法估算，我国农产品、矿产品、各类建筑产品净值中的级差地租比率都是极高的。

在初级产品（包括农产品和矿产品）由国家低价统购，同时又对加工实行垄断经营的条件下，地

---

* 参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农村经济变革的系统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 约瑟夫·凯珀等著：《地租的理论和测算》，切尔顿出版社1931年版。

*** 休·帕特里克、亨利·罗索夫斯基：《亚洲新巨人》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租并不直接表现为土地所有权的实现，而是以超额加工利润的形式，成为国家工业化积累的一个重要源泉。

近年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使上述存在条件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在农村，土地长期分户承包经营，农产品市场价格逐步放开；在城市，国营企业以利改税，初级品同加工品的比价正沿着双轨制途径合乎规律地调高。基本事实是，社会已经既不能通过国家来低价统购初级品，又不可能实行完全的加工工业的国家垄断。于是地租形态开始合乎逻辑地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全面显露出来。它要求正确运用政府的经济职能，全面推出以土地为中心的自然资源税。这不仅是初级产品低价统购改革的必不可少的配套条件，而且可能从此将日益明显而又日益增大的级差土地收益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社会资金，开辟我国积累和投资的新来源。

目前我国每年全社会建设用地约2,000万亩，累计的非农建设占地在10亿亩以上。从发展的趋势来看，国民经济结构变革对土地的非农用需求还将上升，非农用地在自然丰度、所处位置等方面的差别还将扩大。同时我们又不可能在短期内根本改变土地产品生产率的相对落后状况。因此，地租特别

是级差土地收入的总量会不可遏制地增长。针对性较强地着眼于这个现实，推进我国的税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那么开发中的我国自然资源就可能更大规模地转化为社会资金。

6-4 转折中的近忧与远虑

向新流程的转折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新问题。对此，许多总结我国近五年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分析1984～1985年经济形势的研究报告，已经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并形成多种说明和判断。人们公认，转折时期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旧的秩序和平衡已经无可挽回地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和协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但是，从结构变革和经济流程变化的角度来观察，这并不是什么“一揽子”方案可

---

* 就我们所见，这些报告主要有：周小川、楼继伟：《关于“七五”前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设想》；中国社会科学院“六五”经验研究小组，《对“六五”时期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回顾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六五”经验研究小组：《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选择》，《经济研究》1985年11期；华生、何家成、张学军、罗小朋、边勇壮《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

以使之消除的不协调，而是普遍存在于任何复杂系统演化过程中的快变过程与慢变过程之间必然要发生的摩擦和冲突。*

比如消费需求结构的快变同供给结构的慢变，导致了我国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加剧。1984年全社会零售商品货源3,502.0亿元，只及当年形成的商品购买力总额的89.8%，可说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但当年结余的购买力却达523.6亿元，等于当年总供给短缺部分（398亿）的131.6%。即是说，1984年又有125亿当年产品转为库存。从累计情况看，1984年末的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库存为1,789.0亿元，全社会商业库存当在2,000亿元以上，超过社会结余购买力总额（1,857.9亿）。在现实生活中，层层商业批发同零售组织之间的“搭卖”交易形成了一场独特的商战；居民的持币待购倾向则有增无减。这些，都很难简单地用总需求膨胀来加以描述和概括。

进一步分解，消费形成中消费观念和欲望的同步震荡效应是快变量，而消费层次和档次的多样化

---

* 协同学用序参量的概念来描述一个系统宏观有序的程度。有的参数（为数众多）在临界点附近阻尼大、衰减快，叫快驰豫参量（即快变量），它们对转变的整个进程没有明显的影响；有的参量（一个或几个）则出现临界无阻尼现象，叫慢驰豫参量（即慢变量），系统演化的整个进程是由慢变量主宰的。

格局形成，则是慢变量；在供给结构变动中，动用外汇储蓄形成供给能力是快变量，组织国内资源，改组生产体系和技术服务体系则是慢变量。中国象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遇到了“对消费欲望变化最快的需求项目，供给能力往往适应得最慢”的严峻挑战。

消费品市场的供需失衡通常可经储蓄得到调节：一部分结余购买力向投资品市场分流，一部分则可以进入贮水池。问题是我国储蓄系统的组织和规则都产生于低收入阶段，同所发生的收入变化相比，更是一个慢变过程（如因储蓄网点不足而出现的持币待储，以及至今银行存款利率甚至不能对通货膨胀率作出正常反应等等现象）。至于投资品市场上同样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资金运用的微观活跃（地方、企业和家庭经济的各种集资），也因遇到资金市场发育不足这一超慢变量的阻滞，而一时难以产生良好的宏观效果。

在一系列快变过程同慢变过程冲突的背景下，发生了1984年下半年的“经济失控”。上千亿“自由”资金，受到环境扰动信号的任意支配，成为随时可以冲击投资品市场、冲击消费品市场、冲击国际收支平衡的不稳定因素，给转折时期的国民经济生活带来某种紊乱。

因此，强化转折期的宏观控制（即对经济总量的控制）是绝对必要的。为了尽快稳定全局，保证改革深入的必要社会条件，用行政手段遏制一切快变量（收入、企业收入、居民收入、消费倾向和投资冲动），使之同慢变过程相适应，也是可行的控制方案。

但是，必须同时认识到这样的控制并不是治本之策。在转折的关头，尽管退回到旧有经济的平衡可以获得稳定，但是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如何协调旧结构的超常偏差问题也依然得不到根本解决。因此，结构变革中产生的矛盾更适于用结构性对策来把握。事实上，慢变量的存在恰恰指示着深入改革的重点所在。围绕慢变量组织重点突破，以达到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最大一致，不仅有利于转折期的经济稳定，而且有利于最终完成向新经济流程的转变，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必定产生积极的效应。

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因为短期的扰动而放弃长期的目标。坚持对国民经济流程进行持续而坚韧不拔的改革，将决定中国走向中等收入水平的速度、状态、成败和命运。比之于现代化进程的重担，我国近年已取得的改革进展仅仅只是一场序幕。它解决的问题甚至还不如它引出的问题来得多。更大规模

地启动经济流程的更高质量的改善，是我们面临的中长期考验和挑战。

第七章
农村非农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变革中的地位

7-1 曲折的经历：农村非农产业的萌发

中国结构变革的特殊点在于，原有结构偏差不协调问题的存在，要求结构变革必须更新经济流程的特性，更加注重内部经济潜力的持续发动。从这样一个战略基点出发，我们无法忽略由我国国情决定的以下事实：

一方面，潜在市场容量作为总人口的函数，主体部分在农村，离开了占总人口80%的农民的收入、消费和储蓄的充分增长，离开了农村市场的不断开发，新经济流程中的几大发动机就不可能充分开动，更不可能达到基本结构参数之间的偏差协调。

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资源绝大部分分布于目前的农村，这就决定了农村将是一个组织劳动替代

资金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我国既有资产存量转移、扩散的一个主要场所；土地级差收益的社会资金化虽然要凭借国家政权的经济功能来推进，但其基本依托，即土地的所有权、占有权、土地产品的商品化及生产率的变化，主要也发生于农村。

还应特别指出，尽管我国农民进入非农产业部门时带有种种先天不足的因素，但是却拥有在经济体制上从未由国家“大锅饭”包下来的优势。城乡改革愈是深入，上述最基本的经济事实也就愈是能引起更多的宏观微观经济决策者的注意，引起他们在行为上的积极反应。正是在以上这样特定的背景下，我们重新认识到农村发展在国民经济结构变革中持久的全局意义。

我国农村的非农业经济力量，早就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在50年代，我国大约有2000万人正式或副业式地从事小规模（即少于10个工人的工厂）的非机械制造的工业生产。在这些人数中，大约有1,200万在农村，其中1000万人是农民兼业的副业活动，200万人是从事农村小规模工业生产的全日制工人。1952—1957年间，这些非农活动被集体化了。1958年，出现了最早的社队企业。这是目前我国农村非农产业典型组织形式——乡镇企业——的母体。60年代和70年代，社队企业的数量增加

了。到1978年，我国农村有150多万个社队企业，就业人数超过2,800万，总收入超过430亿元。

社队企业发展的历程艰难曲折，忽起忽落。大致有三个历史阶段：（1）50年代初创；（2）60年代基本停滞；（3）70年代局部发展。

中国社队企业是以为农业服务而获得自己最初生存的合法性的。早期关于社队企业“就地资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原则，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表7—1根据中国原12个工业部门划分的社办

表7—1　　社办工业企业总产值构成　　%

	1978	1980	1982
矿　业	1.90	2.30	2.41
电　力	0.47	0.60	0.63
煤　焦	5.60	4.61	5.46
石　油	0.10	0.14	0.08
化　工	8.32	8.45	8.21
机　械	33.51	29.12	24.80
建　材	19.48	19.61	20.69
冶　金	1.82	3.92	3.50
食　品	5.04	7.05	7.39
纺织、服装、皮革	9.54	14.25	16.63
纸、文具、文化用品	2.26	3.59	4.10
其　他	11.90	7.36	6.11
合　计	100.00	100.00	100.00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年鉴·1981》，第50页。

工业企业总产值构成。在这些工业类型中，有7个行业（矿业、电力、煤焦、石油、化工、机械和建材）是为农业提供要素投入和投资品的。1978年，它们占了社办工业企业总产值的70%。而其中机械和建材两项，就占了总产值的50%以上。前者是农业机械和技术装备的一个重要源泉，后者则为农业设施改进和扩建提供许多急需的基建材料与各种物资。剩下的五个行业（森工、食品、纺织服装、纸、文教用品、其他）占30%左右，主要用于农业和消费品生产。一些地区的社队企业生产在农用产品总产量中占了很大比例（见表7—2）。

社队企业通常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发展较为迅速。农村人均的收入量直接同各地区的人均农业和

表7—2　1978年和1982年社队企业占总产量的比重

产品/行业	社队企业所占的比重	
	1978	1982
磷　肥	84.0	43.0
水　泥	5.0	12.8
煤	14.7	20.7
机制纸和纸板	9.8	10.4
丝　绸	11.3	15.7
糖	7.9	4.0
酒	7.6	9.2

资料来源：同表7—1。

表7—3　1982年社队企业发展按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地区分组

	人均工农业总产值	农村人均农业总产值	农村人队社企业总人均收入	社队企业从业人数占农村人口的百分比	每一社队企业就业人数的社队企业总收入
国民的	803元	270元	104元	3.9%	2,700元
按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地区分组					
2,500元以上〔1〕	4,095	766	795	15.1	4,870
1,000—2,500元〔2〕	1,287	457	223	6.6	3,954
600—1,000元〔3〕	743	340	114	4.6	2,507
600元以下〔4〕	511	269	47	2.2	2,147

〔1〕北京、天津、上海。

〔2〕辽宁、黑龙江、江苏。

〔3〕吉林、浙江、湖北、山东、河北、山西、广东、内蒙、湖南、陕西。

〔4〕福建、江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河南、江西、四川、贵州、云南、安徽。

资料来源：同表7—1。

非农业的总产值相关。（见表7—3）。1982年在落后地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低于600元），农村人口的社队企业人均收入只有47元；而在最发达地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超过2,500元），农村人口的社队企业人均收入为735元，几乎16倍于落后地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高，人均社队企业总收入也一定高；反之则低。这看来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考虑到

不发达地区社队企业中有更大的部分是从事农业的企业，因此上述分布会更不均匀。

表7—3也显示，在较发达地区社队企业不仅吸收较高比例的农村人口，而且所吸收的生产性工人（同样每个工人总收入的估计数）比例相应较高。这意味着，发达地区社队企业活动的结构更接近于"城市型"的工业活动（诸如从属于大工业企业的契约性企业和为城市与出口市场服务的企业），因此它更好地和大工业相整合。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得社队企业的早期结构与全国工业的偏重结构十分相似。如果加上县级"五小"工业，更可以说明这种结构是畸重型的。这个并不是由农村自身决定的特点，在以后还要延续多少年。值得庆幸的是，尽管60年代和70年代总的经济环境——片面的"以粮为纲"政策、强调县级"五小工业"的发展、低估农村工业在城市

表7—4　　社队企业总收入占公社、大队、生产队经济收入的比重

	1976	1979	1980
总收入（亿元）	272	491	614
它占公社、大队、生产队经济收入的（%）	23.3	30.6	34.6

资料来源：《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工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以及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农村副业活动和社队企业被批判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受压制——是非常不利于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的，但社队企业还是挣扎着取得了反映在表7—4中的成绩。它显示了农村非农产业的顽强生命力，预示了在新的有利条件下能为国民经济结构的变革做出巨大贡献的潜力。

7-2 效率尺度：发展非农产业的宏观评价

1979—1985年乡镇企业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意料。包产到户的冲击力并不仅仅体现在农业的超常规增长上。它引起要素流动的解放，也赋予农村非农产业以新的活力。人们已经普遍地注意到，农村非农产业的增长过程在我国农村的实际生活中已经蓬勃展开。1985年我国乡镇企业已发展到1,094万个，从业人员6,416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18%，绝对数相当于全国建国以来形成的全部正式职工人数的一半以上；总产值2,481亿元，占社会总产值的15.3%，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40%。当然乡镇企业并不是全部从事非农产业活动的。剔除其中的农业部分，1985年全国农村非农产业总收入2,010.9亿

元，总就业4,577.54万人，分别比1979年增长3.44倍和0.92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8.21%和11.54%（见表7—5）。这个增长速度显然远高于同期农业收入和就业的增长。

表7—5　1979—1985年农村非农产业的增长　%

	收入		就业	
	总增长	年均增长	总增长	年均增长
1.工　业	2.84	25.18	0.72	9.49
2.交　通	3.61	29.09	0.92	11.55
3.建　筑	6.44	39.25	1.92	19.60
4.商业和服务	8.41	45.30	1.40	15.22
5.合　计	3.44	28.1	0.92	11.54

资料来源：乡镇企业统计资料。

农村非农产业自它诞生以来就经常被指责为效率太低。但是首先应当问的是，如果没有“土里土气”的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效率会怎样？

表7—6是我国不同部门的人均净产值比较，从中可以看到，每个农业就业人员提供的净产值，分别只及矿业的15%，制造业的14～64%，初级基础设施部门的17.8%和服务业的37.1%。这就是说，平均而论，每向非农产业转移一名农业劳动者，即可增加1,979.4元净产值。按此推算，1979～1985年间我国农村增加的2,000多万非农就业人员。即等

表7—6　1981年我国不同产业部门的人均净产值

（元）

	(a)	(d)	(e)
农　业	555	513	615
矿　业	—	2,053	4,093
食品加工	3,853	4,325	951
其他轻工业①	2,430	2,755	1,414
其他重工业②	2,200	3,190	2,386
机　器		2,115	4,202
初级基础设施③	1,668	2,025	3,457
服务业④	1,792	1,628	1,658
合　计	985	1,050	1,207

说明：（1）表中（a）列系物质产品净值概念；（d）列已把各种隐蔽的服务业考虑在内；（e）列调整了价格误差。

（2）①纺织、服装、木材、造纸和其他制造业；②化工、煤、石油产品、非金属矿物和金属产品；③建筑、电力、煤气、供水、运输；④商业、教育卫生、公共行政、国防和其他服务。不包括住房。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结构变化与增长的可能性和选择方案》，气象出版社1985年版。

于增加了400亿元净产值，约占同期新增国民收入的11～12%。因此，非农产业的发展首先是大大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实现了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禁止农民转移，只能损失更多的宏观效率。

农民从非农产业获得的货币收入额，目前只能用间接推算数据来说明。1979年全国社队企业的人

均工资收入238.5元，加上返还到队分配的那部分，约在245元上下。如果这个数据大体反映了当年农村非农产业的货币收入水平，那么1979年的农村非农货币收入总额当在58.2亿元，占当年农村生产队和社员货币收入的6.1%。用同样的办法计算，1984年农村非农产业的货币收入为288.3亿元，占农村总货币收入的12.5%。这个粗略的推算可以表明，非农产业的发展已经对农民的货币收入结构发生了影响。而正如第1章中指出的农民的货币收入增长成为国内市场扩张的一大支柱，是近年最重要的经济现象。

事实上，在1984年以后，这个变化趋势才更加明显。因为农产品超常规增长的条件变化了，原来作为农民货币收入增加的主要动因——出售农产品、特别是出售粮食和棉花得到的现金收入，增长势头减缓了。据国家农调总队对6.6万个样本农户的抽样调查，1984年平均每个农民的非借贷性现金收入为295.95元，其中从非农产业得到的占28.2%；1985年为357.39元，其中非农产业收入占33.4%。1985年农民出售农林产品得到的现金比上年增加了2.8%，而非农产业收入则增加了43.1%。这一年全部人均新增的现金收入（61.44元），可由后者说明的占58.6%。从农民的非借贷性现金支出情况

来分析，1985年平均每人支出331.23元，比上年增长21.7%，推算新增现金总支出为450～470亿元左右，其中由非农收入支持的部分达250亿元以上。因此，1985年国内市场的迅猛扩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305亿元，比上年增长27.5%，扣除物价上升因素，实际增长17.2%），农村在其中起了突出作用。

我们曾经指出，伴随着近年人均国民收入的较快增长，我国消费市场的需求结构正在发生重要的阶段性变化。但是，由于供给系统不能作出适应性变化，因此市场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起来。

结构性矛盾是一种严重的挑战。弄得不好，它不仅会拖住国民经济走向新成长阶段的步伐，而且可能带来某种程度的紊乱和振荡。

但是，农民货币购买力却是一种缓冲剂。农村居民的消费起点较低，决定了其购买指向的商品档次略低一筹，比较容易地由国内现有供给体系来满足，据对主要商品人均消费量资料的分析，1984年乡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之于城镇居民，12种食品除粮食和盐，均只及20～90%，26种日用消费品除卫生衫裤和全塑料鞋之外，均只及17～74%，9种耐用消费品，则只及5～65%。乡村居民的需求更易由国内生产系统来满足。相当一批多年积压的商业

库存，主要也是被增长的农民购买力所消化。如果没有这股经济力量的中和，那么不仅我国近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无法想象，而且市场结构性矛盾一定会更尖锐。

从供给方面分析，农业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还提供了要素替代和再开发的新机会。

1979～1984年期间，我国乡村企业每新增1.22个就业岗位和4,100元固定资产，可增加一万元总产值；同期各类国营企业同样增加一万元产值，则须新增7,460元固定资产并只能新增0.4个就业岗位。这就是说，乡村企业每创造一万元产值，即等于用0.82个劳动力替代了3,360元固定资产。按此推算，1979～1984年全国乡镇企业新增加的836.15亿元总产值，即比全民制企业要多提供668.9万个就业岗位，替代下28.1亿固定资产。这足以告诉我们，不能小看乡镇企业的崛起对劳力多而资金缺的我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农民介入国民经济非农产业部门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原有资产存量向乡镇企业的扩散、转移过程。1978～1984年间全国乡村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共增加345亿元。根据一些典型调查资料估算其中购买二手机器设备的比重可达35～45%，总额约在120～155亿元之间。按资产存量对总收入的贡献份

额为20%计，那么这部分资产存量对此期间乡村企业总收入增长（每年增长19.7%）的贡献数额约为7～9%。

无论是大规模运用劳动对资金的替代，还是广为吸收城市资产存量对农村的扩散转移，都离不开货币的推动。乡镇企业发生发展的进程表明，农村产业结构变革，能够依托于不断汲取自身释放的结构生产力而得到持续深化。1980～1983年，全国乡镇企业新增投资332.0亿元中，来自企业内部积累的部分占56.6%，企业自筹占12.6%，银行信用社贷款占30.8%。1984年以来的情况有所改变。但以1979～1984年总计，银行和信用社对乡镇企业新增贷款264.5亿元，而同期乡镇企事业新增存款98亿元，加上企业职工储蓄约180亿元，共增加存款278亿元，超过同期新增贷款。除自身扩大再生产以外，六年间，乡镇企业共上缴税金总额262.8亿元，为同期财政支援乡镇企业资金70亿元的3.8倍；上交乡镇利润308.0亿元，差不多相当于同期国家[3]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

总之，乡镇企业的基本模式就是通过廉价劳力的组织来替代一部分资金，又通过放大在自身积累基础上的“货币推动”来扩大替代的范围，经过各种曲折的途径利用社会既有的资产存量，推动一部

分原先隐蔽在农业部门的劳动要素，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只有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特征及其在现阶段的发展要求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对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真正给予充分的肯定。

7-3 农民转移的基本规则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落后的国家来说，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仅面临如何深化结构变革的问题，而且还需要按照经济合理性原则充分有效地运用劳动力资源，尽快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因此，研究、探索现有劳动力的转移规则，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已有的见解认为，劳动力从农业转入其他生产部门所表现的职业性转移，可以从每个劳动者货币报酬的差异中得到解释。经济史料和统计表明，后实现现代化国家之中经营农业所得的实际报酬，总是小于从工业、商业及自由职业等所得到的实际报酬。当工商业在扩张时，这种差别变得更大。人们把各个部门与农业部门的收入差异称之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内在推动。同时把非农产业扩张后对劳动力需求的扩大，称之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外部需

求。

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可以得出动态的结果，即农业的相对国民收入（比较劳动生产率）在大多数国家都低于1，而第二、第三次产业的相对国民收入则大于1。库茨涅兹对此就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作了横截面的分析。他对40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就1948年到1954年这7年间的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做了统计分析。他把这40个国家按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分成了7个等级，计算了每个等级国家的三个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果进一步发现，不发达国家的第一次产业和第二次产

表7—7　第一、二、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1948年至1954年的平均值）

人均国民收入水平	国家数	比较劳动生产率		
		第一次产业	第二、三次产业	第一次产业 / 第二、三次产业
Ⅰ	7	0.86	1.03	0.86
Ⅱ	6	0.60	1.19	0.52
Ⅲ	6	0.69	1.15	0.62
Ⅳ	5	0.48	2.02	0.27
Ⅴ	5	0.61	1.48	0.42
Ⅵ	7	0.69	1.72	0.45
Ⅶ	4	0.67	2.74	0.31

资料来源：西蒙·库茨涅兹：《国家经济增长的数量方面》，转引自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第51页。

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比发达国家要大。最发达的国家和最不发达的国家相比是0.86：0.31，相差近3倍（见表7—7）。

上述统计分析证明了农业劳动力发生转移的必然性。

我国蓬勃发展的非农产业的经验也同世界各国的普遍走向相吻合。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人均净产值）历来存在着低于制造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被禁止的时期里这种差距构成了潜在压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之后，上述压力明显有了缓解。1978年我国每一个农业劳动者所创造的农业总产值只有513元，1984年也才达到967元，而1984年乡镇企业（剔除农业企业部分）人均总产值为3,837元，比同年农业人均产出高4倍。农业与乡镇企业的人均产出量差别决定了收入分配有所差别的实际基础。同时它也非常有力地说明了农业劳动力普遍转向乡镇企业的基本原因。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指出，劳动力转移的发生不仅仅是由于人均产量的差异，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边际产出量（即增加一名工人相应增加的产出量）的差别，在许多国家中，部门间的人均产出量同边际产出量相差甚大。从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工人的转移更加依赖于边际产量，而常常不牵涉到

平均的情况。

对这一说法，我们用全国28个省市区的3组数据做相关统计来加以验证。1979～1984年农村工业行业的人均产值、边际产值与工业就业增长率的数据见表7—8。

表7—8　1979—1984年农村工业平均量、边际量和就业增长

	人均产值（万元）	边际产值（万元）	就业增长（倍）
北　京	0.5746	0.5074	3.8379
天　津	0.4720	0.4794	6.1789
河　北	0.3505	0.3831	2.3600
山　西	0.3408	0.3908	3.1947
内　蒙	0.2295	0.3143	0.7585
辽　宁	0.5803	0.5454	1.4937
吉　林	0.3184	0.4500	1.4315
黑龙江	0.3356	0.4935	0.6805
上　海	0.6817	0.6058	3.6139
江　苏	0.4487	0.5945	2.0577
浙　江	0.3581	0.4902	3.0098
安　徽	0.2087	0.3072	2.2117
福　建	0.2191	0.2870	2.4895
江　西	0.2559	0.3662	0.9987
山　东	0.3909	0.3485	3.0610
河　南	0.3111	0.4174	1.8055
湖　北	0.3252	0.4270	1.9930
湖　南	0.3014	0.3921	1.6709
广　东	0.3952	0.4817	2.0672

广　西	0.2413	0.3512	0.4517
四　川	0.3112	0.4214	1.1232
贵　州	0.1735	0.2137	1.0769
云　南	0.2390	0.3550	1.3512
陕　西	0.2678	0.3307	2.1361
甘　肃	0.2367	0.2380	1.1332
青　海	0.2031	0.1814	2.0416
宁　夏	0.2846	0.3502	0.4874
新　疆	0.2603	0.5478	0.7416
全国总计	0.3676	0.4583	2.0505

资料来源：据乡镇企业统计资料计算。

统计结果是，人均产值与就业增长的相关测定系数R^2为0.422，边际产值与就业增长的相关测定系数为0.089。这意味着近年农村非农就业的增长更加为非农产出的平均值所吸引，而较少为非农产出的边际值所吸引。

这对于我们国家的现阶段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按照边际产出量来确定劳动力的转移需要具备一个严格的基本条件：必须是处在一个充分自由竞争的环境里，企业完全可以根据市场价格的波动进行生产，并以此决定劳动力数量的取舍。否则，劳动力的边际净产出绝不等于平均的净产出。因此象我们国家，尽管全国乡镇企业的边际产出量高于平均的产出量，但非农就业的增长并不更依赖于这个边际量。

这一转移规则在我国进一步启动农村非农产业的结构变革时将依然产生作用。在实施农村非农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一时还难以用“充分就业”的标杆来制定合适的就业量。这里引用日本经济学家的一段话也许有用：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没有什么充分就业的概念。相反，强调的只是全面就业的概念，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每个人都有点工作做，尽管所得的收入都很低微。对于许多现在有着大量劳动力因而受到很强的压力的亚洲国家来说，这种全面就业的观点也许还有一定意义。”*

1979—1984年我国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弹性很高，分行业看全国农村非农收入每增加1，农村工业就业增长0.25，交通运输就业增长0.26，建筑就业增长0.30，商业服务就业增长0.17。几大部门的就业弹性值趋于接近，表明在我国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中，扩大就业的动机是非常强烈的。

7-4 我国农民的新世界

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还有经济以外的巨大收

* 大本佐武郎：《发展中经济类型的国家与日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8页。

益。对世世代代以土为生的农民来说，非农产业的发展首先意味着要学习另外一个世界的活动规则。特别是当非农产业突破了原先农村副业的藩篱之后，它就要求它的当事人（不论他以前是多么地道的庄稼汉）拥有新的头脑、新的眼界、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经理行为，来参加、建立并适应新的社会关系。这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必修课，课堂虽然简陋但意义却大得难以估量。

中国的农民历来是被看成与土地打交道的落后愚昧的小生产者，常常有人将农民同传统的、保守的势力等量齐观。但是，历史上的中国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创造出举世惊叹的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为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奠定了决定性基础。

如果说一个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进程时总需要寻找一种合适的传统形式这一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农民所拥有的勤劳与智慧是实现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有用的东西。特别是在几十年的“大锅饭”和“铁饭碗”体制下造成城里人普遍的懒惰和进取精神退化的参照下，我国农民——由于其数量巨大而实在无法由国家包下来——的品行，实际上起到了保存民族振兴基因的历史性作用。

当然近百年来我国在工业革命浪潮中的落伍，也使我国农民既缺乏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又无

足够的商品经营经验。然而，这些事实并不能使我们得出悲观的判决：中国农民是现代化的累赘。

恰恰相反！农民也是能够对有效的经济刺激作出积极反应的社会集团。经过多少年体制的人为压抑之后，中国农村自给、半自给的传统经济的支柱终于开始动摇。放开手脚的我国农民先是在种植业领域内发展多种形式的商品生产，继而又在农村非农产业内掀起了更为宏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浪潮。

1979—1985年这一段历史表明，我国农村大变革中最深刻的历史内容，在于使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转化，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化，从而使世世代代处于封闭、狭隘状态的亿万农民，同古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告别，开始了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

农村非农产业则是上述过程的“急先锋”。农村非农产业的典型形式——乡镇企业，已经同寄生于自然经济母体的手工业形式有了很大差别。一些现代化比较研究者指出：“‘现代化’的定义是：就同时存在的社会形式而言，无生命动力源泉对有生命动力源泉的比例已经增长到了或者超过了不可回转的程度。”* 因此，目前我国乡镇企业虽然形式

---

* 西黑尔·E·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8页。

落后、装备简陋，但它毕竟从家庭手工业的窠臼中走出来了，一开始就代表了农村现代化的新形式。

在80年代初期，中国农民开始大规模地转移到乡镇企业，这就使中国农民未来的世界得以显露：机器工业的工厂制度，严密的产业组织和劳动纪律，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未雨绸缪的投资动向，以及测不准、看不透的经营风险，一切的一切，凡工业社会种种的新形式都在深刻地冲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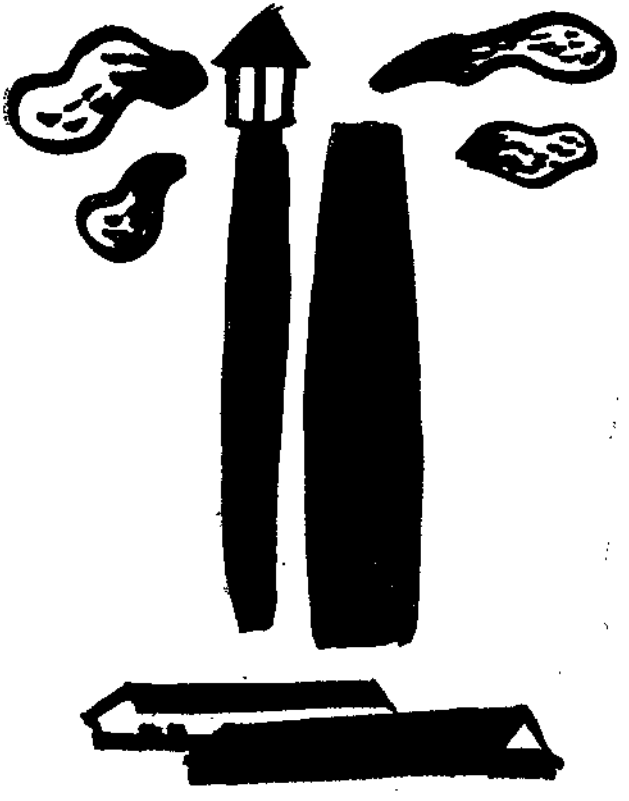
我国农民并非天然具备适于工业制度的素质，这个判断也许是对的。据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我国大学（和相当于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比例是1:11.01:29.50:58.83，而文盲和半文盲（12周岁以上）的人口竟有23,700多万。这部分人口大部分布于农村。这对乡镇企业的提高发展显然很为不利。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生产者的经营素质简单而唯一地等同于文化素质。调查研究表明，劳动力素质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它具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文化素质，另一层是生产素质；前者来自于教育和理论活动，后者来源于生产实践和经验积累。因此，一个文化素质并不高的劳动者却具有较大的生产能力，这并不悖论于上述概念的规定性。日本通过调整教育与生产实践两方面

的关系，既经济又迅速地扩大了国内实际的生产能力。例如1965年印度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占同龄人数的3.9%，而日本在1920年——这一年按人口平均钢产量和发电量相当于印度的1965年——这个比率是1.6%。

我国农民通过进入非农产业的活动，已经大大改变了自己原有的素质和品格。有一批农民开始从憨厚的表情中增添了敢于冒险、积极进取的坚定神色，节俭性的精打细算逐渐让位给了商业性的利益计较。一批优秀的农民企业家脱颖而出，各式能人层出不穷。这向我们显示了极有意义的趋向：虽然通向现代化的道路艰难曲折，但我国8亿农民的奋起进取，大大地缩短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减轻了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

因此，未来农民的形象虽不能够说是清晰的，但存于农民"记忆"中的勤劳、奋进的品质，以及他们那样迅速对外部世界作出的参与性反应，使我们对中国农民未来的新世界充满了信心。特别是对于我国城市而言。非农产业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体制改革的推波器。乡镇企业制度的改革比之于土地承包制的威慑力更大。因为城市财产的主体，在技术上完全不适合如土地那样的均平制承包。而乡镇企业恰恰从一开始就是非均平式承包的。经理

承包、股份制、合伙经营、分家制、租赁以至转卖，各种各样的试验在这里进行。至于农村非农领域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现实，更对城市体系发生着强大的影响。乡镇企业当然简单了点，但城市里的小企业、小小企业不也不少吗？中国的改革没有事先高举理论纲领，因此示范的实际作用就大了。后文将要提到，乡镇企业自身并不尽善尽美，体制改革的任务同样繁重。但是，这毕竟是由几千万完全没有靠国家包下来的人，在从事着的工业、建筑、商业、交通、服务活动。正是在这些活动中，包含着大量“究竟以什么运行组织方式来替代传统社会主义 经 济 模式”的可贵基因，这是苏联东欧各国都不具备的改革实验条件，值得中国的改革者格外珍重。



第八章
结构、参与度和相似性

8-1 农村非农产业的结构分布和动态

近年农村非农产业的迅猛发展，推出了一个产业结构多样化的发展的农村经济新格局。为了把握农业经济结构变动的基本趋向，以及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关联，需要对农村产业结构作出进一步的划分和分析。

我们把农村经济（社会总产值和总就业）中农业和非农产业这两大部门的划分，定义为农村产业结构的第一层次。据统计资料计算，1985年，我国农村全部非农产业总产值2,010.9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32.5%；就业人数4,577.5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2.8%，与1979年相比，结构百分点分别提高了7.9和5。这样的变动速率，不仅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而且，就是同战后典型发

展中国家农业人口加速转移时期相比，也显示出高速的特征。

农村非农产业内部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商业服务业的划分是农村产业结构的第二层次。近年来这个层次的结构变动情况见表8-1。

这6年里，在农村非农产业内部，工业的绝对额增长了2.8倍，但比重则下降了11个百分点。其余三个部门，建筑业增长了6.4倍，商业服务业增长8.4倍，交通运输业增长3.6倍，结构百分比分别增长了5.6、5.2和0.2。农村建筑、商业服务、交通各业这样快的增长，反映了它更面向农村自身的需求，特别是同商品经济深入发展相关的需求。

每个非农产业部门内的结构状况，是农村产业结构的第三层次。限于资料，我们集中考察农村工业内部各行业的结构情况。（见表8-2）

1985年按产值比重大小排序，农村机械工业第一，占1/4强；其次是建材，占18.9%；纺织占12.5%；其余部门均不足10%。就业结构的排序是：建材第一，占29.3%；机械第二，占17.3%；其余均不足10%。但是，从增长弹性和就业弹性来看，又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增长弹性最高的是纺织（4.48，即社会总产值增长1%，乡村产值增长4.48%），以下依次为建筑（3.94）、文教用品（3.59）；就

表8—1　　农村非农产业的结构变动

	非农产业收入						非农产业就业					
	绝对额（亿元）			比重（%）			绝对额（万人）			比重（%）		
	1979	1984	1985	1979	1984	1985	1979	1984	1985	1979	1984	1985
工业	372.16	972.15	1432.67	82.2	70.4	71.2	1814.38	2876.95	3126.47	76.4	67.5	68.3
交运	22.99	86.03	106.12	5.1	6.2	5.3	116.89	241.37	225.29	4.9	5.7	4.9
建筑	34.99	176.54	260.65	7.7	12.8	13.0	298.46	771.28	873.68	12.6	18.1	19.1
商服	22.47	145.85	211.50	5.0	10.6	10.5	146.61	375.12	352.10	6.1	8.7	7.7
合计	452.63	1380.57	2010.94	100.0	100.0	100.0	2376.33	4284.72	4577.54	100.0	100.0	100.0

说明：1984～1985年的数据包括村和村以下各种户办、联户办的非农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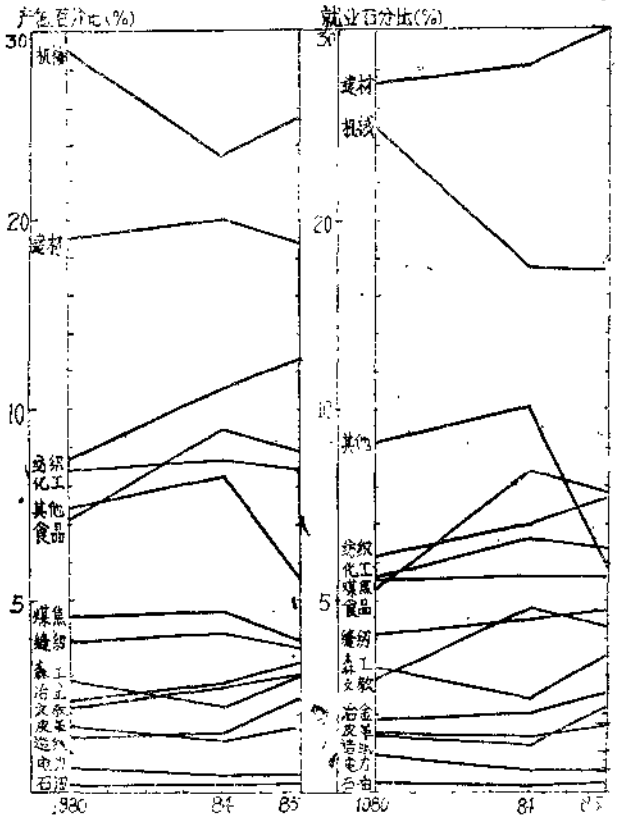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乡镇企业统计资料。

表8—2 1980—1985年15个农村工业部门的结构状况（%）

	产值结构			就业结构		
	1980	1984	1985	1980	1984	1985
总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冶金	2.80	2.74	3.37	1.90	2.97	2.53
电力	0.60	0.41	0.55	0.90	0.53	0.47
煤焦	4.80	4.41	3.85	5.50	5.80	5.56
石油	0.10	0.08	0.12	0.10	0.09	0.05
化工	8.40	8.59	8.43	5.50	6.60	6.40
机械	29.10	23.62	25.59	25.00	17.40	17.32
建材	19.60	20.89	18.89	27.20	28.10	29.85
森工	2.90	2.25	2.95	3.20	2.40	2.48
食品	7.10	8.52	7.87	5.40	5.40	7.80
纺织	8.70	10.57	12.51	6.10	7.00	7.65
缝纫	3.90	4.03	3.67	4.10	4.50	4.68
皮革	1.70	1.31	1.59	1.60	1.40	1.73
造纸	1.40	1.40	2.39	1.50	1.20	2.08
文教	2.20	2.85	3.04	3.00	4.90	4.52
其他工业	7.40	8.33	5.44	9.10	10.00	5.88

资料来源：乡镇企业统计资料。

业弹性（对社会总产值）最高的是建筑（2.15），其次是纺织（2.12）和文教用品（1.56）。由于增长弹性的不同，从而引出农村工业中各部门相对地位的变动。近年农村工业产值比重下降的行业有电力、煤焦、机械、建材、缝纫、皮革和其他工业；比重增加的行业有冶金、森工、食品、纺织、造纸



资料来源：同表8-2。

图8—1　1980—1985年农村工业的结构动态

和文教用品。就业比重下降的包括电力、机械和其他工业，其余除石油行业持平外，均有所上升（见图

8-1)。从全部排序看，农村工业的产值结构同就业结构又不尽一致，这似乎表明，在结构变动中，不同行业的产值增长和就业增长服从着不同的规则。农村工业内的就业分布比其产值分布更均匀一些。

8-2 “结构变化值”与总量增长相关程度的逐层递减

发展经济学认为，结构生产力是推动一国经济类型步入现代化的重要动因，因此产业结构变动与国民经济的总量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

结构变化的程度可以用“结构变化值”来加以度量。这个指标的具体计算方法是，把报告期构成减去基期构成，得出绝对差然后再加总。* 我们用这个方法分别测算了1979—1984年农村产业结构中三个层次的产值结构变化值。结果是，第一、二、三结构的变化值分别为13.9%、19.0%和25.8%。

显然，由于构成的不同，这三个数值互相之间是不可比的。但是，按照上述观点，它们与各结构层次的总量增长之间应该存在密切的关系。

---

* 参见〔南朝鲜〕金澄基：《产业结构变革与科学技术》，《经济学译丛》1981年第2期。

我们用1979～1984年26个省市自治区(缺西藏、上海和天津)的截面数据，对农村三层结构变化值与各自对应的总量增长率作了相关统计，统计结果见下表：

表8—3　1979～1984年农村结构变化值与总量增长的相关关系

	N	R^2	F
第一结构变化值与农村社会总产值增长的相关关系	26	0.62	25.98
第二结构变化值与非农总收入增长的相关关系	26	0.15	4.57
第三结构变化值与农村工业总产值增长的相关关系	26	0.07	1.78

说明：N—样本数；R^2—相关系数；F—检验值。

从表中可以看出，愈是农村产业的深层次结构变动，与总量增长率的相关系数越小，相关系数逐层递减，到第三层次，相关性已极不显著。

上述状况说明，我国农村结构生产力的发动尽管已经开始，但迄今还主要停留在较浅的层次上。农村非农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后续变动仍然不够有力，那么势必要导致整个农村非农产业增长势头的衰减。因为，按照分工分业的一般规律，任何一种非农产业都不可能不分叉地无止境发展下去，农村非农资源在工、交、建、商间的配置，在

一定阶段中就成为非农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同理，如果没有工业、建筑业等内部子结构的深入变化，那么在一定阶段上也会对这一层次产业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在农村非农产业的结构变化方面进行一些国际比较可能是有益的。七十年代，亚洲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农村非农就业比重介于25～45%之间。其中印度为24%，南朝鲜为25%，印尼为27.7%，马来西亚则为37%，菲律宾为40%。这些数字均不包括季节性和临时性非农活动。这些国家至少比我国农村目前达到的非农就业比重（18%左右）高7～10个百分点以上。同时，不同国家的农户调查资料表明，非农产业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25～70%。远高于1984年我国农户的非农纯收入比例（18.2%）。这种局面当然无法令人满意。探究其原因，很大程度同我国农村的深层结构生产力尚未充分调度有直接关系。例如，除制造业外，中国农村的现有非农产业部门水平均比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要低。其中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其他第三产业分别要低5～30个百分点。

富有挑战意味的是，越是深层次的结构变革，就越要同国民经济的结构变化连结在一起。这正是进一步发展我国非农产业的关键。

8-3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参与程度

如前所述，我国农村的非农产业是在城乡隔绝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起来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招工、进城就业，几乎成为农村人口介入非农活动领域的唯一渠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视为我国农村人口直接参与工业化的特殊形式。

尽管时至今日，农民企业与城市工业相比，无论是在财产关系、企业制度还是在运行机制、福利方式等各方面，均分属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类型，以至于它的产生多少带有外生的性质。但是无论怎样，农村的非农产业一旦从农业中独立出来，就不可逆转地要加入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去，与原有的工业体系发生种种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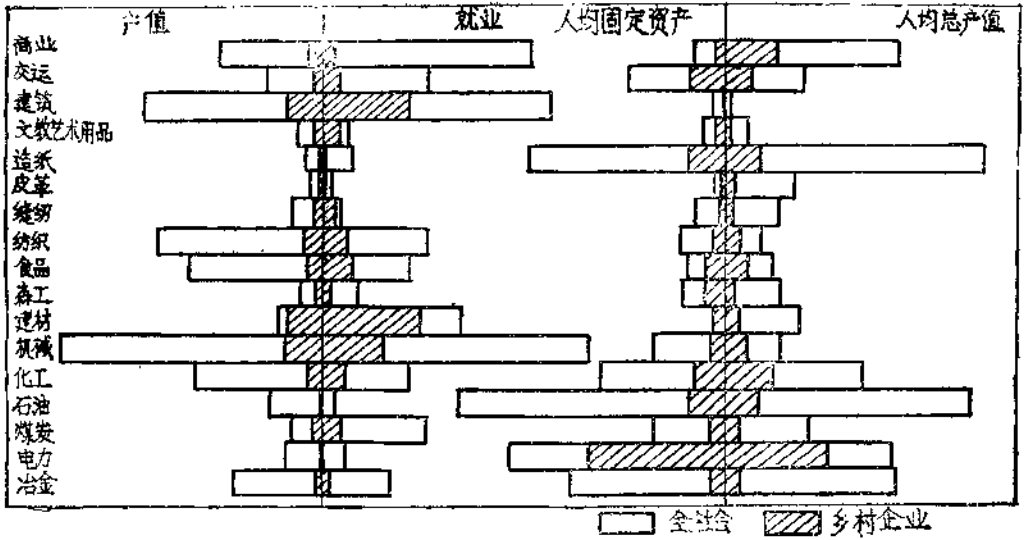
我们把农村各非农产业在社会相应产业部门中所占份额，称之为参与度。在这里，作为整体考察的是包括农村部分在内的各个产业部门，与农村部分相对应的是城市大工业。通过对参与度的考察，我们可以着眼于全局，从产业的纵向联系中把握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

1984年，我国农村非农业总产值为1,852.4亿元，占全社会非农总产值的19%，农村非农就业人员为4,264.7万人，占全社会非农就业人员的22%。分部门考察，乡村非农企业（不包括村以下非农企业，因为没有分类统计资料）在17个主要产业部门中的参与度如图8-2所示，具体数据见表8-4。

从产值结构看，参与度最高的是建材部门（已占全部建材业产值的74%），以下依次是煤炭、缝纫、皮革（参与度在21～23%之间），文教用品、建筑、森工（参与度为18—19%），造纸、机械、交运、商业、化工、食品、纺织（参与度在9—15%之间），其余如冶金、电力、石油均不及5%。

从就业结构看，参与度要明显高于产值结构。其中缝纫业达82%，建材业达69%，文教用品56%，皮革业54%，建筑业46%；以下食品、造纸、化工、森工、纺织、机械在21—32%之间，煤炭、交运、商业在13—17%之间，冶金、电力、石油则不足10%。

凭直观印象，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困难就是资金不足。因此，一般人们都认为，装备率（即每个工人平均拥有的资产）略低的部门，乡村企业的参与度也就略高一些，反之则略低。比较图8—2的右半部（即就业参与度）和图8—3的左半部



资料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1985》，第23、315—316页；
（2）乡镇企业统计资料。

图8—2 1984年乡村企业在17个主要非农产业部门的参与度

图8—3 不同产业部门的装备率比较

表8—4　　1984年乡村企业在17个主要非农产业部门中的参与度与装备率比较

产业部门	就业比较		产值比较		人均固定资产比较		人均总资产比较	
	万人	占本部门%	亿元	占本部门%	万元	为本部门%	万元	为本部门%
1、冶　金	43.78	8	27.99	4	0.18	9.531	0.25	9.924
2、电　力	12.62	7	4.19	1	1.46	62.907	1.51	62.287
3、煤　炭	142.59	17	45.04	23	0.15	19.691	0.19	22.421
4、石　油	0.85	01	0.79	01	0.37	12.890	0.51	14.376
5、化　工	107.73	25	87.70	10	0.19	13.541	0.32	15.828
6、机　械	442.58	21	241.20	13	0.21	18.045	0.35	43.661
7、建　材	717.43	69	213.33	74	0.14	16.116	0.20	17.905
8、森　工	61.71	23	22.97	13	0.11	45.233	0.17	20.547
9、食　品	214.09	32	86.97	10	0.22	53.621	0.29	39.487
10、纺　织	179.53	22	107.97	09	0.13	25.506	0.23	43.571
11、缝　纫	118.88	32	41.10	23	0.05	16.363	0.12	15.841
12、皮　革	35.66	54	13.34	21	0.08	52.631	0.15	14.545
13、造　纸	31.09	20	14.31	15	0.40	18.626	0.49	13.100
14、文教用品	125.05	56	29.05	19	0.07	28.915	0.11	29.886
15、建　筑	683.49	46	217.30	18	0.01	12.500	0.03	24.000
16、交通运输	129.30	13	47.03	13	0.36	33.879	0.39	33.875
17、商　业	202.46	13	81.65	12	0.09	2.563	0.75	29.717

资料来源：同图8—2。

（即人均固定资产拥有量），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大体存在着这种此消彼长的反比关系，这与人们的经验认识是吻合的。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却表明，统计数据并不能完全支持上述判断。例如，乡村企业中装备率最低的建筑部门，人均固定资产拥有量仅为100元，但参与度却并不是最高的，其就业参与度和产值参与度在17个部门中分别居第5位和第6位；又如商业，人均装备率也比较低，仅高于四个部门，但就业参与度居第13位。反过来，就业参与度较高的部门，如建材（第2位）、食品（第6位）、造纸（第7位），装备率却并不低，这三个部门乡村企业人均固定资产拥有量在从低到高的顺序中分别位居第8位、第13位和第16位。整体而论，乡村企业的装备率与就业参与度的相关程度是很低的（测定系数$R^2=0.1827$），与产值参与度的相关程度则更低（$R^2=0.1032$）。如果我们用相对装备率（即乡村企业人均固定资产拥有量与全社会人均固定资产拥有量之比）来衡量参与度，那么在绝大多数部门中，乡村企业的就业和产值参与度都要低于其相对装备率。

上述分析表明，资金短缺，并不是农民进入非农产业领域的唯一的障碍因素。换句话说，迄今为止，乡村企业并不是完全依据劳动替代资金的原则

来扩大其参与度的。乡村企业在每一个产业部门参与度的高低，主要受到该部门所处宏观环境的制约。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在初始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一定的条件下，某个部门的市场需求信号强烈一些，收益率高一些，或者供给的资源限制、技术障碍，以及垄断等人为的进入摩擦弱一些，那么对该部门的参与度就高，反之则低。

因此，仅仅有进一步发展农村非农产业，进一步提高乡村企业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参与度的热切愿望已经远远不够了。既然各个产业部门所处的宏观环境不同，那么农民的进入也就在实际上面临着不同的选择。为了对农民所面对的可能性空间有更具体一些的认识，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若干典型的农村非农产业部门的现状，并对其发展前景作出初步的估量。

8-4 对若干重要产业部门的估量*

采矿业。我国的经济发展远未进入矿产资源消

* 本节依据发展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产业研究总报告撰写的下列分报告：矿产、能源、交通分报告（周其仁）、机械工业分报告（罗小朋）、建筑业分报告（白南生）、纺织工业分报告（杜鹰）、食品工业分报告（陈锡文）。

费强度可以减弱的阶段。因此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对矿物资源的消耗强度还会有所提高。我国矿产种类齐全，矿床类型多样，分布广泛，多数矿种富矿少，这些都是适宜更多运用劳动密集方式来加以开发的。但是直至1982年，全国劳动者中从事矿业开发的人数仅0.85%，比“大国模型”中人均300美元时的矿业就业比重（2.5%）要低2/3。

在矿业开发中，矿物能源特别是煤炭资源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1984年，全民煤矿每提供一个劳动岗位需固定资产7,042.2元。而乡镇煤矿的人均固定资产只及前者的20%左右，加之1982年以来，农民加入煤炭开发的政策屏障被逐步消除。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这一领域，乡镇煤矿发展十分迅速，产值年平均增长17.5%，就业年平均增长13.8%，到1984年，乡村煤炭产量已占全国产量的1/4。但是，就乡村煤矿的相对装备率位次（第8位）而言。它的产值参与度和就业参与度都偏小，主要是受到资源划分、技术和运输的限制而远未充分发展。在我国，矿产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北部，而水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以及经济重心区又主要分布于东南部，我们把这种资源分布的区域不平衡称之为资源错位。这在煤炭工业中表现得尤为显著。看来，跨省市区县和跨所有制大规模地调配和重视各

种资源，是包括乡镇煤矿在内的整个煤炭工业发展中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交通运输业。1984年，我国交通运输业在社会总产值所占比重为3.8%，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为3.3%。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个比重并不高。比美国（6.4%），日本（6.3%）、巴西（5.2%）、南朝鲜（6.5%）和印度（5.3%）都要低。其中最突出的是公路运输薄弱。我国公路货运量占总货运量的比重、平均运距、公路通车里程等主要指标，都明显落后于大国的平均水平。1981年，我国的公路密度只有93.5公里/千平方公里，只及巴西的一半，印度的五分之一和美国的七分之一。这是以往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僵化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近年我国交通运输业的结构性变革给农民的进入提供了历史性机会。1979—1985年，农村交运业收入年平均增长29%。就业年平均增长11.6%。其中增长最为迅猛的正是公路总运力。但是，这种增长目前已受到公路路况差、通车里程不足的制约。我国全部公路通车里程中等外公路占2/3以上。1979—1984年全国汽车车辆增长11.2%，大中拖拉机增长10.4%，而通车里程每年仅增长1.1%。“行路难”成为全国性老大难问题，其中又以发达区和中心城市周围地区更甚。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

国都必须大举修路。由于修建公路的劳动投入系数较高，据一些典型调查资料推算，每年修建公路6万公里。可直接容纳修路劳力1,400万人，因此农民进入交通运输业的就业弹性应该是很高的。

建筑业。近年建筑业的高速增长（年增长率13.4%）构成我国转入新成长阶段的主导动因之一。目前，经过校正的建筑业占社会总产值的份额为10—11%，占国民收入的8—9%，建筑业的前后向联锁度较高，如加上直接间接为建筑业最终产品服务的其他产业的产值，合计占社会总产值的25%。

1984年建筑行业的乡村企业人均总资产装备率水平在全部17个部门中位居第八，而产值和就业的参与度均位居第五。表明乡村建筑行业的产值、就业参与相对于资金的装备率水平有超前趋势。这两年农民对住宅需求的扩张，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对基建的扩大需求，可能构成了农村建筑行业超前发展的原因之一。另外，建筑业本身在技术上更适于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进入。

1979—1984年，全国乡镇建筑企业人员平均每年增加19.6%，收入年增长39.8%。现在乡镇建筑企业工人已达873.7万人，占到总数的50%以上。加上建材工业，农村建筑队伍已达1,591万人，预计

今后建筑业就业增长率每年可达4～5.4%，这同国际经验也是吻合的。

机械工业。这是我国最大的制造业部门。它集中地反映着以往发展战略的成功之处和严重问题，同时也对未来的结构变革有着决定性的影响。1952～1984年我国机械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14.9%，目前已占工业总产值的25%，净产值的24.7%。

目前我国机械工业总产值中的中间需求与最终需求之比高达1.54，而在“标准结构”中人均300美元时，此比率为0.6。我国生活用机械品产值不及机械工业产值的10%；在生产用机械方面，为本部门生产的机床产量居世界前列，等于美国的2/5，日本的2/3和苏联的1/2。而同期我国载重汽车产量只及日本的1/32，美国1/17和苏联的1/8。对某些机械工业品的需求缺口巨大，与机械加工能力严重过剩的并存，表明机械工业是我国结构性矛盾最为突出的部门之一。

由于机械工业的工艺可分性很强、作业连续性较弱，因此成为工业中最易于进入的部门之一。目前乡办工业的1/4产值，1/4企业个数，1/5从业人员集中在机械工业。这显然同上述条件直接有关。据计算，近年我国机械工业的就业弹性为0.44。按此发展，我国本世纪末机械工业职工可达6,000万

人。但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每年只能增加5%。可见，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造机械工业的组织型式，那么机械工业的高就业带动也许会带来连锁的低效反应，不仅过多消耗紧缺的资金、物资和能源，而且会危及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进程。

因此，削弱机械工业的低水平过度竞争势在必行。为此应不惜降低机械工业的就业弹性。这可能会对乡镇机械工业产生某种不利影响。但是，机械工业的技术可分性和我国机械工业大规模改组过程中资金的高度稀缺性，又给乡镇机械工业带来了新的希望。一般预测，我国机械工业的增长弹性仍会大于1，年增长率可能保持在8—9%之间。如果在中国由较低收入人口组成的小型化机械加工企业能够起到目前日本和印度那样的作用，那么本世纪内源源不断地由农村人口举办的机械工业，就可能占据机械工业产值的一半，就业人数的60—70%。

食品工业。食品工业虽然在我国各工业部门中位居第三，但仍相当落后。食品工业产值只及农业产值（扣除队办工业产值）的30%；居民消费食品中经食品工业加工部分不到40%。在食品工业内部，粮油盐糖等初级加工和烟酒等嗜好品的产值占75%，精加工和深加工比例不足25%。这些指标在同等收入国家中都是落后的。从需求前景分析，除

粮食外的主要食品，均属高收入弹性产品。据国际资料，在人均GNP600～900美元（1980年美元）期间，食品、饮料、卷烟的收入弹性仍可达1.72，直到进入中高收入阶段才明显降低。因此食品工业无疑将是我国传统的而又持续比收入增长得更快的大产业部门之一。

目前国营食品工业的固定资产装备率（人均7,962元）低于13个工业部门的平均水平，而全行业提供的利税总额和全员劳动生产率却居各工业部门的第二位，因此对乡镇企业有颇大的吸引力。

但是食品工业的高效益仅仅是由于少数高利税行业支持的。如1983年，烟、酒、盐、糖即占食品工业利税总额的82%。因此农村食品工业的基本特点是小烟厂、小酒厂、小糖厂的膨胀失控。同时其他食品加工业又发展不足。尽管乡镇食品工业的人均固定资产额（3,500元）只及国营食品企业水平的44%，理论上可为劳动替代资金广开门路，但乡镇食品工业产值只占全国食品工业产值的10%，份额是偏低的。

纺织工业。世界纺织工业的基本走向是由工业文明的奠基性产业转变为典型的“夕阳产业”。1952—1983年我国工业中的纺织业产值和就业比例也呈下降趋势。但是，纺织业目前仍为我国第二大

工业部门。从前景分析，综合国内需求和出口等多种因素。我国纺织工业的收入弹性和增长弹性都将小于等于1。这表明从产值总量来看纺织工业不再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变革发生显著的主动性影响。

但是，纺织业内部的门类和产品品种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动。与需求制约并存，纺织产品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实现产品结构高度化，是整个纺织工业面临的一项战略性任务。

近年农村纺织工业出现了超高速增长。1979—1984年全国乡办纺织工业产值年均增长40.6%，从业人员年均增长23.0%，同期，乡办纺织工业的增长弹性高达4.48。即全国纺织工业产值增长1%，乡办纺织工业即增长4.48%。但是，尽管如此，乡村纺织工业的产值参与度也仅高于冶金、电力和石油，位居17个产业部门的倒数第四位。由于近年纺织工业的劳动成本和原料成本大幅度上升，许多纺织品继续在大城市里生产已无利可图，因此，如果有组织地把更多的传统纺织业扩散到农村，同时又允许并组织有条件的乡镇纺织工业加入到高中档纺织品的某些加工阶段中来，那么，进一步提高乡村纺织工业的参与度是有可能的。但是，鉴于乡村纺织工业的就业参与度（22%）已明显高于产值参与

度（9%），即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尚不清楚的问题是，欠训练的低收入人口大量进入这一领域，是否会对纺织工业的结构高度化带来消极影响。

8-5 值得注意的趋同：结构相似性

对上述有选择的非农产业部门的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农村非农产业没有也不可能孤立于国民经济大环境之外，单独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结构变化的基础。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农村创办非农企业的初始条件远不同于城市和大工业。但农村的非农产业结构却和国民经济的非农结构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1984年，农村工业、交通运输、建筑和第三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国营、集体经济四大部门产值结构（不包括乡村企业在内，下同）的相似系数* 高达0.998；农村工业内部14个行业的产值

---

* “相似系数”用公式

$$S_{ij} = (\Sigma_n X_{in} X_{jn}) / (\Sigma_n X_{in}^2 \Sigma_n X_{jn}^2)^{\frac{1}{2}}$$

来表示。其中X_{in}与X_{jn}是部门n在i种结构和j种结构中所占的比重。系数的值可从0到1。系数值为1表示两种结构完全一致。系数值为0则表示完全不相似，系数值在0.5以上，即认为相似性较高。参见《世界各国工业化概况和趋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96页。

结构，与全国工业14个行业产值结构的相似系数，也达到0.721，其中重工业8个行业为0.793，轻工业6个行业为0.929。相似程度如此之高，确实是出乎人们意料。

观察农村非农产业部门与城市产业部门的相似与不相似，可以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横向透视法”，即以部门生产的性质来区分不同种类的经济活动，我们上面所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抽象掉各部门的外部特征，把全部生产活动按照它们的加工阶段来考察，这叫做“纵向透视法”。由于缺乏详细的统计资料，我们无法对农村非农产业与城市产业作纵向的相似性比较。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即便是按加工阶段来排列城乡的工业活动，两者之间的结构差异也远非所想象的那么大。长期以来形成的地区自给自足，企业的“小而全”、“大而全”的格局迟迟不能打破，无论是发达区还是不发达区，那里的城市工业至今仍在大量生产着本地乡村工业足以胜任的中低档初级产品、半成品和产成品。加上我国的产业链条较短，产品的深度加工不够，城乡之间缺乏明确的加工阶段分工，这些都是造成纵向结构趋同的原因。纵向结构的这种状态无疑又大大加剧了横向结构的相似性。

城乡产业结构的高度同构性表明，以生产最终产品为主的城市工业体系对新加入的农村非农产业的结构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样面对国内市场需求的乡村企业很难摆脱传统产业结构的巨大惯性。因此，我们关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极不协调的批评，也同样适用于农村非农产业的结构现状。事实上，由于农村非农产业的介入，还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转折时期供给方面的矛盾。

由于城乡产业同构性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了目前一个最不容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在农民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还刚刚开始、远不充分的情况下，已经出现了某种“进入过剩”的征兆。这主要表现在：

（1）在矿业开发中，劳动对资金的替代最具潜力，但由于目前乡村企业对资源的低效高耗利用方式的普遍存在，资源过度破坏和外部不经济倾向有所抬头，致使替代效果不甚明显。

（2）在制造业各部门，不仅同样存在着对稀缺投入品的过度买方竞争（以重制造业最典型），同时又普遍出现了低水平产品的过度销售竞争（如轻制造业产品）。而且随着各地农村加工工业由点及面的发展，过度竞争现象又日益弥散到乡村制造业系统内部。

（3）在交通运输业中，突出的问题是运力增长相对于道路过剩。各类车辆、大小拖拉机统统挤上县道、省道、国道，致使总通过能力的“瓶颈”制约愈益严重。

（4）建筑业是近年最活跃的产业部门，农民建筑队从本地远征外省，从乡村开进城市。但其中真正有资格承担规格建筑工程任务的队伍太少，据估计，尚不及685万农村建筑大军总数的8～10%。

（5）在商业服务业中，一方面小城镇经商人员饱和，特别是经销高利润商品（如服装、皮革制品、电器）的队伍人满为患。另一方面综合性商业服务业又发展不足，低收人人口进入商业领域，对降低大城市商业的流通费用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明显作用。

归纳起来，结构相似性与“进入过剩”都说明，以往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未能充分满足资源合理配置的要求。尽管在低起点上的高速发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但是同时丧失的结构生产力的解放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却是无法估量的。关于后一点，我们可以用集中反映效益水平的净产值率指标的城乡比较加以验证。近年来，乡村企业同全民企业净产值率的比值均接近于1。1981年，这个比值在0.8～1.1左右；1984年除

缝纫业（1.38）外，其余16个部门的比值也都在0.8～1.2之间（见表8—5）。但是如果我们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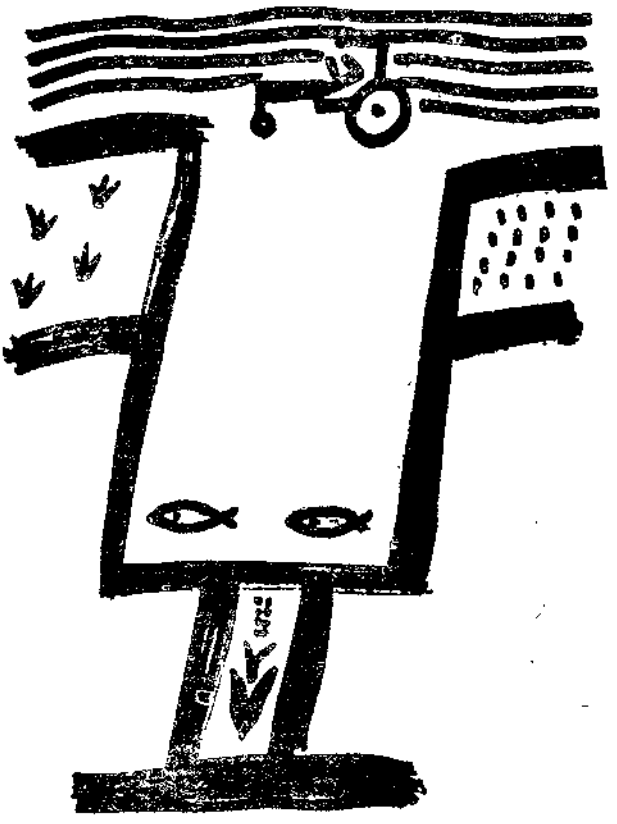
表8—5 乡村企业与全民企业净/总产值率比较(1984)

	乡村企业	全民企业	比值
冶金	0.33	0.33	1.00
电力	0.49	0.52	0.94
煤炭	0.56	0.49	1.14
石油	0.46	0.58	0.79
化工	0.32	0.31	1.03
机械	0.35	0.32	1.09
建材	0.42	0.42	1.00
森工	0.38	0.44	0.86
食品	0.27	0.28	0.96
纺织	0.24	0.21	1.14
缝纫	0.29	0.21	1.38
皮革	0.29	0.25	1.16
造纸	0.32	0.30	1.06
文教用品	0.38	0.31	1.22
建筑	0.00	0.25	0.00
交运	0.00	0.51	0.00
商业	0.00	0.56	0.00

资料来源：同表8—4.

到，乡村企业与全民企业的人均固定资产的比值在0.03～0.63之间，人均总资产的比值在0.10～0.62之间，比值差距要远大于净产值率的比值，那么就有理由认为乡村企业尽管以低有机构成的方式投入，却由于种种低效益因素的存在而并没有取得相应高的净产出。

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近年我国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展现了我国农民向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的必要和可能，但从已完成的变化看，结构变革仅仅是一个开端。目前农民在进入非农产业部门时，“不足”与“过剩”并存的结构性矛盾，表明尽管我国需要进入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人口数额巨大，冲动强烈，但是农民易于进入的领域却并不宽广。如果源源不断产生的离土人口只能跻身于既有的、易于进入的产业领域。那么在日益狭窄的空间中更激烈地争夺自然资源、投入品和市场，加剧低水平过度竞争，就不可避免，对农村非农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随着国民经济运行体制的全面改革提上日程，乡镇企业也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为了顺利完成这个转折，我们必须跳出“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样的思想方法的局限，首先正视我国非农产业发展中已经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并在改变着的大环境中找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新办法。



第九章
产业政策：
提高结构转换
能力的支点

9-1 产业政策的提出

从中期发展趋势看，我国近年业已发生的结构动态必须作出重大矫正。若国民经济各部门仍保持1979—1984年期间的增长弹性不变，那么以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6%计，则十五年后我国全部非农产业部门中，制造业将占70.7%，基础设施部门（含电力）占24.7%，商业只占4.6%。显然，国民经济结构将更加畸型。

从近期来看，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这表现在，消费品的产出结构仍然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动，产品滞销积压，不适销品种面扩大，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疲软，强制性储蓄现象在宏观政策紧缩后，非但没有缓和，反而进一步加剧。从投资结构看，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部门的投资比重下降，

而对彩电、电冰箱、毛纺、汽车以及高档饭店酒家、大型游乐场的投资，却蜂拥而上，以致相继造成从过度竞争直至纷纷下马的振荡局面。在对外贸易中，一方面出口结构上不去，难以满足大规模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的需要，另一方面，盲目进口高档消费品及其生产线，又引起社会消费指向与国内供给能力（包括国际支付能力）的严重脱节。就农村来看，乡镇企业发展中进入不足与"进入过剩"的矛盾，也愈见突出。

仅仅靠总量调节的办法是无法解决上述问题的。没有结构性对策，总量控制就只能在"收"、"放"两极之间作极端的选择。例如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通盘考虑各个产业部门发展的轻重缓急顺序，就难免"一刀切"。其结果不仅无助于总量平衡，而且还会导致结构变革的冲动在振荡中衰减，以致坐失良机。

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制定以产业结构政策为中心、包括目标选择和实施手段在内的产业政策，对我国近中期产业结构变动的方向，进行战略规划和战略引导。

考虑我国国民经济正处在以结构变革为中心的新成长阶段上，因此，我们要特别强调解决产业政策导向问题的重要意义。

首先，随着以求温饱为中心的必需品消费品阶段的结束，社会消费需求的多样性、选择性特征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就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不同的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不善于选择非必需品的开发序列，那么就难以在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上满足社会对非必需品的消费需求，新成长阶段也就可能找不到持续增长的最强动因，即使找到了也不能持久。

其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早就承受着发达国家先进消费方式的示范压力。过去这种压力基本上是外在的，因为一来国内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二来长期闭关锁国。现在两个障碍都被冲破了。同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消费差距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内在压力。在此条件下，如果毫无准备地随波逐流，那么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国，几乎任何一种非必需品的“大上”，都可以找到足够充分的理由。但是人们不能忘记，十亿中国人在温饱有余之后可用于非必需品生产（或进口）的资源，还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不善于选择向世界平均水平以及发达水平逼近的顺序，那么有限的“剩余”资源很容易折腾干净。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因为在这个当口上一着不慎而一蹶不振的。

再次，中国同世界先进技术水平之间，存在着不

小的差距。新技术革命又正在无情地把这种距离拉大。由于技术进步长期滞缓，大体上很少有哪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在步入国际舞台后要在很长时期内同时面对跨度如此之大的技术空间。在新成长阶段上，非必需品取代必需品，意味着产业链条要拉长，整个中间需求序列都要发生变化，对种种不同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将变得更加复杂。“适合技术”的标准和技术组成序列的选择，都要考虑产品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的状态，归根到底又同主导产业的确立关联在一起。

新成长阶段是一个地地道道需要选择的时代。新成长阶段又是一个结构变革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展开的年代。结构生产力得不到充分释放，增长就不可能达到应有的速度；而结构生产力的释放，又有赖于产业政策的制定。日本经济学家宫泽健一把产业政策的制定，视为一国提高“结构转换能力”的前提。这个看法已被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捷足先登的事实充分证明。中国能否在新成长阶段上争得持续的发展和繁荣，将首先取决于对产业发展的结构、顺序和时机，作出怎样的选择。

制定产业政策无疑意味着对经济过程的干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产业政策可以建立在传统体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我国结构变动中导致紊乱的各

种因素，人们不难看到，要全面解决我国的产业导向问题，就不能离开深化市场关系为目标的体制改革。

这并不难理解。如果价格机制和市场规则不完备，价格并不真实反映要素的成本，各类市场组织的发育不健全，那么市场本身就只能是不断产生失真的产业诱导信号的信息源。这里所讲的市场，当然不仅仅限于主要影响短期供求关系的产品市场，改革更重要的领域，是要形成对预期价格发生重大影响的要素市场。因为要素难以流动，或者虽有流动（如近年农村），但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社会化程度太低，恰恰是阻碍合理产业结构形成和运行的症结所在。反过来看，发展战略的选择和产业政策的制定也不能脱离具有现代特征的商品经济的培育，否则战略选择既得不到足够的信息，也无法充分向社会表达。

因此，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双重的：深入市场改革和制定产业政策。关于前者，我们在有关经济流程问题的章节里作过针对性论述。这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将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市场关系结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问题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存在的。了解发展中国家在计划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

思考。

9-2 发展中国家：市场与干预

战后，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发展本国经济中，都把有利于工业的产业结构演进看作是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必要先决条件。但是，与先行工业国相比，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阶段的起始条件、机会和国际环境已根本不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都非常强调国家计划和政府干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对于仅仅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能否实现加速工业化目标，则普遍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

第一，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关系的发育水平较低，市场结构通常带有传统社会的明显印记，要素在这种结构中的流动趋向并不反映在价格上。在市场机制具有较大缺陷的条件下，如果听任经济自由活动，不仅不可能有效地动员和使用资源，而且也难以避免经济的大幅度波动和停滞。

第二，社会的储蓄和积累能力较低，私人企业的投资能力较弱，不能对市场的刺激信号作出足够的反应；尤其是缺乏优秀的企业家人才。由于私营

部门不足以承担工业化所要求的资源的大规模重新配置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作为公共权威机构应该扮演企业家的角色，并向重要的工业活动领域，首先是向具有外部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部门直接投资，以吸引和引导社会私人资本。

第三，国际贸易格局于发展中国家不利。如发展中国家按自由贸易的原则来确立本国的经济结构和参与国际分工，那无异于放弃工业化的努力。按静态的“比较成本”理论，各国都应该生产和出口本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与发达国家相反，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恰恰不是工业，而是农业，那就只应发展农业，而无需进行结构变革了。显然，以静态的“比较成本说”为理论基础的自由贸易原则，是发展中国家断然不能接受的。扶植本国幼稚产业，首先是工业部门的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也是可能成长为出口产业的。为此就要实行国家直接干预下的贸易保护政策，使民族工业的发展免遭不利的贸易条件的打击。

第四，作为有利条件，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和吸收先行国的工业化成果。通过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和专利，发展中国家无须重复投资巨大且颇具风险的高技术的开发过程，而享受其成果；通过吸引

外国资本与本国廉价劳动力资源结合，发展中国家可以替代进口，把自己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特别是它们可以参照先行工业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动态过程，减少选择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能动地推进结构变化，缩短工业化时间。这就需要政府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审时度势，制定国家级的发展战略。

由于上述原因，发展中国家都把计划工作和政策干预视为动员社会力量战胜经济贫困，加速经济发展的必要的和有力的手段；苏联以及战时欧洲计划工作的经验，发展经济学中结构主义流派的观点，更是促成和强化了这种倾向。1940—1965年，90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的77个国家精心制定了一项或多项发展计划，近30年，发展中国家总共编制了300多个计划。这些计划大都体现了发展中国家把更多的资源转向工业部门的努力，许多计划还试图指导工业产出中部门构成的变化。

由于各国社会制度、文明背景、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的不同，这些计划在所要达到的目的和目标、重要性和复杂程度，涉及的领域和时间期限，以及对企业的约束力和执行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在计划工作最活跃的亚洲地区。印度作为“混合经济”国家中开展计划工作的倡导者，它编

制的五年计划（特别是早期的）具有广泛的综合性和明显的强制性特征。这些计划以庞大的国营工业部门为重心，涉及部门投资分配和产量指标的确定，其目标是把全国公共的和私人的资源都纳入计划轨道。相比之下，东南亚国家的计划工作要薄弱得多，这些计划只适用于宏观经济方面的平衡，把经济稳定作为计划的主要目的。南朝鲜和新加坡的计划又代表了另一种类型。它们的计划也适用于管理国家资源，但实现方式并不依靠行政指令，而是通过劝导、协商和合作来协调私人部门和政府的行动；同时计划并不固守一定的目标，儒教传统使它们能从实用主义观点出发来灵活地调整计划，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评价发展中国家的计划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是很困难的，因为这首先取决于计划的目的，而不在于计划指标的完成与否。后者并不必然标志计划的成败。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待计划，即通过计划的判定，可以向人们展示未来国民经济的主要变化方向，为以长远眼光作出当前决策提供一个路标，动员公众为实现长期目标努力，那么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计划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因为这样的计划对于正在经历有深远影响的、迅速的结构转变的社会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计划工作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除了基础资料的薄弱、缺乏训练有素的管理人员，官僚主义的侵蚀使计划工作缺乏效率以外，主要问题在于如何把计划的贯彻执行与更大程度地利用市场和价格机制结合起来。这个问题随着工业化第一阶段的结束，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比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的缩小而日益突出起来，在变化了的政策环境下，人们注意到，造成价格机制和刺激结构严重扭曲的政策所导致的损失并不一定能靠计划的成效来弥补。因此七十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的计划工作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正在出现这样的趋势：从追求强制计划到计划的制定给市场和价格以更大的注意；从编制包括中长期产量指标的投资规划到更重视运用影子价格加强项目评价能力；从要求对计划的服从和一致到采取上下协商的办法，强调计划交流信息和制造舆论的功能；从追求综合性计划到把计划的重点放在有选择的主题上；从追求计划的尽善尽美到把计划视为一个学习的过程，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从上述趋势并不能得出应该放弃计划的结论。事实上，正象已有的研究报告在总结发展中国家的计划工作后所指出的那样："经济成绩最好的既不是那些尝试综合性强制计划的国家

（如印度、孟加拉国、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和斯里兰卡），也不是计划工作薄弱的国家（如尼日利亚、塞内加尔、阿根廷、加纳、牙买加和智利），而是那些基本上依靠合理化的刺激指导私人部门，同时为公共投资方案提供一个宏观计划框架的国家（如南朝鲜、马拉维、马来西亚、哥伦比亚和肯尼亚）。*

综上所述，一国的需求结构（进而产业结构）是可以通过政策手段加以影响的。但是，同样是在市场基础上，政策干预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总量均衡为目标的反周期波动的控制，这种干预类型主要是在西方国家；另一种则是实行某种程度的方向、顺序和速度的控制，这种类型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经验表明，政府可以通过发展战略的选择，对促使建立一个有特色的产业结构或影响产业发展方向起积极的作用。这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这当然不等于说可以忽视市场的作用，市场机制在刺激产业结构向协调方向发展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在产业结构快速变动的条件下，市场的形成也要考虑战略选择，因为这时所要求的市场注

* 参见兰姆帕尔·阿加瓦拉：《发展中国家的计划工作—经验教训》，《世界经济译丛》1985年第4期。

定是动态不均衡的。

因此，干预方向和层次的选择就十分重要。一般来说，它们应该是建立在市场导向基础之上的，即这种干预应更多地注意纠正已确立的市场的偏差，在这个基础上有选择地制定一套从自由竞争到完全干预的政策。

总之，在我们看来，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是协调产业结构的必要前提。但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并不会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重现。充分的市场和有远见的干预，同为我国新成长阶段上经济发展所必需。最糟糕的莫过于一个不完善的市场加一个没有效率缺乏远见的政策系统。事实上，市场调节比行政指令要求有更高的宏观管理水平，而宏观管理水平的提高，又有助于市场更充分地发挥作用。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正如充分的市场条件的形成一样，达到有远见的干预同样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在这方面，借鉴日本制定产业政策的经验是有裨益的。

9-3 “筱原两基准”

早在五十年代，日本政界和企业界就已经在广

泛议论有关产业发展的各种问题了，并着手制定本国的产业政策。不过那时，以至此后一段时期，也只有日本人才热衷于研究产业政策。直到七十年代，令世人瞩目的所谓“日本经济奇迹”出现以后，产业政策才引起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的兴趣，并得到公认。

在经济政策史上，产生政策是一个新被开发的研究领域，它与西方经济学通常阐述的经济政策有种种不同。首先是政策目标的区别。凯恩斯以来的西方经济学一般是以控制宏观经济均衡为目标的，而产业政策，虽然也采用财政、货币等手段，但更直截了当地把追求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作为目标。其次是政策基点的区别。西方经济政策应用于宏观经济层次，而产业政策更深地触及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结构均衡，企图影响结构变化。最后是政策时效的区别，西方经济政策多半是为应付周期波动的，而产业政策更注重长期发展问题，也更重视国际经验的比较。

由于上述特点，产业政策显然更适宜用以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那些国家的问题。事实上，它也正是应利用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也就是它最先出现于日本，尔后又受到发展中国家普遍重视的原因。

产业政策的具体内容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等等。其中，产业结构政策是全部产业政策的核心。我们已经知道，一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演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制定产业政策，也就是要在这个一般规律下具体规划本国的产业结构，安排产业发展的顺序，确定能够更有效地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起飞的战略产业（或曰主导产业或带头产业），并通过其他经济政策、立法和措施来实现产业结构政策，以推动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产业的划分有多种层次和不同的分类法，决定一国产业结构的因素又多种多样，那么，如何在众多产业部门中确立战略产业？显然，这是制定产业政策的关键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他不满足于克拉克定理和霍夫曼定理关于产业动态的描述，因为无论是三次产业的划分还是轻重工业的划分，对于确立战略产业都未免失之笼统。他在1957年提出了规划产业结构的基本思路，即被人们称之为"筱原两基准"的选择战略产业的准则："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率基准"。"筱原的基准"提出后，对日本政府规划产业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63年日本产业结构

审议会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时，以及1965年制定“中期经济计划”都采用了筱原基准。可以说，这两个基准是产业结构政策的精髓所在，它的提出，标志着产业结构政策的成熟。

“收入弹性基准”。

我们知道，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人们对某一产业的产品的需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经济学把需求变动对收入变动的这种关系，称为需求收入弹性（简称收入弹性）。以e_m代表收入弹性，M和Q分别代表收入和需求量，则需求收入弹性的公式为：

$$e_m = \frac{\triangle Q}{Q} / \frac{\triangle M}{M}$$

不同产业的收入弹性是不同的。比如，农业的需求增长率一般低于工业；在工业内部，纺织工业的需求增长率又低于机械工业；在机械工业内部，日用机械行业又低于耐用消费品行业。不同的收入弹性表明不同产业潜在的市场容量，只有收入弹性高的产业才有可能不断扩大它在市场上的份额，而这种产业往往代表着结构变动的方向。因此，一国想切实提高其经济增长速度，就应把需求收入弹性高的产业作为战略来发展，换句话说，高收入弹性是战略产业的必具条件。

“生产率上升率基准”。

这个基准的前提是各产业部门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同。一般说来，在价格结构一定的条件下，生产率上升率高，即技术进步速度快的产业，由于成本下降也快，就能创造更多的国民收入。向这样的产业优先配置资源，就可以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因此，应把符合这一条件的产业作为战略产业来考虑。

“生产率上升率基准”，实际上是以“比较成本法”演化而来的。筱原之所以不把后者作为产业规划的基准，是因为他敏锐地看到，在工业后进国家，按比较生产成本标准来看是有利的产业，往往正是需求收入弹性低的部门，如农业就是如此。选择这样的产业作为战略产业，显然无助于缩小与先行工业国的差距。但是，如果考察更长时期内的情况，结果就不同了。目前生产成本相对高的产业，把它作为“幼稚产业”来培植，将来就有可能成长为满足“比较成本说”的产生。为此必须加进时间因素，不仅要考察现在的生产成本，更重要的是要看生产率的上升率。由此可见，“生产率上升率基准”无非就是“比较成本说”的动态化，但这样更

符合结构变动的实际情况。

“收入弹性基准”是从需求结构的角度来刻画不同产业发展的不同可能性的；“生产率上升率基准”则是从供给角度对同一可能性的判别。严格的说，收入弹性高的产业不一定技术进步速度快，相反，技术进步快的产业不一定收入弹性高。因此，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基准的产业，才能被确认为是战略产业。

1957年，日本工业恢复到战前水平，国民经济从恢复期转入新的发展期。筱原基准的提出，对日本在“新的长期经济计划”（1958—1962）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期间，把重化工业确定为战略产业，起到重要的作用。当时，人们对选择什么样的产业作为战略产业展开过一场争论。一种观点主张选择轻工业，认为轻工业是日本传统的优势产业。且国际比价相对便宜，况且日本又面临着就业和资金短缺的压力，固而应重点发展轻工业；另一种观点主张把重化工业作为战略产业，理由是，在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重视轻工业发展的情况下，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必将上升，如果日本也主攻轻工，不仅意义减弱，而且靠进口重工产品支持轻工发展，从长远看是不利的。至于就业问题，则可以由加快经济增长而得到解决。很明显，两

种观点分别是以“比较成本说”和“筱原基准”为根据的。最后，日本政府采纳了通产省主攻重化工业的结构高度化方案。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是有远见的。从这里人们也可以看到，有没有以至是否正确制定产业政策，对于提高一国在重要历史关头的结构转换能力是多么重要。

当然，日本的成功并不能全然归结于产业结构政策。在政策制定执行的其他方面，也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经验。如通过税收制度调整民间储蓄和企业投资；通过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进而对不同产生的投资率进行方向诱导；通过补贴鼓励新技术的开发；通过贸易保护和保护的逐步解除，扶植某一产业（如汽车工业）生长并适时进入国际竞争行列，等等。没有这些条件，日本的成功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所有这些政策，如果不建立在明确的产业结构政策的基础上，也就会无所适从，难免出现政策信号之间互相干扰互相抵消的矛盾现象。因此，应该把产业结构政策视为发展战略选择的基本环节。

9-4 制定我国产业政策的程序合理性

筱原基准作为规划产业结构的基本准则，对于

判别和把握战略产业的基本特征是非常简明有效的。但是，由于国情的不同，在具体运用这种方法解决我国的产业导向问题时，还需考虑其他的因素。

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因此，它在规划产业结构时，自然要把国际贸易放在重要位置上。实际上，日本也正是以出口为中心来确立战略产业的。所谓战略产业，也就是出口战略产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产业只要满足"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率基准"，就可以判定是战略产业。

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由于大国特征和明显的经济内向性，产业之间很少能够通过国际分工实现互补。因此，在规划产业结构时，就要比日本更多地关注产业之间的关联，也就是必须考虑战略产业对国内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

筱原三代平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进而根据赫尔希曼提出的"关联效应"概念，提出了判别战略产业的第三个基准，即"关联效果基准"。不过筱原认为，这个基准更适用于"封闭经济"。

所谓"关联效应"（或连带效应），即指某一产业投入产出关系的变动，对其他产业投入产出水平的波及和影响。关联效应又是双向的。假定有三个部门，当A产业扩张时，诱发向其提供中间产品的B产业扩张，则叫后向连带效应；与此同时，又诱

发把A产业的产品作为中间产品的C产业的扩张，这便是前向连带效应。

相应的，我们可以采用两个指标来具体衡量某个产业连带效应的大小：后向连锁度——一个产业所使用的由其他产业提供的中间产品与该产业产出的比重；前向连锁度——一个产业向其他产业提供的中间产品占该产业需求的比重。这两个指标都可以根据投入产出表的编制计算出来。

一个产业的前后连锁度，以及不同产业的连锁度，都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如果某个产业的前后连锁度都比较大，即与其他产业的联系更为紧密，那么加速这个产业的发展，就会有力地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在规划产业结构时，就应把诱发其他产业扩张具有最佳效果的产业，作为战略产业看待。这作为选择战略产业的又一个基准，对于更应注意产业的系统发育和协调发展的我国来说，应给予特别的重视。

与上一个问题相关，日本作为“贸易立国”的国家，在判别何种产业才是收入弹性和生产率上升率都高的战略产业时，并不是依据当时国内市场的价格，而是依据国际贸易的参数来确认的。而我国却难以完全照此办理。由于国内市场将长期作为我国的主体市场，我国产业导向的信息应主要取之于国

内。

问题恰恰在于我国国内市场的发育程度太低，价格特别是要素价格严重扭曲。没有可靠的参数，当然就谈不上应用“筱原基准”。在市场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使用影子价格来矫正现行价格，以便近似地反映各种资源使用的机会成本，在此基础上来比较各产业的有关参数。同时，还可以利用统计规律，参照先行国的历史数据进行估算，但是这只具有参考价值，而不能直接用作决策的依据。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深化市场关系改革的必要性。

此外，在规划产业结构时，还需要考虑非经济（以及外部经济）因素的影响。日本在七十年代以后，由于环境污染、人口密度悬殊等问题表面化，自然资源、能源、环境负荷等方面的限制更加严峻，因此，在制定产业政策时，追加了“防止过度密集基准”和“丰富劳动内容基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注定是长期的。因此，在新成长阶段上，应始终把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作为战略抉择的基本出发点，避免由于追求狭义的经济效益而过早丧失长期发展的后劲，否则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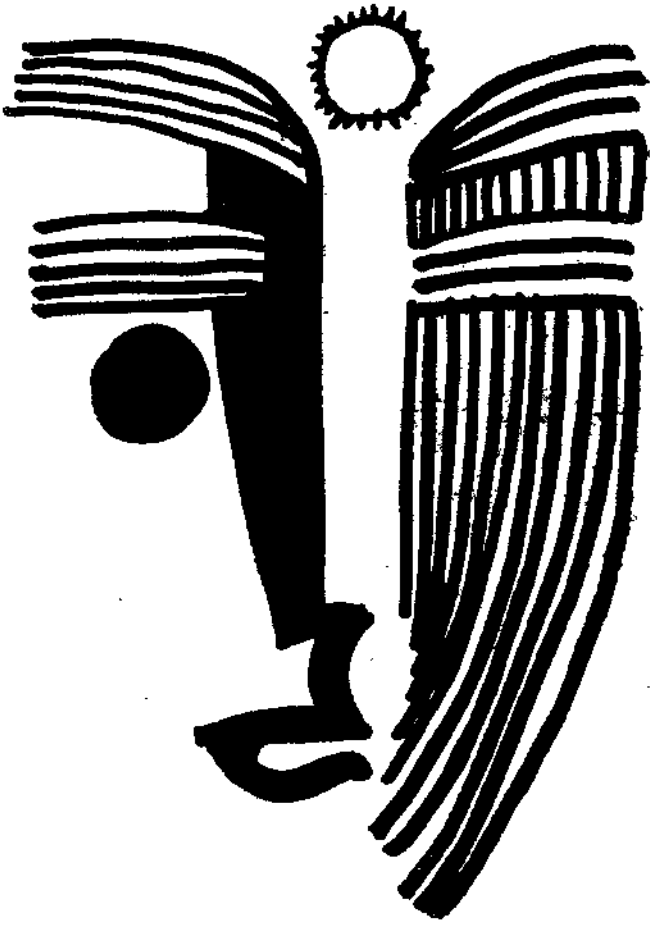
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的制约，可以看到我国制定产业政策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充分的市场和有远

见的干预都不会一蹴而就。因此，现实地说，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还不是一下子找到问题的答案，而是要寻求解答问题步骤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过渡过程（即学习过程），运用程序合理性（而不是本质合理性）思想拟定若干个产业导向的决策程序，可能是适用的。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在这里提出可供讨论的产业定向程序如下：第一步，主要产品的收入弹性调查；第二步，对收入弹性值中含有的误差因素予以剔除；第三步，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分组的收入弹性值的比较；第四步，我国主要产业的前后向连锁度调查；第五步，与参照国的产业连锁度横向比较；第六步，资源“瓶颈”的调查，资源价格的影子评估；第七步，主要部门的就业弹性调查和潜在容量调查；第八步，不同投资方向的机会成本评估；第九步，分配收入弹性，产业带动能力、资源约束和就业弹性在产业选择中的不等权数，并加入生活质量标准和生活方式标准等价值因素，对前面得出的信息进行评判和选择；第十步，确立主导产业。

依照这个程序，我们认为在采矿业、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业、建筑业和食品工业中。农村要进一步扩大进入；在机械、纺织、缝纫等业中，则要加速适应新分工原则作出结构调整。

通过这些产业导向决策程序的执行和反复调试。在我国城乡不同层次的经济决策者之间沟通选择的信息和互相影响价值取向，共同提高对产业结构变革的适应能力和把握能力，就有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反复和震荡，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向更协调的方向转换。



第十章
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

10-1 革新农民进入非农产业的形式

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把千百万世代生息在土地上的农民急骤地卷入到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中。农村变革愈是深入，那些基于非农产业活动与农业活动的本质差别而带来的传统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制度，与新经济形势要求的格格不入就愈是明显。深入产业结构的变革，需要组织和体制方面的保证。逐步完善产业结构导向政策，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其他诸多领域中，我们同样面临许许多多超经验的问题，需要通过组织和制度的创新去解决。以某种意义上来说，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而不是产业结构变动本身）是继联产承包制之后农村中又一场更深入的改革。它当然不能从理想模式出发。事实上，正如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伟大创造一样，

在非农产业发展的新生活中，已经出现了不少并将继续涌现出更多的富有生命力的、有希望成长为新组织和新体制的萌芽。这首先表现在农民进入非农活动领域的新型式上。

由于城乡隔绝等历史条件，60 年代以后我国农民进入非农产业领域的主要形式，就是在本社、本队行政范围内，举办归本社本队所有的农村企业，开发利用当地各种非农产业资源。这种单一的进入形式是促成“低水平过度竞争”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联产承包制变革的深入，农民进入非农产业领域的形式已经有所突破，原有社队企业大都进入了改革的轨道，而各种新型的企业，特别是农民家庭企业和联户企业则引人注目地在各地农村涌现。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交汇，又使进入形式变得更为多样。最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农民企业已经开始突破狭隘的本乡本村的局限，力图在更大的范围内求得投资方向、内外部规模经济和企业布点的优化。

新的进入型式主要有：

（1）跨越本乡、本村的界限，易地创办农民之间各种各样的资金、技术、劳务联合的企业；（2）所有权独立的各类乡镇企业，程度不同地加入以大中型国营企业以及其他城市企业为龙头的企业

联合，成为其中比较稳定的零部件、散装件或某一工序的专业外包生产者；（3）由政府通过国营企业搭起开发性企业的框架（即只配备企业领导和技术管理层），招收农民合同工构成的企业实体。

目前尚不完全清楚种种新型式企业在各产业部门及各区域的统计分布。从已有调查来看，新的进入型式在全国乡镇企业中只占据较小的一部分，并且不很稳定。但是，已经可以看出，这些有别于“本乡本村、自办自有”式的新的进入型式，毕竟指示出了在劳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充分开发我国非农经济资源而又避免低水平过度竞争前途的一种可能方向。

比如在矿业开发中，由于我国矿业资源分布的极不均匀，因此当国家允许并鼓励农民群众加入“有水快流”的开发行列之后，就产生了新的矛盾：靠近富集资源的乡村囿于当地资金规模、技术水平和人力素质的不足，或无力进入，守矿受穷，或发生不惜破坏资源和必要的规模经济的过度竞争。尤其是在一些共生矿（我国相当多的矿床属于此类），为此付出的资源和环境的代价要更大。这就暴露了乡乡村村“谁有谁办，谁办谁有”型式在我国矿业开发中的局限性。如何把大规模运用劳动替代同有效利用我国矿产资源统一起来，成为进一

步开发矿业的一个关键。新的进入型式的意义正在这里。安徽省淮北市烈山村，地处碎区，自然资源丰富。为了更充分开发本地资源，这个村自1985年以来先后从山东、河南、湖北、江苏等省以及邻县，招收了1200多名农民合同工，成为这个村乡镇企业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类似的事例在我国矿业资源集中的山西、内蒙、西北和西南已多有所见。此外，象“无矿乡村到有矿乡村投资投劳”；“群众办矿，国家办电、办运”；“农民采，定点收，国家炼”，以及我国东南一些缺煤缺电省分的用户跨省到能源基地投资入股，联合开发矿业，都是在更大范围内调度资金、技术、人力的流动和更佳组合，来适应矿产资源既定的区位分布，进而使开发过程取得起码的规模效益的有益尝试。

在其他异质异分性较强的产业中，乡镇企业加入以城市企业为龙头的企业联合，作为一种更新形式，也展示出农民进入的广阔前景。著名的“二汽”企业集团，除包括114家大中型城市汽车厂之外，还联结了1,000多家乡镇企业；总部设在西安的“标准”缝纫机厂，通过跨市跨省联合，把几百家乡镇企业纳入生产体系，把触角深入到各地农村。宁波市按照贸、工、农的要求，建立了九条出口“一条龙”生产加工体系，吸纳了178家乡镇企业，

这些企业上联加工厂和外贸部门，下联千家万户，生产196种出口商品，提供的出口商品占全市外贸商品收购额的23%。凡此种种，不仅迅速扩大了骨干企业的生产能力，而且也有效地促进了农村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由此看来，通常所说的"离土不离乡"，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就是本乡本土的话，那么这个限定的意义已经越来越不足道了。产业结构的变革势必要求加快要素在城乡和地区间的流动，它理所当然要割断传统人际关系中的地缘纽带。新的进入形式正在缔造符合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关系，这无疑表明了中国农村的社会进步。

10-2 更新城乡企业分工原则

农民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进入非农产业领域之后，如何同既有的城市工业体系实行合理的分工，是提上日程的又一问题。

过去的指导方针（从"三就地"到"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体现的都是按产品来实行城乡大中小企业之间分工的思想。但是，近年在实践中已出现的一些新动向，开始体现了**按产品的加工阶段实行**

分工的新原则。

“加工阶段”是从纵向角度观察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得到的概念，如“原料——已加工原料——半加工原料——粗制品——简单制成品——综合成品”等等。许多产品和产业，当其处于不同的加工阶段时，对技术、资金、管理和外部经济的要求都是大不相同的。如果在分工过程中针对性更强地利用这些不同要求，那么就可能比笼统地按产品实行分工，既提供更多低收入人口的进入可能性，即劳动替代的可能性，又取得更好的产业整体效益。

我国农村非农产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小规模企业占绝对优势。1979年全部非农产业平均每个企业拥有22.9人。1985年平均每个乡村非农企业拥有29.0人。如果计入乡、村两级企业之外的户办企业、联户办企业和其他企业，那么1984年的平均规模仅为10.6人。1985年为12.7人。其中工业制造业中的企业平均规模为32.6人，在15个行业中，纺织工业的企业规模最大，达到88.7人，另有5个行业（冶金、煤焦、皮革、文教和缝纫）的企业规模在50人以上（见表10—1）。

人们通常认为，规模小、企业类型极不规范的乡镇企业的大量涌入，是造成近年某些工业部门低水平过度竞争加剧的原因。这种看法尽管有片面的

表10—1　主要工业部门中乡镇企业的平均规模

（雇员人数）	1980	1984	1985
1.冶金	64.6	50.0	53.8
2.电力	12.1	7.5	7.7
3.煤炭	77.1	69.9	64.1
4.石油	35.4	42.5	29.8
5.化工	51.7	45.8	43.5
6.机械	44.7	34.6	42.1
7.建材	67.6	39.1	42.8
8.森工	31.1	17.4	20.3
9.食品	19.7	7.9	9.0
10.纺织	100.6	78.4	88.7
11.缝纫	33.8	38.5	50.5
12.皮革	66.4	48.7	56.7
13.造纸	50.0	43.7	48.9
14.文教	66.0	50.6	51.6
15.其他	41.3	24.4	23.9
总　计	47.1	28.3	32.6

资料来源：乡镇企业统计资料。

道理，但是却没有击中问题的要害。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企业规模小，而在于这些小规模企业是以“小而全”、而不是以专业化为发展方向的。

比如，在过度竞争问题最突出的机械工业，产品结构的高度化通常会使加工环节和组装工序增多，使这一产业部门的技术可分性特征进一步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改组机械工业（包括要

素向新兴工业领域的转移）所要求的资金增密趋向，并不绝对排除对“劳动代替”的需求。正确的途径在于，在果断地关闭一批落后的“小而全”的整机厂的同时，沿着专业化生产方向施行企业组织结构的改组。“二汽”企业集团中1000多家乡镇企业专门为“二汽”生产一种垫片、一个螺母或某种零部件的事例表明，产品结构的高度化不仅它需把乡镇企业逐出机械工业，相反，乡镇机械企业的规模小、分布广、有机构成低、劳动成本低等等特点，恰恰是农民从某一个或几个加工阶段更多地进入机械工业的有利条件。

在整个制造业系统内，按产品的加工阶段实现大中小企业的分工，都有广泛的用武之地。中国尤其需要研究和利用现代工业中**分包生产重新崛起的技术潮流和组织潮流**。所谓分包生产，就是大工业公司依赖劳动密集的小企业制造零部件、配件或进行各种加工，然后生产出“自己的”产品。日本1969年的分包生产占家用电器部门的23.6%，占造船业的17.9%，机床的15.1%，电子工业的14.5%；1970年，小企业产量竟占全日本工业总产量的48.9%；1971年，全日本有57.9%的小型制造企业是分包商，大型制造企业总产量的17%是由这些分包商制造的。印度自1956年以来由政府采取措施保

证使小企业成为大工厂的分包商，到1973年，注册的小企业共有40万家，产量占全部工业产量的50%。在波兰，尤其在拥有剩余劳动力的中部和东部地区，政府希望用大小工业之间建立长期分包关系的办法来实现那里的工业化。智利政府甚至推行强制分包，即用法令规定某些产品必须进行分包，以解决就业问题和收入方面的社会公平性问题。*由于小工业创造一个就业机会所付的成本较低，每个投资单位的产出较高，所以当小企业与大企业结成有机联系时，它们在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弱点就得到了弥补。

新的工业分工组织原则提供了把制造业的高附加价值化同就业扩大统一起来的新的希望。日本高速增长时期以三组主导产业的更替（电力工业→石油化工、钢铁和造船→汽车和家电），迅速实现了产业的高度化。其间资本增密倾向显著，但并没有因此使工业的就业增长变缓：1955年～1970年间日本制造业工人从690.2万人增长为1,368.2万，每年平均增长4.7%，比同期其他市场经济发达国和中央计划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增长率都高。对比之下，我国工业企业规模结构的突出问题并不是小企业太

---

*联合国工发组织编：《分包生产对经济现代化的作用》，机械工业出版社1981年版。

多（5～33人的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的59.2%，比英国的65.2%、南朝鲜的70.6%、日本的80.2%都低*），而是小企业同大中企业的分工原则不对头。城乡大中小企业之间按产品加工阶段实行分工的新经验的出现，实际上指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方向。

10-3 深入财产关系的改革

扩大农民向非农产业的有效进入和更新农民企业参与社会分工体系的原则，实质上都需要农村的各种经济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全方位转移、流动和重新组合。这就提出了深入农村经济关系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乡镇企业主体的前身是社队企业。作为一种在城乡隔绝体制下历经磨难而生长起来的形态，社队企业的财产关系先天性地附属于土地和地域性行政系统。它的典型形式是靠本社本队的公共积累创办，归属于政社合一的社队主体。在这种形式下，企业没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不能独立地对市场变

* 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主报告）》，财经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化做出反应，劳动和投资的报酬同企业的直接经营后果联系并不密切。所有这些抑制社队企业充分发挥积极性的因素，理所当然地成为土地联产承包制确立之后深入农村体制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从动力结构来分析，集体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同经营权的“承包式分离”，对于社队企业的改革同样也是适用的。社队企业体制的改革已经合乎逻辑地提上了历史日程。

但是，企业财产在技术上绝对不适于按人头平均承包，不仅不适合于按它的全体所有者——理论上是所属社队的全体社员——来均分承包，而且也不适合按本企业全体成员来均分承包。这种技术上不可完全均分的财产必须找到自己的经营当事人，才能在事实上完成企业所有权同经营权的分离。

各种集体承包和厂长(经理)承包制应运而生。接踵而来的关键困难就是**如何预先准确估价企业财产在承包经营过程中对财富创造的贡献**，以便在分配中把这部分净收入作为财产所得（以承包上交形式）归其所有者，而同经营者劳动所得区分开来。分配中财产所得同劳动所得的分野，正是企业资产所有权同经营权分离的实现。但是，预先准确评估财产的贡献恰恰是极为困难的。在缺乏资产市场的条件下，困难的性质决不只是技术上的。1983—1984

年间，相当一批社队企业的承包合同在兑现时引起了纠纷，主要成因就是承包签约时对财产估价畸高畸低。均分式的土地承包中悄悄绕开的冲突，在非均分式的企业承包中再也无从回避了。

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承包经营后的社队企业，形成如下三个层次的利益当事人，（1）作为社队企业财产所有者的全体社员（及其乡村干部代表）；（2）作为享用双重身份的社队企业从业人员（包括厂长或经理），他们既是企业所有者集合中的一分子，又是企业经营者、劳动者集合中的一分子；（3）作为单纯的、不享有所有者权利的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包括跨社队聘雇来的厂长、经理和工人。

三层当事人之间，不仅存在着每次生产过程成果的分配关系，而且存在着再生产、再投资果实（即在承包经营中所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的分配关系。这时，承包经营的劳动所得和财产所得在界限上的任何混淆，都会形成对某一层当事人经济权利的侵犯，或者分配的结果断然难以为各方所接受。

经济利益的矛盾激发起寻求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为活跃的力量。早在1980年前后，甘肃、陕西、江苏等省区的一些社队，开始在社队企业的承包经营

中引进的股份制形式，被当地群众认为是解决非均分承包问题的适合形式。农村萌发的股份经济，当然远不是其成熟形态。但它毕竟引进了各种模拟市场评价企业财产的办法（或参照银行利息、或用经验参数、或预期契约、或招标竞争）；毕竟使财产所得与劳动所得取得了一种形式上的分野；毕竟为社队企业多层次利益关系的协调和财产规模的保持提供了一种可用方式。1984年末，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山东、安徽等省区实行股份制的社队企业已占40—70%；在南方各省，“入股分红”制已成为群众集资的一种通行形式。

实践证明，股份制能够较充分地保证企业的自主权。过去那种四面八方向社队企业（“小金库”）伸手，企业超负荷运行的状况有所改观。同时，股份制又是推动企业提高自身素质、追求经济效益的有力杠杆。因为企业必须兑现股息和红利，再无“大锅饭”可吃，无后路可退。这就迫使企业只能在经营管理上下功夫，去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市场。由于过去“说不清”的财产关系，现在建立在契约关系的基础上，利润返还采取股息和红利的形式，因此企业与社队之间的分配关系明晰化了。由此可以把收入分配同福利补贴分解开来，促进分工的发展。

但是，乡村企业财产关系方面的深入改革终究要受到宏观经济形势的约束。值得探讨的是，随着国民经济中对农业投资动力的减弱，社队企业以利润返还补农的“微调”形式，引起了社会更高程度的重视和肯定。这就强化了企业财产对土地的直接附属关系。由此连带产生了村村队队办企业的新动力，客观上延滞了社队企业“承包式分离”的过程。根据最新资料，1985年全国乡村企业税后利润的50%～70%要以各种名目交走，实际负担大大超过财产所得（而且也未真正都归它的所有者享用），不仅构成承包经营权利的侵占，也导致这类企业缺乏自我改造能力。这在未实行股份制的原社队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地域性行政权力系统的附属惯性，使这些企业难以成为结集农村非农企业财产的新成长点。1984年全国乡镇企业中农民个体企业和新办联合企业达441万个，占总数的72.8%，1985年进一步增长为924万个，占84.5%。从产值增长幅度比较，1985年乡村企业比上年增长29.8%，而个体和联合体企业则增长124.2%。后者正在成为乡镇企业资产形式中的主体形式。它对整个农村变革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究竟会发生什么影响，值得作为深入研究的重点方向。

10-4 充分运用货币推动

在影响乡镇企业发生发展的各种宏观经济条件中，货币的地位大大加强了。过去我国农村调度剩余劳动替代资金，形成积累的主要领域限于农田基本建设，主要形式则是义务工制度。据专家估算，1980年全国农民的活劳动，未经商品交换直接形成农田水利工程、造林、房屋等共55～70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1.6～2.1%，积累基金的5～6%，平均每个农民20元。* 在社队企业财产的形成中，农民无偿的劳动积累也占有相当份额。

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劳务付费的倾向不可逆转地抬头。1979～1984年，全国农田水利建设规模有所缩减，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货币来调动过去由义务制提供的民工劳动；同期农村建房、植树规模的大大扩大，则以劳务付费制的兴起为条件。至于货币报酬取代实物报酬，更在各类乡镇企业的发展中成为普遍的、主导的趋向。1984年全国每个乡村企业从业人员现金工资收入621.9元，比1979

* 梁文森、田家海：《有关积累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年社队企业人均现金工资收入（约238.5元）增长1.6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1.1%。再从乡镇企业的发展来看，它的充分发展也愈来愈取决于它能否筹措到足够的货币资金。1979/80年度，每元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引起乡镇企业总收入增长5.08元，1980年/81年度为5.29元，1981/82年度为8.50元，1982/83年度为9.79元。货币推动的短期效果如此明显，不能不同时刺激乡镇企业信贷资金需求和供给总规模的增长。总之，货币在农村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中的地位较之土地、劳力等大大提高了。

从大环境分析，我国存在着数额巨大的闲置资源（主要是人力，也包括设备和其他资源），同时社会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又都很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令纯粹的增发货币，理论上也并不注定引起无法收敛的通货膨胀。因为增发的货币可以调动闲置资源，迅速形成为供给，又成为回收货币的条件。困难在于，过程中的时滞作用，会成为通货膨胀的推力，尤其是在市场严重的结构性矛盾背景下，它们可能成为进一步恶化市场形势的失控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不能笼统地利用增发货币效应的原因。1984年下半年之后，国民经济出现的波动，提示我们决不能对此掉以轻心。这对货币推动的利用又构成严格的限制。

既然我们再也无法退回到靠行政命令即可调动劳动积累的年代，因此，如何把充分发挥货币对农村经济的推动作用，以便更大规模地运用劳动替代同稳定市场的要求结合起来，就成为改善宏观控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事实上，虽然近年来我国乡村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故从总量平衡的观点看，似乎乡村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对总需求膨胀的影响权重更大。但是乡村居民的货币开支有着不同于城镇居民的特点，在农村增发货币要相对安全一些。这里除了前文提到的农民的消费品购买力指向更易由国内生产体系来满足外，还由于乡村居民的货币开支中还要包括追加的生产性投资和建房项目，因此，对市场的压力要分散一些。此外，农民独立承担的风险多而社会福利水平普遍更低，导致乡村居民的意愿储蓄倾向更强。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材料计算，1982年～1984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储蓄倾向为13.1%，而农村居民为20.6%；两年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生活费收入和储蓄分别增加124.80元和33.36元，边际储蓄率为29.1%；同期农村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和储蓄分别增加85.22元和31.65元，边际储蓄率为37.1%。如果再加上消费支出中的住房开支，转到储蓄项目下，那

么农村的边际储蓄倾向则在50%以上，远高于城镇居民。据此有理由认为，农村能够成为更充分利用货币推动作用的巨大实验场。

农村产业结构变革中的各种矛盾都会集中反映到货币运动中。现有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制不能适应要素大规模流动，特别是不能适应非农活动性质要求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这表现在，农村中货币流转速度较低（据推算大约只及城市的1/3），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吸收储蓄的手段和设施不足，缺乏横向融资的渠道，特别是我们迄今还没有类似日本中小企业银行那样，专门为乡镇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这些问题都必须通过金融组织和体制的创新去解决。我们看到，近年农村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的信用组织和形式，如温州地区的私人钱庄，苏南乡镇企业的“内部银行”，伴随着股份制涌现的各种集资集股形式，以及各地纷纷出现的民间信用社等等，初步活跃了农村中的资金市场。不失时机地将货币对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以量的扩张为主的推动，转向对质的提高（包括利用方式、效率、投向和周转速度）的推动，必将对农村产业结构的逐步高度化，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对农村结构生产力的解

放，其意义并不亚于联产承包制对土地生产力的解放。但是，如果我们的视野不是圈于农村，那么对农村进一步改革的意义也许可以得到更多的认识。

伴随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在回顾1984—1985年“宏观经济失控”之后，已有更多的同志认识到，企业财产关系的改革和要素市场的形成是全部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如果企业只负盈不负亏的局面得不到扭转，企业行为不改变，其他方面的改革就收不到积极的响应，宏观调控也难免陷入适得其反的境地。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不象最初预想的那样会很快取得如同农村那样的进展。原因当然不限于城市经济系统比农村复杂，旧体制的积弊更深。更为重要的是，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比宏观调控的建立要遇到更多的实质性难题，并触及到在旧体制下形成的各种利益关系。

因此，改革需要有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匈牙利30年、南斯拉夫40年的改革历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农村改革在全局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

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以后，思维的“热点”也自然地随之转移。但是，这并不表明农村改革已大

功告成，也不意味着城市改革可以单独推进。事实上，城乡改革的交汇和互相激发，从来都是推进改革的必要前提。

进一步，从城乡改革的实践，特别是从近年城乡居民对放开后的市场的不同反应，乡镇企业与城市企业在银根紧缩情况下解决流动资金短缺问题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中，人们不难看到，从未被国家包下来的农村人口在适应和接受市场调节方面的障碍要比城里人小得多。这对于改革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可忽视的资源。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其道理也正在这里。因此，能否充分意识并调动这笔资源，不仅关系农村改革能否深入，而且事关改革全局。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八亿农民就不仅是推动产业结构变革，而且也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积极力量。过去七年联产承包制的成功改革，为城市提供了一个值得改革的证明，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农村也完全有可能为城市改革提供新的经验。这正是农村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更深层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H·Chenery, M·Syrquin，《发展模型1950—1970》。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2000年的中国》总报告及1—12分报告。

《战后南朝鲜经济》，社科出版社1983年版。

邹至庄：《中国经济》，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世界银行：《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

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

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出版。

H·CHENERY：《STRUCTUR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POLICY》，1979。

《中国经济结构变化与增长的可能性和选择方案》，气象出版社1985年版。

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孙尚清主编：《论经济结构对策》，社科出版社1984年版。

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

题和方案（主报告）》，财经出版社1985年版。

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各国工业化概况和趋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年版。

宋国青、罗小朋：《经济结构与经济改革》，《农村·经济·社会专辑之二》。

《农村的非农业发展：亚洲的经验与中国的前景》。气象出版社1985年版。

周叔莲、裴叔平主编：《中国工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伊藤正则：《日本高速增长时期资金的筹措和金融的作用》，（1985、8，北京讲稿）。

周其仁、陈锡文、白南生：《乡镇企业的整顿与发展》，《人民日报》1985年10月4日。

日本经济企划厅国民收入部编：《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通俗讲话》，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

赫伯特·A·西蒙著：《关于人为事物的科学》，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西黑尔·E·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走向未来丛书

一九八四年出版

人的发现	李平晔著
增长的极限	（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
	李宝恒译
激动人心的年代	李醒民著
GE8——一条永恒的金带	道·霍夫斯塔特原著
	乐秀成编译
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根据F·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编译 灌 耕编译
现实与选择	朱嘉明 吕 政著
经济控制论	何维凌 邓英淘编著
探险与世界	于有彬编著
看不见的手	杨君昌编著
语言学与现代科学	陈明远编著
在历史的表象背后	金观涛著
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	刘青峰著

走向未来丛书

一九八五年出版

人的现代化　〔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等著　殷陆君编译

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　汪家熔编著

没有极限的增长　朱利安·林肯·西蒙原著
黄江南　朱嘉明编译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金观涛　唐若昕著

在国际舞台上　陈汉文编著

昨天　今天　明天　邓正来编著

摇篮与墓地　陈越光　陈小雅著

择优分配原理　茅于轼著

第三次数学危机　胡作立著

凯恩斯革命　杨君昌编著

艺术魅力的探寻　林兴宅编著

西方文官系统　杨百揆　陈子明　陈兆纲　李盛平
缪晓非著

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变化　邓英淘　何维凌编著

新的综合　〔美〕爱德华·奥尔本·威尔逊著
李昆峰编译

走向未来丛书

一九八六年出版

富饶的贫困	王小强　白南风著
定量社会学	郭治安　姜　潞　沈小峰编译
儒家文化的困境	萧功秦著
系统思想	〔美〕小拉尔夫·弗·迈尔斯主编 杨志信　葛明浩译
日本为什么“成功”	〔日〕森岛通夫著　胡国成译
悲壮的衰落	金观涛　王军衔著
弗洛伊德落作选	约翰·里克曼编　贺明明译
西方的丑学	刘　东著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美〕R·K·默顿著 范岱年　吴　忠　蒋效东译
画布上的创造	戴士和著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美〕约瑟夫·阿·勒文森著 刘　伟　刘　丽　姜铁军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马克斯·韦伯著 黄晓京　彭　强译
信息革命的技术源流	宋德生著
增长、短缺与效率	〔匈〕亚诺什·科尔内原著 崔之元　钱铭今译

走向未来丛书

一九八七年出版

走向现代国家之路	钱乘旦 陈意新著
竞争中的合作	陈汉文编著
计量历史学	〔苏〕科瓦尔琴科主编 闻 一 肖 岭译
哲学的还原	麦克斯韦·约翰·查尔斯沃斯著 田晓春译
凯恩斯理论与中国经济	林一知著
人的创世纪	张 猛 顾 昕 张继宗编著
社会研究方法	〔美〕艾尔·巴比著 李银河译
发展社会学	胡格韦尔特著 白 桦 丁一凡编译
上帝怎样掷骰子	陈克艰著
空寂的神殿	谢选骏著
震撼心灵的古旋律	郑 凡著
以权力制约权力	朱光磊著
整体的哲学	金观涛著
人体文化	谢 长 葛 岩著
人心中的历史	刘 昶著
探寻新的模式	罗首初 万解秋著
发展的主题	周其仁 杜 鹰 邱继成著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美〕K·J·阿罗著 陈志武 崔之元译
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	〔英〕查·赫·斯诺著 陈恒六 刘 钝译
马克斯·韦伯	〔英〕弗兰克·帕金著 刘 东 谢维和译